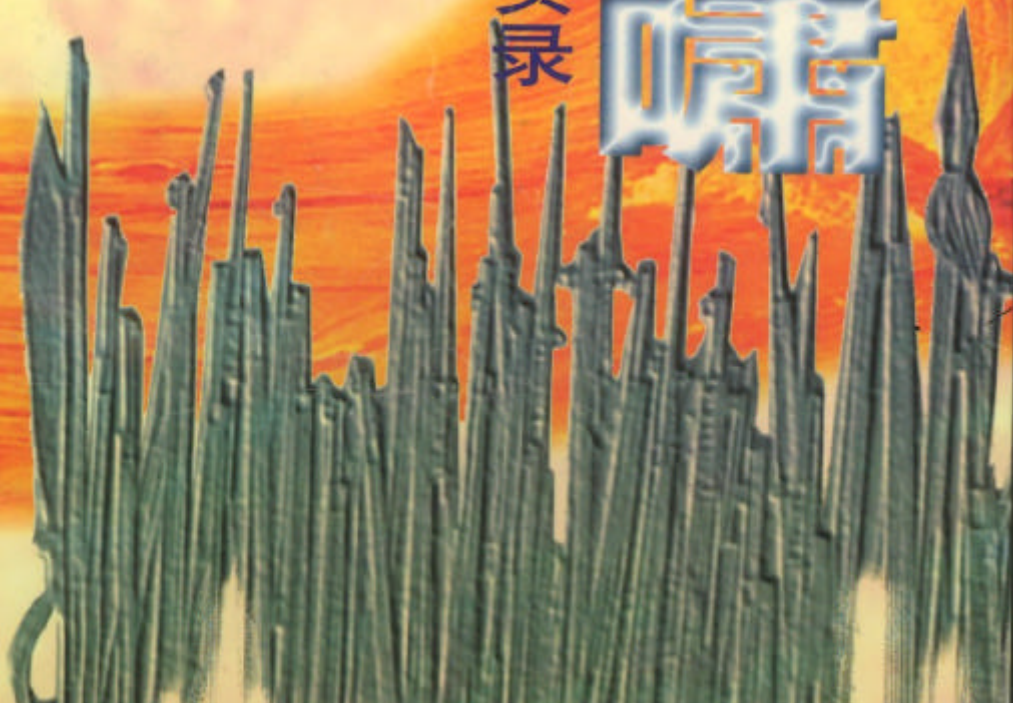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抗战纪实丛书

山河呼啸

东北抗联征战实录

全勇著 湖南出版社



楔 子

在今天的中国，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人恐怕不多。但是，真正能说清楚什么是义勇军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

所谓义勇军，是指 1931 年 9 月 18 日那场尽人皆知的大事变以后，东北三省的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抵抗命令，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武装进行抗日。由于这些抗日活动是由群众自发组织而成的，是一种义勇行动，这些武装也就因此而被称为抗日义勇军了。

乱世英雄起四方。正像中共中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在《由于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迫任务》中分析的那样，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东北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一场武装反日斗争必然到来。“九·一八”事变“像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义勇军从产生到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一个十分迅速的发展过程。据权威资料统计，到 1932 年夏秋之际，全东北的义勇军人数不下 30 万。从其构成成分来看，其中农村各阶层群众占 50% 以上，原东北军及公安警察占 25% 左右，绿林队伍（东北人所说的胡子）占 15%，知识分子约占 5%。领导义勇军抗日的有军官、警官、官吏、知识分子、开明地主士绅、绿林首领和农民。从范围来看，在当时全东北的 154 个县中，有 93 个县有义勇军活动。

在辽宁，有绿林首领高鹏振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东北军少校队副张海涛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纵队、退役军官王显庭的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东北军军官李纯华的辽南救国军、邓铁梅的东北农民自卫军、原东北军军官高文斌的辽北骑兵第一路、第二路义勇军、黄显声的辽宁公安骑兵总队、辽宁陆军第一团团团长唐聚五和警察局长郭景珊的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吉林，有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长冯占海的警备军、依兰镇守使兼第 24 旅旅长李杜和中东路护路军司令丁超的吉林自卫军、原吉林步兵第 27 旅 676 团 3 营营长王德林的吉林救国军

在黑龙江，有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司令官马占山将军的原东北军部队、原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 2 旅旅长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绿林首领李海青的义勇军……

可以说，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整个白山黑水间到处都有抗日义勇军健儿浴血奋战的身影。他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勇敢地站了起来，用自己的生命筑成了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攻不可没，利在千秋！

但是，“满洲各地的义勇军，不论组织与纲领……，并未达到统一阶段。吾人仅就其使用的旗帜而言，有红旗，有国民党旗，有与日本旗刚刚相反的旗（即红地白日旗），有绿色旗，真是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义勇军与都市游击队间，尚横着深刻的隔膜”。

像这样一支军队能够打走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吗？

显然不行！

事实也是如此，到 1932 年底，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便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下一支又一支地不断被击遣溃了。许多义勇军的将领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了，剩下的也都处于极度的彷徨和混乱之中了。

东北的抗日斗争将向何处？谁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斗争？

世界睁大了眼睛在看。

祖国母亲在等待着自己儿女们的回答。

东北人民则望穿秋水盼望着救星的出现。

前引文章接着写道：“可是为时未久，一只巨灵之掌就伸到他们头上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巨手。这只巨手，立刻将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无异于一针吗啡，使‘满洲’各地的义勇军的实力，有着急剧的增加。而这时，统一的纲领，就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

“从此以后，各义勇军的行动，都统一在抗日的途中，声势也随即浩大起来。盖他们已从旧日盲目的抵抗行动，一跃而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甚至将其势力伸入到‘满洲’的军队中。他们鼓动满军反正，煽动满军杀害日本人的将校与顾问，然后携带完美的武装，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

中国亡不了！东北有救了！！东北的老百姓们在歌谣中唱道：

九·一八，大炮响，
鬼子兵，占沈阳。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
扔下百姓遭了殃。
不是下令要劳工，
就是强征出苛粮。
逼得人们没活路，
上山去找大老杨。

这首歌谣里唱的“大老杨”，便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的眼中，他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

中国共产党挑起了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重担，此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但是，请别忘了，这是地地道道的临危受命。挑起这副担子决不会像前述文章中说的那般轻松愉快，相反却注定了那将是一个充满了艰险和困难的过程。

山河呼啸东北抗联征战实录

第一章

1 风起磐石

位于吉海铁沿线上的磐石，是较早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之一。1930年8月，中共磐石县委成立；一年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成立。磐石也是日伪重点加强统治的地区，1932年2月，日本人在这个朝鲜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策划成立了一个“朝鲜人民会”（亦称保民会），还在那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警察分署。日本人的这些侵略行径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强烈反抗。仅在1932年一年内，就发生了3次大规模的反日锄奸运动。关于这三次运动，1937年11月在上海出版的《东北抗日游击实录》中记载着一位目击者的如下述说：

“辽宁磐石县二区吉昌子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受不了亡国奴的气，都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1932年就先后爆发了3次大的抗日斗争。第一次是吉昌子北郭家店3月7日反日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当日群众包围当地警察署，要求他们出来抗日，走狗王署长不但不应允群众要求，反而向磐石街调兵来弹压，群众坚持甚久始散。第2次是4月初旬。日本走狗曾逮捕东北岔反日群众数名，并想继续向吉昌子捕人。吉昌子北部一带的群众得到了消息，就立即动员了600多人，准备了辣椒面子、剪子等，等走狗们带同被捕人到吉昌子北二三里地方，群众就开始行动，把辣椒面子扬到走狗眼睛上，用剪子把被捕人的绑绳剪断，走狗一看事情不好，就穿上兔子鞋，撒腿拼命跑了。群众立刻追上去，一直追了40多里，走狗好不容易跑到三道岗，遇到一个大院套烧锅（白酒制造厂），就像老鼠一般钻进院藏起来。群众进不去就把烧锅包围起来，烧锅附近的老百姓都援助追赶走狗的群众，给群众杀猪吃。双方对峙到夜里，走狗由磐石街调来骑兵才退回来。第3次群众斗争是5月间，在磐石北二区蛤蚂河子（吉海路沿线）地文开农民群众抗日大会，到会500多人，当时将日本走狗高家大院粮食等都给没收，群众每人分得高粱3升。当天群众将吉海路拆毁。”

其实，在上面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忽略了十分重要一点，那就是没有说出这三次反日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林以及磐石地区共产党员孟杰民、李红光李东光等人。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一下孟杰民和李红光。孟杰民，原籍辽阳，“九·一八”事变前来到磐石县细林屯“九·一八”事变后，当时正在磐石中学读书的他和他的同学初向臣等一起毅然投身到了反日斗争的洪流中去。孟杰民的一大特长就是善讲，能说服人。1942年抗联一路军的负责同志回忆起他时说他“能说能干……，又有相当的外交手段，无论是群众，还是抗日部队，听了他的讲话无不赞扬叹服”。磐石县委为了贯彻省委关于“加强伪军中哗变工作”的指示，专门派他到驻伊通营城子的伪军第5旅第13团7连去做工作。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个连的伪军在四五月间打死了他们的连长，宣布抗日。虽然后来跟孟杰民过来的士兵不多，许多人不愿意站到共产党的旗下，但他们却送过来20多支枪。

李红光，又名李弘海。朝鲜京畿道龙仁郡人。1926年迁居中国吉林伊通县。据后来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说，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在乡里只读一年小学，虽然汉话说得并不太流利，但汉字写得很好，能诵读一般的文件和写文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李红光的特点就是胆大心细，也特别仗义。《东北抗日烈士传》上记载的一件事就能说明这一点——“红光见政委（杨佐青）没有武器，几次把自己用过的手枪诚恳地让政委使用。

杨政委都委婉谢绝，坚辞不受。红光心里很不安，整天想给政委弄支枪。一天，他冒着生命危险，独自一人去玻璃河套一个地主家缴枪。进村后，隐蔽了一天多，终于等到地主出村，他缴了一支崭新的瓦亮小手枪，赠送给政委”。他组织领导的“特务队”对保卫县委安全，特别是在打击汉奸走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务队”也因此有“打狗队”之称。

中央满洲省委对磐石地区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杨佐青（又叫杨君武、黑杨）和张振国（绰号张瞎子）就是省委为此专门派来的。1932年6月4日，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省委特派员杨林的主持下，一支对外号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4纵队”，对内称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抗日队伍正式成立起来游击队成立之初，还是很“火”了一阵的。据杨佐青后来回忆说：当时还做了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长条形红旗，在旗裤部位竖缀着“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几个大字，队员们都佩戴着写有“工农反日游击队”第某大队字样的红色袖标。同时，他们还对外发布了宣言，宣布：“本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担任清除走狗、保护民众之责，决心驱逐一切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

可是，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左”倾错误方针，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所以他们在与敌人战斗的同时还要与当地的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再加上游击队的领导人这时还都缺乏作战经验（省委答应寄给他们一本“中国游击运动”小册子，他们一直没有收到。一本从私塾先生手里弄来的《孙子兵法》成了他们学习打仗的教材，几个领导经常一起在油灯下听孟杰民读那本已经发黄的老书），所以刚刚成立起来两个多月就不得不退出了他们的蛤蟆河子根据地。于是，队长张振国离队到省委去汇报情况，讨主意去了。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张走后，原任第2分队长的孟杰民出任代理队长一职。而这时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也感到问题严重，为了避免与其他抗日武装再次发生冲突，他们做出决定：将游击队与一支报号为“常占队”的绿林武装合并，取消原来队号，对外号称“常占”队。

当时的省委巡视员张贯一在1933年5月31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对此做了如下报告：

“……磐石党团县委领导上的错误，偶以遭受挫折，即认为环境恶劣，无法单独活动，故在去年7月间极可耻地把自己的武器送给了一个惯匪常占，并捧他做为我们队伍的领导者，实际上不但削弱了我们的政治上的影响，党（而且）把群众抗日武装断送给胡匪之手，致（至）2月党团同志均感匪首野心勃勃另有阴谋和单独造成自己的实力，事至无奈，只得无计划地从胡匪窝里哗变出去，人数百名，大小新式武装无法存在，故采取割头换象的办法，改常占胡匪名义为五洋胡匪名义相号召，行动上不过到处与胡子头很和平地会晤而已，由桦甸直走东满，万一环境再恶劣时，以便避难苏联。但到桦甸和永吉交界一带，因种种困难无法东渡，一般同志大半悲观、消极，感觉没有出路，当时一般下层同志多半主张我们的队伍是磐石党领导之下的应回磐石去干，另一部分同志主张乘机东渡，两方面相争不已，全体又感到无法东渡，只得静候省委前来解决。”

磐石的游击队在等着省委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想让省委给他们派个能人来。省委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次果然给他们派来一个了不起的大能人，这个人就是起草上述那份报告的张贯一，也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

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当时，杨靖宇是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省军代理书记。省委派他到南满来的任务很明确，目标定得也很高——整顿磐石、海龙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为发展“30倍武装而斗争”，迅速建立红军32军第1师，“以磐石为根据地创立磐石的新苏区”。杨靖宇是1932年11月份的时候化装成一个商人（杨靖宇的名字也是从这时开始起用的）从哈尔滨出发的，那时还不知道南满游击队已经离开了常占队，因此他一到南满最先找到了常占。正在为游击队独立出动感到生气的常占，一听说共产党的人又来了，马上下令：把来人扣起来！

像常占这样当胡子头的人下令扣人意味着什么？不用说，谁也都能知道。一般的人遇到这种事非吓得尿裤子不可。但杨靖宇没有怕，他可是见过世面的人。早年在河南确山老家上学的时候，校长因他出面制止兵差乱抓人，而要开除他，他没有怕；1927年身为确山县农民协会会长的他，面对包围确山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他没有怕；1929年在担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被捕时，面对日本人的种种酷刑，他也没有怕，反而对审问他的中国法官说：“中国政府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丧权辱国，为虎作伥，做敌人鹰犬，纵任日寇在中国土地上横行蹂躏，耻做中国人……被常占扣起来的杨靖宇不但没有被他们所吓倒，而且通过对其晓以民族大义，使常占最终心服口服地把他放了。从常占队里出来后，杨靖宇又费了不少周折才到达游击队的驻地——桦甸县蜜蜂顶子。

1980年，当年给杨靖宇当过警卫员的王传圣（时任哈尔滨市木材公司副经理）、黄生发（时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在抗联老战士座谈会上说：杨靖宇在抗联中有崇高的威望。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谦虚谨慎。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杨靖宇骂过人，就是在最气愤的时候批评同志，他只说一句“岂有此理！”从这件小事，我们不难看出，杨靖宇和许多杰出人物一样，是那种个人修养很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这种神奇的魅力为他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据当年的老游队员松五回忆说：“11月间，杨靖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来到我们队伍下。初次见他，就感觉他是个庄严的政治家，他的态度沉静，待人接物和蔼可亲，观察事物又敏锐，因此大家都爱戴杨靖宇。”

杨靖宇来到蜜蜂顶子的时候，也正是游击队里思想最为混乱之际。他到来后的当务之急就是稳定人心，说服那些想东渡的人改变主意，把队伍拉回去。

杨靖宇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开了不知多少次的大会、小会。他先给党员们开会，传达贯彻省委指示；然后又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小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那盏快要燃尽的油灯说：“同志们，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没有油，灯就点不着。咱们磐石游击队是磐石人民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还不是这样吗？没有根据地就像没有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

杨靖宇的劲没有白费，通过整顿和教育，游击队取消了“五洋”报号，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支队”（孟杰民为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踏上了回故乡——玻璃河套红石砬山一带的根据地之路。而完成了整顿任务的杨靖宇也离开了磐石，到海龙去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

可是，就在杨靖宇走后不久，游击队里就出事了。那是 1933 年 1 月，有一个名叫张博卿的地主找到了孟杰民，在对他说了一通什么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恭维话之后，一本正经地提出请他到伊通去收编那里的地主武装。孟杰民一听，认为这是件好事，便跟张一起去了。但他一到那里就被张给杀了。祸不单行，孟杰民牺牲后没几天，游击队又遭到了一个名叫高希甲的地主武装的袭击，这次损失更大，不但政委初向臣和继任总队长王兆兰牺牲了，而且不少队员被打散而离队了。就在这支队伍眼看就要彻底散了的时候，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赶到了这里，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好歹算是把这支队伍保留了下来，但毕竟还是伤了元气。

磐石的情况引起了省委的注意。省委领导认为，既然磐石那边离不开杨靖宇，那就叫他到那里去组织重建游击队。于是，杨靖宇正式来到了磐石，省委任命他为这支游击队政委。

杨靖宇的到来，不但使游击队很快得以重建，而且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扩大到了周围的伊通、桦甸、双阳等地。然而，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结果——日伪方面的恐慌和继而进行的“围剿”。

2 兵折巴彦

要说中共满洲省委在北满地区建立的抗日武装，首先得从张甲洲这个人说起。

张甲洲，黑龙江巴彦县人，1929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他是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学生。1932年4月初，他和几个在上大学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塘沽登上海轮，到营口后又改乘火车到达哈尔滨。张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很快就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张甲洲、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4人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的家在巴彦县北部山边的张家油坊，他家是地主，在当地小有名气，各种社会关系也比较多，这就为张提供了一个组织游击队的不错的根据地。那时候巴彦的日伪活动还不太多，张甲洲他们可以半公开地进行活动。

经过一阵还算顺利的活动，他们决定在1932年5月23日这天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帜。

这一天正是农历的4月18日，是每年一度的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张家油坊来了许多人，其中有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带来的60多人，巴彦县中学校长孔庆尧带来的60多人，有前后屯的自卫团长陈维新、侯振邦、米秀峰带来的60多人，此外还有远道来的一些人，一共有200多人。这么多的人涌进张家油坊自然挺显眼的，但不知内情的人却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知道张甲洲要在这一天结婚。不少人还不停地啧啧道：“你看看人老张家，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帮忙。”

前来参加张家的这场“婚礼”的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便拿出了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药和红袖标，打出了一面写有“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的一块空场上，对大家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然后正式宣布了这支队伍的编制和军纪——张甲洲为指挥，王家善为副指挥，孔庆尧为参谋长，张文藻为文书兼交通，郑炳文和张清林负责搞政治工作。最后，张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张甲洲这支游击队的旗帜一打出去，立即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前来镇压。这时，王家善的曾经当过省防军统带的父亲王知津和其他一些士绅出面找程求情。但好话说了一大车，才换来程绍廉一句算是给了好大面子的话：“这些人组织队伍可以，但队伍中不能有张甲洲，因为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们就要打！”

王家善回来一学这话，孔、王等人便对张说，你还是出去暂避一段时间吧，避避风头，等咱们力量强大了你再回来呗。张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但既然孔、王说出了这种话，张也就无法再和他们呆在一起了，他带着部分队伍冲了出去。等他们冲出重围后，张手下就只有100来人了，为了解决人员的不足，张决定要收编胡子队。

张甲洲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一支报号为“绿林好”的胡子队。他带着两个人走了30多里路才在一个叫大烟沟的地方找到了胡子头“绿林好”（苏占山），可和这位胡子头谈了半天，“绿林好”却说啥也不同意改编，只同意和游击队“拉顺线”（联合），说好条件之后，张就把他们30多人带到了游击队的驻地。但到了驻地后，“绿林好”他们却坚持不进屯子，而是驻在东南山里——因为他们怕被游击队给缴了械。以后这种戒心也一直没有消

除。行军时，他们单走，单住；他自己的指挥部仍然叫“帐房”，还报自己的山头，不接受游击队的番号，不和游击队混编，只是打仗时联合，包打一面。其最大的变化就不抢不夺了。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张甲洲提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都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确实挺有吸引力。绥化、安达、巴彦、双鸭山、庆城等地一大批爱国志士都参加进来了。张甲洲的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了700多人。

人多了、枪多了，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4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以后改为少先队）及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清一色的三八枪）模范队，是张甲洲重点抓的一支队伍。全队30多人全是20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24岁的朝鲜族小伙子。模范队的队员们“严守纪律，主张自己锄草、自己喂马，不拿群众东西，不打骂群众，不说黑话”。把他们叫做模范队，就是让其他各队向他们学习。教导队共有20多人，是一所流动军事学校，教官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陈海楼。此外，还成立了政治部、宣传部和娱乐部。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一般称房子或院落为窑，如果里面有枪，即为响窑）的战斗。在战斗中，张甲洲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智大勇。

7月16日，游击队在攻打龙泉镇内的“天僧泉烧锅”时，遭到了这个烧锅东家张振禄（外号张八瞎子）的手下炮勇的顽强抗击，游击队久攻不下。这时，张八瞎子在城里当警察中队长的儿子带40多个警察正准备打过来。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这时，张甲洲在全面分析了情况之后，果断下令停火，由他自己单枪匹马闯进了天僧泉烧锅，找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我们游击队来打龙泉的目的，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当前，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是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们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还给你们。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一听这话，心想，怎么样？那就得这么样了——“借”给他们吧！可是枪太贵了，“借”了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

就这样，游击队从这个烧锅里硬是“借”出了将近5000发子弹。

然而，10多天后，当张甲洲带队进攻一个名叫王四的大地主的“响窑”时，却遇到了麻烦。

当时，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5名警卫员去找王四谈判。王四说，只准张一个人进去，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给绑起来了。接着，王四的家丁又要缴张带来的警卫员的械，警卫员们要打，张使了个眼色，警卫员便打马回到了游击队报告情况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后，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立即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后便摆出了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天晚上，王四一看营长一时半晌也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叫张兴的炮勇把张甲洲秘密押到院外一个地主的家里。但他没有想到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张兴不但把人给放了，而且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吓坏了王四。他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县城里去了。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以后，召集穷人开会，然后开仓放粮、分

浮财，最后一把火烧了王四家的房子。一时间，那里的汉奸人人自危。

7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向无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千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1000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时刻关注着这支迅速发展着的队伍。8月中旬，一个名叫李育才（人称“小李先生”）的人奉省委之命来到了游击队。

当时，游击队里的许多人都感到这位李育才不是一般人，因为他一来就出任了参谋长之职。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这位被他们称为“小李先生”的人，就是日后名震四海的英雄赵尚志。赵尚志，辽宁朝阳县人。1925年在哈尔滨入党，这年11月入黄埔军校学习。没等到毕业就赶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赵尚志便退学回到了东北。从1926年到1930年这段时间里，赵尚志先后在哈尔滨、双城、长春、沈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因此多次被捕。据不完全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的这5年时间里，他在监狱里过了2年8个月。直到“九·一八”后，党组织花钱疏通关系，才把他营救出狱。赵尚志出狱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赵尚志到任后不久，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的事。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但敌伪力量却很强。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彦，他们决定联合在城外呼兰一带的原东北军的“才团”（因其团长叫才鸿）和一个报号叫“绿林好”的胡子队，一起攻打巴彦县城。

8月13日，他们比较顺利地攻打下了巴彦县城，但进城后才鸿一见许多人都要参加游击队，便觉得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天赐良机。他自称“东北抗日第4军”，又把手下的营长提为旅长，“绿林好”也带队投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苏旅长。才鸿以让张甲洲当副军长为条件，提出了吞并游击队的计划。张甲洲和赵尚志认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只能联合他们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们。于是便带着队伍很快撤出了巴彦县城，返回到洮安桥一带的根据地去了。

10月底，游击队再一次与“绿林好”联合打进了东兴县城，并在城里住了下来。可是，就在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各乡自卫团1000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见情况不妙，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了，只有游击队依托泰东公司的大院墙孤军奋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很大，伤亡了将近50人，赵尚志左眼下那三个月型伤疤就是这次战斗的纪念品。

敌人进攻很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不能再拼下去了，要撤！于是，游击队员们把西大墙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用两张大马爬犁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东兴城里的一点挫折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后，他们决定进行第二次西征，准备到安达、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师，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也就在这时，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再一次来到了游击队，并带来了省委的两条指示：

第一，把巴彦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

第二，要求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遵照省委的这两点指示，巴彦游击队在西征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第一政委，吴福海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各个

大队也都改成了团。

独立师在西征的过程中，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在这次西征路上，由于独立师与沿途的地主武装打了好几次仗，耽误了七八天时间，等到了离齐齐哈尔 200 多里的地方时，才知道原定要与他们会合的李海青、邓文等人已经因他们没有按时到而独自进关了。

情况变了，怎么办？

张甲洲与赵尚志商量的结果是，回师北上，奔汤原，去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师！

1933 年 1 月，独立师踏上了充满荆棘的回师北上之路。当独立师来到铁力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时，他们缴了索伦族山林队“索利营”的几条三八枪。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了。这些索伦人装备很好，人穿皮衣，马挂铁掌（而独立师的马却没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枪带支架，个个能骑善射，加之熟悉地形，直打得独立师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这样一连打了十来天，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算过了这一关。但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续遭到地主武装和伪军的多次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张甲洲率余部等了 4 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布要继续向汤原前进时，这些快要回到家门口的巴彦子弟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加之这时也快过年了，所以队伍中开始不断有人开了小差。这样，他们回到巴彦根据地姜家窑时，整个独立师就只有 70 多人。

只有这么几个人了，还怎么去汤原？张、赵等人不得不忍痛决定：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重整队伍。

1933 年 1 月 19 日，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子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剩下的人员，采取“磕大帮头”的形式，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大家把枪都带回去，把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我们大家回家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飞！”

独立师解散后，赵尚志没有回家，他悄悄潜入了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委汇报情况去了。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报告有关巴彦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说：

“……这次队伍的失败，在整个的革命任务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评价上讲，在整个检讨上是最可耻的惨败，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击，唯一的还是在主观方面自己就起了病态，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没有强的骨干，没有浓厚的政治力量来维系，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号召虽然在群众面前提出来了，但没有深入到群众里头去，不但群众，就是从做领导的同志起也都摇摆不定，未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他们脑中丢开了党的伟大任务，而把张甲洲及小赵的命令当作金科玉律忠诚地执行，群众没有坚决地拥

护我们的主张，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给他们，这个自然是归于我们领导的不正确了。在过去它是没有群众工作，在巴彦退出后，它也并不是有种什么很大的政治意义，不是在执行游击队的任务，是躲避着；不是进攻的，而是怕别人来打他的一种行动。虽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确的，省委明显地严重地指出许多任务，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领导与推动。在那里一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极，没有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精神，没有拿出革命的坚决性，来接受省委的指示信，并讨论去执行这个重要的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满苏区，拥护中央及红军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假如这个队伍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骨干，假如他有了群众工作，有了一定的游击区，在群众掩护和拥护之下能这样失败吗？它能使长期战斗的士兵跑开吗？如果党的工作开始，党内斗争起来，打击一切不正确的观念，要群众认识了党，群众在党的周围影响着，也不致于因突然的打击而走开了。但考察实际情形，我的同志小赵所给予群众是什么命令责骂，群众只说：‘李先生能干能说’，他们是从个人关系上认识他，却不是从党的方面认识他……“……我从他（指赵尚志）整个情形上考察他的意识并不是正确的坚决的了，他在表现上、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有时烦闷，有时也悲哀，他决定什么事情不是从革命的观点上出发，他是站在张甲洲的关系上出发，他这不是偶然的，在巴彦如此，当他布置什么事情时，他就说张甲洲的意见怎样，他这时才决定事的办法，这确是放弃了党的任务。就在红旗打出以后，他也是如此，他骂别人对事情是机械式的了解，所以布置事情不是经过会议讨论，事后也不通知谁，过去常说：‘我在政治上负责任’，而由他个人意志来支配一切，……他每日在指挥部与一般人谈笑，从未到士兵中去过，虽然召集士兵谈话，可那便是上级官长对下级士兵的训话一样。他否认地主富农路线，可是当张甲洲与东兴地主富农拉拢时，他并没有推动士兵们反对或他自己反对呀。而张甲洲在巴彦与地主富农勾结的事很多呀，……他是常在指挥部住，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张甲洲卖枪给地主也同意呀，张甲洲令士兵吃富农要给钱，他同意这个主张。他对群众不是以政治的影响，而是套个人感情……，他常与群众谈话，说的是国民党过去玩的一些把戏，和东北各军阀的勾心斗角，没有拿出我们的主张和办法来……

“从以上知道北满的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算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它是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一个产物，都是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罢了，不坚决与消极动摇的情绪，充分地表现出来……。”

正在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而感到上火的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们接到报告后，顿时怒从心头起，开会决定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

3 三起三落

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处于伪三江省的中心地带。中共满洲省委对于那里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认为我党为了领导松花江并下游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建立党独立领导下的工农义勇军，并对于“工农义勇军必须要有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要利用“他们去宣传民众，与保护民众运动”。

1932年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的汤区、格区、太平川区、洼区、萝北的鸭蛋河区等都建立起了反日同盟会。总计有会员1000多人，同时，在各地的党支部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了，着手建立游击队的条件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了。但就在这时，县委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党内的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抗日武装的建设。

为了加强对汤原工作的领导，省委在1932年秋天，专门派冯仲云以下江代表的身份前往汤原指导工作。

冯仲云，江苏省武进县人。1926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第二年入党。1930年后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委干事，在此期间被捕入狱。出狱后受党派遣于1931年10月后到哈尔滨，以商船学院教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5月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

冯仲云来汤原后，妥善处理了原有矛盾，和县委同志一同担起“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运动，建立红色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重任”。

不久，满洲省委又派来了军事干部李福。李到汤原参加创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成立游击队，自然就要解决枪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向全体党团员发出了捐款购枪的号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枪可是个值钱的物件，一支大枪价值约为6000斤黄豆！可是，由于全县党团员、反日同盟会会员积极响应县委号召，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硬是弄到了20多支枪。别看这些枪很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这毕竟是成立游击队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呀！

1932年10月10日，一支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的武装便在汤原县城北一个叫半截河的地方正式成立了。李福任队长、戴鸿滨等三人分别任三个小队的小队长。这支队伍是由40名党、团员组织的，其中7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这些人都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与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抗日前途充满了信心。但是，这支队伍在他们刚刚创立后不久，就连续遭到了几次严重的打击——

10月中旬在梧桐河遇险是他们建队后的第一次挫折。当时，游击队在中队长李福臣的率领下前往萝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然后根据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的建议，又返回到梧桐河地区，准备夺取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的武器。

到达梧桐河后，游击队员们都分散住到了各家各户，而把武器集中放到一个姓陈的人家的地窖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到这里来缴自卫团的枪的，可没想到一伙报号为“荣好”的胡子却打起他们的主意来了。就在游击队到达的当天，“荣好”带着一伙胡子突然闯进村子，他们号称要搜查鸦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结果，游击队那几条枪一条不落地被他们给拿

走了。

为了要回这些枪，李福臣和戴鸿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去找“荣好”。

他们知道这些胡子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有几份畏惧的，于是便对“荣好”说：“我们是南京政府派来到下江来的代表，奉命到这里来创建反日武装的。请你把枪还给我们。”

老好巨滑的“荣好”虽然搞不清李、戴二人的真实来历、不敢对他们玩横的，但也不愿意轻易把到手的枪还回来。他说：“你们说你们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可是空口无凭我怎么能信呀？请你们交出南京政府的下江代表的证件，我就把枪还给你们。”“荣好”的这招果然难住了李、戴二人，他们到哪里去弄证件呀？就这样，他们就只好带着队员们空手着回到了县委所在地——七号屯。一时间，大家都感到十分难过，有些人甚至开始悲观起来。这时，冯仲云对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次我们损失是不小，但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总结教训，还是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我们自己的……”

冯仲云的话给大家又鼓足了劲，可没想到不久以后，他们又遇到了建队后的第二次挫折。

当时李福臣已经奉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省委又派了一个被大家称为老杨的同志担任游击队长。老杨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搞到枪，而策动伪军哗变无疑是搞到枪的一个办法。11月2日，老杨奉汤原中心县委的命令，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一个伪军机枪连部分士兵的哗变。

当老杨带着人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预定的地点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情况有点对不对头。因为在伪军的营房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出奇地安静，事先商定好的信号也没有出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让戴鸿滨爬到院墙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可当戴刚刚爬上去探出头向里面看的时候，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多亏戴鸿滨躲得快，才没有被打死。老杨一见这种情况，知道伪军士兵的哗变是泡汤了，只好带着人空着手撤回了七号屯。

汤原游击队发展不顺利的情况引起了满洲省委的重视。为了加强汤原游击队的领导力量，省委又于1931年1月派绰号“士兵王”的王永江来到了汤原出任游击队的党代表。王永江来后，采取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措施。为了便于和其他各种武装联合抗日，他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自己报号“仁合”，游击队对外也称为“仁合队”。王永江这一招果然有效，没过多久他们就收编了分别由旧军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孙玉刚带领的山林队和矿警队。但是，这些被收编过来的人都有不少为游击队所不能容忍的坏习惯。于九江是吃喝嫖赌抢样样都干，孙玉刚更是过不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抽大烟抢群众东西，甚至还要带人逃走。这两个人虽经游击队党支部多次教育，仍不思悔改，最后，王永江决定先后把他们俩给处决了。兔死狐悲。于、孙二人被处决后，他们带进游击队的那些人便与原来的游击队员互相戒备起来。这时，一个叫“老来好”的家伙便趁机串通几个人，准备向游击队领导下手。

这年6月，游击队在从通河返回汤原路过一个叫孙臭嘴子窑的地方宿营时，“老来好”带着那几个人突然闯进了王永江和老杨的住处，杀死了王永江和支部委员裴锡哲等人，老杨也身中7弹，伤势严重。与此同时，“老来好”的那些同伙也解除了游击队的全部武装，拉走了两次被改编过来的新队员，逃往萝北方向。汤原游击队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挫折，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第二章

4 “左”倾关门

对于“左”倾错误对东北抗联的影响，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一书，在前言中写道：“……这时（1932~1933年左右，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刚刚兴起并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笔者注）中央机关仍在推行王明‘左’倾政策。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不顾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会议还着重反对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落后论’，打击那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会后，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被调离领导岗位；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都被斥为‘机会主义’。这样，就使满洲党的领导和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了不利影响。”

当年，“左”倾路线确实吓走了不想和我们党一起抗日的关东汉。

透过下面几段文字，我们就可以想见“左”倾路线当年是何等吓人了。

延吉县委书记小李子，因为开展团结原东北军地方抗日集团势力，如李杜、王德林等人共同抗日，而被斥为搞“上层勾结”，被视为右倾，被开除党籍；有一个名叫邓吉生的党员，本人工作表现很好，可他的哥哥却是一名伪甲长，尽管那位伪甲长在邓吉生的影响下在暗地里为我们作了不少工作，到头来邓吉生还是因为这一社会关系而被开除了党籍；我同盟军某部看到反日山林队“平日军”有一支镜面匣子和一支新套筒枪，就给缴了过来；有一个私塾先生，是我们的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工作做得较有成效，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暴露，但吉东局却要求他带领全家上队，这位同志有点不大同意，于是立即就被开除了党籍，使一个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工作有成绩的人从此消沉下去了。在延吉县王隅沟游击根据地，刚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便提出了“没收地主富农财产”的口号。这一口号一提出，不但吓走了那里的地主富农，而且不少中农也被吓跑了。使这个原来有两三千人的地方只剩下了一个小半。东满地区的党组织在处理抗日游击队与其他反日部队的关系上，无视其在反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反而过分强调他们反日的不坚决性，纪律不好等消极因素，甚至把救国军看成是国民党亲日派，把山林队一律视为胡子，并时常与其发生冲突，缴他们的枪。在处理根据地（当时自称赤区）与敌占区（当时称其为白区）群众的关系上，也犯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一些人敌视“白区”的一切，不允许“赤区”与“白区”的群众互相来往和做生意。凡是从“白区”来的人都可能被当做好细抓起来拷问。这样一来，人为地造成了“赤区”与“白区”群众间的对立和游击队的孤立。

像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太多了。在以上这几个例子中，那些党员就这样被开除了党籍，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见会有多少党外人员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了。

1933年5月31日，杨靖宇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也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自‘九·一八事变’迄今不能更大的推动起抗日战争，完成南满反日民族革命任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党正确的领导和我们党工作的薄弱。红军游击队放弃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任务，如唐聚五、殿臣、三

江好、兰司令、毛团甚至最坏的东江好等部下群众在成份上，铁路、煤矿、造船、綽丝、伐木、雇农等工人、农民占大多数，但结果还是遭受部分的失败，便是被国民党胡子来出卖，如国民党毛团长过去投降，胡子头殿臣、东江好的投降等，这充分他说明国民党胡子头……另一方面充分他说明该广大抗日的群众因得不到党的正确领导，以至遭受以上打击。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过去只是积极地怎样扩大自己的组织，对国民党胡子头领导下的武装团体不但不去领导他们怎样夺取下层群众和领导权，且时常地尖锐对立起来，以至红军游击队虽英勇，时时战胜敌人，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的打击，处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但以党的领导和工作上的薄弱，队伍又陷于孤立状态，不能更大的推动起反日民族革命战争。”

5 中央来信

东北虽然和当时的党中央天各一方，但与中央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执行着中央的有关指示（当然，这会不可避免地要有些“时间差”）。所以，满洲省委的同志们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来接收中央发来的指示。

1933年3、4月间，吉东局书记孙广英亲自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密信送给中共满洲省委。代理省委书记魏维凡、组织部长何成湘和满洲工会职委书记曹等人用药水将信涂出后，一封题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指示信便显现出来了。

全信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

- 一、日本占据满洲后的一般情况
- 二、满洲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 三、我们党在满洲的任务
- 四、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基础

既然是中央的来信那就快让大家阅读、研究吧！那年月还没有复印机，只能是靠人来复写，再传阅。经过传阅，这些有着极为敏感的政治嗅觉的省委委员们就有人看出问题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封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少人说，这是假的。理由有二：其一，这信来路不对——既然是中央来信，那就应该来自上海，怎么会来自莫斯科呢？我们和中央并没有失去联系，而且经常有交通来往；其二，这封信的内容不对——信里讲的与中央以前的文件精神不一致。持此论者还专门把信中的一些段落读给大家听：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是自己手里的任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在满洲群众运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胜利的前途。共产国际第12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人民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部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反对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反对投降和做资产阶级尾巴的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和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地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

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的革命情绪威胁之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才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效果。第四，必须慎重这一点：即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那么这不仅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地表明为着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与资产阶级奋斗“在两条战线上无情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右倾（对满洲的形势估计不足），对游击和罢工斗争采取取消的态度，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为着与其他阶级统一战线，而失去我们党独立的政治面目，对国民党有幻想等等——这是主要的危险。同时要反对各种的‘左倾’（如对游击队抱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统一民族革命战线估计得不够，李立三路线残余），必须成为一切行动及其指导的基础。……”

这里边的一些话明显与过去中央发来的指示不是一个调子嘛！不是假的是什么？

有人说这封信是真的。理由也有两条：其一是这个文件的内容比较符合满洲的实际情况，中央代表团驻在第三国际，中央驻国际的代表团与上海的中央联系还是比较很密切的，如果代表团在国际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帮助下，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起草指示后与中央交换意见再以中央的名义发下来，并不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其二是送来文件的老孙同志把这封信是怎么从莫斯科捎过来的，又是怎么交到吉东局的过程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所以，可以相信这封信是真的，而不是任何方面为了制造混乱或搞什么政治阴谋的产物。

经过大家这么一讨论，信的真假问题就解决了——大家认为这信是真的。既然信是真的，那就执行吧！这样，第二个问题就又来了——如何执行这个文件？是全面执行，还是部分执行？以×××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在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比较好，红军32军的旗帜既然已经打出来了，在群众中有很影响，因此，在那里还是要搞红军、搞苏维埃，其他地方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但魏维凡、老曹，省委职工部长金伯阳，省委民族委员会书记李泽民及省军委书记季等人认为，中央这个文件的指示精神，是决定东北革命运动战略方针的。指示信里没有说明可以保留红军32军和仍然可以搞苏维埃。相反，指示中倒是明确指出在东北为了反满抗日，应该进行统一战线，发展抗日罢工，领导农民反日反伪满斗争，建立人民革命军、人民政府。这是一整套反日反伪满的战略任务，应该全部贯彻执行，而不应该只是部分地执行。

到底怎么办？当然还要通过开会来解决——共产党的许多事情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来解决的。这是一种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好方法，也是共产党多年来一直坚持使用的一种有特色的工作方法。

6 改弦更张

1933年5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有党团省委主要负责人，哈尔滨市委、奉天特委、吉东局、珠河中心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认真地讨论了中央来信，统一了认识。最后，大家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对满洲党这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正确的指示”，一致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并号召满洲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转变党的路线，为中央所赋予他们的任务而斗争，为胜利的领导满洲革命而斗争。

在决议中，中共满洲省委认真检查了过去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所犯的 error，指出：“北方会议对满洲没具体的估计，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估计的不足，过早的提出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笼统的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的‘左’倾路线……，省委……扩大了‘北方会议’对满洲‘左’的路线，许多地方党部则是更‘左’的扩大了省委机会主义路线（汤原、珠河）。省委在一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满洲“特殊”论方面完全否认了满洲的具体的特殊情形，否认了满洲的党与群众没有1925年~1927年大革命及苏维埃运动的直接经验，不了解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现在阶段上阶段相互关系及其配置的特殊情形。没有看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很大部分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军官）为了维持剥削者的利益，在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及其军队中的士兵和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迫之下而进行着反日斗争的作用，错误地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傀儡作用，而与国民党一样的看待。在这样的错误认识之下，便不能运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便不能不对广大的反日群众实行关门主义。事实上不能不在蓬勃发展着的游击运动方面，在几十万反日游击队方面表现党的无能及束手无策，而采取了过早地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毫不迟疑地没收一切豪绅地主的错误路线。”

认识到以往的错误还只是改弦更张走上正确的道路的前提，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党的策略方针和党的具体任务——在目前东北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针，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东北的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

“中央来信中把东北的反日武装分成以下4种：第一种是“纯由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地主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也在广大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士兵和一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之下，而全为着自己的利益，才实行抗日战争，然而他们却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政治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的革命的轨道，而

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领导之下，他们对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未能找到正确的彻底的真正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第四种游击队，即赤色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纲领中彻底的反帝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步的发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做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其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政治影响不断地增加，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据此，中共满洲省委在决议中写道：“虽然我们的游击队没有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然而假使能运用正确的策略，如像中央所指示的分别对待各种游击队的下层统一战线以及某些游击队的上层统一战线，并且某些游击队能与之进行皮帝联盟的形式。只要合乎下列条件：（1）坚决反日；（2）不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能予民众以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等自由）；（3）不反对共产党，准许共产党以绝对活动的自由。我们的赤色游击队可以与之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组织，进行反日的战斗，保证我们的党在里面绝对的领导，便利我们赤色游击队顺利地向前发展，争得赤色游击队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任何游击队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订立反日作战的协定。”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央指示信给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指导思想上带来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还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其所具有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对此，魏维凡（1932年7月—1933年10月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后来回忆说：“‘中央来信’的精神，主要是肯定了东北的特点，规定了反日反伪满的统一战线方针，决定在东北不搞红军、苏维埃，而是建立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这个指示，为我们指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较之北方会议的决议，显然是比较合乎东北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工作的转变以必要的依据，也给东北的同志以兴奋。其深远影响，成为以后党在东北建立起来声势浩大的抗日联军的政治基础。”

中央来信指示无疑为中共满洲省委及全体党员指出了一条走出认识上和运动中的误区之路！

但是，笔者在这里使用虚拟语气给我们的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时中央不向东北发出这封指示信或者这封信指示到不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的手里，或满洲省委领导认为其是假的而拒之不执行，那东北反日斗争又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如果你感到无法回答或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思的话，那么，当你看到魏维凡的下述回忆后可能会有些新的想法，“中央指示信”仍然存在很多重大的问题，因此给以后东北党在领导革命运动中以不良影响：

“首先，‘中央指示信’没有指出东北党过去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而只是根据东北的一些情况，提出一些必要的转变。没有提出反对北方会议后在东北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就不可能肃清‘左’倾冒险主义行动。因而在东北依然以大城市为进攻中心，依然以组织对日罢工为主要任务。省委领导机关依旧摆在强大敌人统治的城市之一哈尔滨，所有工作人员，既没有固定职业，又没有合法身份作掩护，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随

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在城市工作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机会进行合法斗争。而我们老是满足于贴标语、散传单的工作方式。满洲省委编印的‘满洲红旗’经常到处散发。呼海铁路沿线，常常动员全线同志和赤色群众，一夜晚把我们省委的标语、传单都贴出去，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只是暴露党的力量，给群众以赤色恐怖（一个时期，因为我们那样办，敌人经常命令停车，搜查每个乘客，老百姓因此不敢坐呼海路的火车）之感！也充分表现我们‘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愚蠢和幼稚得很！

“第二，‘指示信’指出了反日反满统一战线，我们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可以和各方面的抗日武装订立攻守同盟，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对东北的各个抗日阶级、阶层，没有规定争取团结的政策，对瓦解敌人，特别是对伪满军政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没有提。就满洲省委所有负责同志当时讲，都没有能力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抗日武装队伍，只能提出与之订立攻守同盟，再也找不出任何政策依据。我们面对着伪满洲国各级军政人员的动摇、不满，谁也不敢设想争取他们……”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满洲省委的领导们真的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吗？到底是什么使他们丧失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呢？

读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在那几十年后某些人提出的“两个凡是”及那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指导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他老人家也说共产党最讲“认真”二字，但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革命导师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解放自己的思想能解放全人类吗？

笔者深信那些长眠于黑土地上的先烈们及他们幸存下来的战友们对这一点的感触会比我们深切得多！

第三章

7 威名远播

满天星，数不清，
东边道，出英雄
抗日英雄无其数，
杨靖字数第一名。

这是在东北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着的关于杨靖字的民谣中的一首。

细心的人会发现，从古至今，每当有大事发生都会出现相应的民谣。而这些民谣往往又是最能反映客观实际的。所以老百姓们都说：“众人口是天”。按照这一说法，如果要我们给白山黑水的抗日英雄们排个座次的话，杨靖宇当坐在第一把交椅上。

其实，不光是老百姓把杨靖宇排到了这个位置，就连敌人也是这样看的。1944年5月伪满警察协会出版的《满洲国治安小史》中说：“特别值得记述的，是满洲事变后在磐石附近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县委组织了武装游击队，并称为红军，到大同二年（1933年）9月，成全国（指伪满洲国）之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在磐石首先暴动。”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杨靖宇带领抗日队伍打日本的时候，他的名字本身就是战斗力，如果用个我们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说这个问题的话，这就好比许多名牌商品的牌子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样。

杨靖宇三个字到底有多大威力？我们只要听一下那些“过来人”是怎么说的就可以略见一斑了。

1933~1934年代表满洲党团省委巡视南满地区的韩光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件最有趣的事，即是唐聚伍兵工厂的一位马技师，反日情绪极高，在唐失败后到现在，已稍患精神病了。某日他访我军，到司令部后，即与杨司令和个别抗日军头子，谈起抗日工作等情况，谈至中途，忽有一人起来为马技师介绍说：‘此位即是红军之杨司令。’马技师听罢即忙立起，垂立地下不坐，静听我司令之讲话，并口口声声称道：‘这回我才得到真正抗日救国的司令了！’约一小时多，杨将讲话完，他跪地下叩了三个响头，然后坐下并说：‘这回我才有坐。’其后他还告诉我司令很多军事秘密，表示出反日的真诚……”

其实，杨靖宇这三个字不但在爱国群众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也征服了一些伪军的心。曾任抗联一军军部团委书记的赵振华在回忆录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1935年春天，有一次我们的部队从辑安走到桓仁县，部队走得人困马乏。这时天已经大亮，杨靖宇同志让大家休息一下，他就和一些领导同志研究如何通过公路的问题。正当这时，后面的追兵向我们开了火。由于敌人很多，把我们团团包围了。我们被迫退守在一个山上，居高临下向敌人反击。为了节省子弹，战士们往山下滚石头，砸敌人。敌人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就拼命往山上冲。等到敌人接近了，我们就开枪打。这样接连打死了很多敌

人。这次和我们作战的，是日本关东军和住通化的伪军廖旅。双方打到下午3点多钟，廖旅的人就问：‘你们是谁的部队？’我们说：‘是杨靖宇的部队。’他们不信，又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要真是杨靖宇的部队，就派一个人到中间地带谈判。’我们经过商量就决定派一连的徐连长去了。他去了以后，对方说：‘你们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你们常走的路日本人都下了卡子。’然后又问：‘你们子弹怎样？’我们的同志说：‘子弹是足的。’其实，这是撑着说，因为摸不清对方的情况不能说实话。这时对方又说：‘我们给你们一些子弹，你们今天晚上就可以从我们的防区撤出去。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连连长回来把情况汇报了，我们就决定如果他们给我们子弹，我们就把一些烟土送给他们。后来我们又问：‘怎么把东西送去呢？’他们说：‘你们先让出一个山头，我们把子弹搁到那。你们去拿。你们再把破烂枪支、衣服扔下一些。把病马、瘦马，不顶用的东西扔下一些，我们就可以交差了。’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也真的把子弹送来了。我们过去时，他们就往天上打枪，我们每个人都得了不少子弹，又把烟土给了他们一些，然后，趁着天黑我们就撤出去了。我们部队刚刚撤出，他们就和日本人接火了，打得很凶，一直打了一夜。到了天亮。日本关东军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打错了，他们就说：‘杨靖宇从天上飞了！’……”

杨靖宇何以能有如此大名？

打出来的！

自从杨靖宇来到南满游击队后，便带领游击队在1933年的前4个月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打退了日伪军的4次围攻。一时间，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以及杨靖宇本人声名鹊起，成为一面对各支抗日队伍都颇有吸引力的旗帜。

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1933年2月2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杨靖宇“担任政治委员领导队伍以后”，南满游击队战果累累，“大大的扩大了政治影响，队伍日益发展，‘二七’前后，增加队员50多名”，队员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工作中非常勇敢……积极”。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1933年9月8日在其巡视报告《伯阳通信第二号》中记载，当时许多自发抗日军队的下层官兵都纷纷议论说：“红军有好指挥官，能作战，倘若各抗日军都能加入红军，在红军的指挥下，早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了。”笔者认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伯阳讲的都是大实话，因为有许多材料可以为其作证。但是，他们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全面，因为杨靖宇名气那么大，并不完全是打出来的，还因为他有一个像大海那样能“容纳百川”的胸怀。下面这两件从众多材料中随便抽出来的事便可使读者略见一斑。

一件是关于赵旅和马团的。

所谓赵旅和马团，顾名思义，就是两支头头分别姓赵和姓马的队伍。赵旅的首领叫赵宝林，马团的头头叫马立三。这两支队伍是当时磐石一带实力较大的反日武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反日坚决，但对游击队却不太“感冒”。虽然杨靖宇对他们也做过工作，但他们却不怎么买帐。可是杨靖宇并不打算放弃团结他们。

有一次，赵旅和马团在玻璃河套北板凳沟遭到了伪满靖安军的重兵包围，虽然他们左突右冲，从太阳一露面一直打到日中天，却无论如何也突不出去。

这可怎办？赵宝林和马立三的冷汗立时就下来了。找谁来救呀？谁又能

救得了他们呢？找杨靖宇的游击队？他们倒是在这附近，可是咱以前对人家那态度也太那个了，现在怎么有脸去找他们呐？

正在他们犯难的时候，杨靖宇派人给他们送信来了。杨靖宇告诉他们说，你们暂时再等一会儿，我马上带人来救你们！

果然没过多久，赵、马二人就听到在伪军的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其实那主要是赤卫队、儿童团放的鞭炮声），伪军也一时搞不清楚出了什么事，陷入混乱之中。赵、马则趁势指挥部队冲出了重围。

战斗结束后，赵、马对杨靖宇不但感激不尽，而且心服口服。赵宝林握着杨靖宇的手说：“我非常惭愧，过去对不起弟兄们，这一回我算知道了谁是我的朋友。以后我姓赵的如果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磐石父老，天理良心不容。”杨靖宇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啦。只要我们能够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再一件则是和胡子有关的。

1933年冬，在玻璃河套一带兴起了一股好几百人的大绺子，大掌柜的叫“长山好”。这股绺子一出现，日本人和杨靖宇就都开始了说服工作。杨靖宇为此专门找过“长山好”，对他说：“长山好兄弟，你枪法好，有本事应用到抗日上来！”那“长山好”嘴里应着“杨司令你放心，我还有兄弟没来齐，3天后你听我的信儿”，暗中却和日本人来往，杨靖宇虽然知道他的这一套，但仍未放弃对他的争取工作。

转眼就到了第3天了，杨靖宇打发两个机灵的小战士去给“长山好”送信并试探他的态度。这两个小战士很顺利地通过了“长山好”的3道卡子——因为守卡子的胡子们一听他们是杨靖宇派来的，都一路绿灯放行，只有到了最后一道卡子，才有一个小崽子（胡子中的“兵”）提着六轮枪问道：

“哪来的？站住！”

“站住就站住，何必这样凶呢？”

“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不害怕吗？”

“怕什么？日本鬼子我们都不怕，还怕本国人吗？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

这时，“长山好”正在和日本派来的人谈得火热呢，听到外面说杨靖宇派人来了，吓得赶紧让日本说客“踏条子”（藏起来）了。自己出来见到两个小战士后，摆出一副大掌柜的派头说：“把杨司令的‘海叶子’（信）给我！”杨靖宇派来的那两个小战士并不害怕，对他说：“看来你就是大掌柜的了，可是不怎么礼貌！”“小小毛孩子，什么礼貌不礼貌的，快给我！……”“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都说长山好义气，原来是这样啊！”一听这话，“长山好”只好一摆手，说：“请吧！”进屋后，“长山好”看了信后就进里屋与日本说客商量夜里如何去打游击队的事去了。然后下命令说：“把这两个小崽子给我码起来（捆起来），等队伍滑（撤走）完了，就插了（杀死）他们两个！”

然后，“长山好”留下一个胡子看着他俩，自己带胡子们行动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战士对那个胡子说：“这位大哥，外边都走净了，你怎么办？”

“还不是留下来我们断后吗？”

“告诉你吧，这位大哥，长山好他想的美，咱们杨司令早就料到他这一

手了，这四周早就被我们卡住了，他休想逃走！这位大哥，我看你不如早点把我们给放了，咱们一起去见杨司令。”一听说去见杨司令，那个胡子就动心了，“那好吧，我就和你们一起找杨司令吧！”

当他们来到杨靖宇面前时，杨靖宇已经指挥游击队基本上打完了这一仗。

这一仗下来，“长山好”被打死，那个日本说客被活捉。这股绦子里的 70 多人参加了游击队。另外，还有 20 多个想回家的人则每人拿着杨靖宇给他们的 3 块大洋走了。

8 夜半枪声

1980 年春天，率黑龙江省代表团到靖宇县参加杨靖宇殉国 40 周年纪念活动的张瑞麟，在归途中专门来到了磐石县烟筒山镇。一踏进这个小镇，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便用急切目光寻找着。岁月沧桑，在小镇上已经很难找到旧日痕迹了，但张瑞麟老人心中那个关于 47 年前的往事、始终活在他心里的“曹大哥”的音容却十分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他的曹大哥名叫曹国安，原是北平疏文学院的学生，中共党员。“九·一八”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东北，领导武装斗争。当时，组织上给了他两个办法——一是在反日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二是打入敌军内部组织哗变。

从北平回来后，他先是在永吉县的老家组织起了几百名地方“大排”进行抗日斗争，但由于队伍成分过于复杂，领导权又握在地主手里，所以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跨了下来。

第一种办法没行，他又开始尝试第二种法子。他盯上的目标就是驻在乌拉街的伪铁道警备第 5 旅 14 团的迫击炮连。这个连原本是东北军的一个连队，“九·一八”事变后曾经一度抗日，后被日军收编，但士兵仍有抗日情绪。根据党的指示，曹国安利用该连招兵的机会，打进其内部。于是，他便和张瑞麟一起来到了乌拉街，要求当兵。

经过一点小小的周折（找保人）后，曹、张二人当上了一等兵，分别被编到 3 排和 1 排。他们一当上兵后，就开始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为了把更多的人拉到自己的身边，他们决定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结盟兄弟”的办法。没多久，他们就把串连起来的 20 多个人带到一个小庙里举行了正式的结拜仪式。大家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今后定要亲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任何危难时刻也绝不出卖朋友……。结拜之后，大家按年龄大小进行排行，结果曹国安成了老大哥。于是他便以老大哥的身份给弟兄们做指示，讲抗日道理了。那时候军队里有文化的人不多，曹国安很快便因假条上的字写得好、话写得漂亮而被连长看中了，当上了“贴写”，受到了信任。过了一段时间，曹国安又领来了一个名叫宋占祥的人，并把他安排到了 2 排。

1933 年 4 月，伪军 14 团奉命去吉林南山“讨伐”抗日游击队，这本来是个起义的好机会，但迫击炮连的连长让曹国安留在吉林市里照顾他的老婆孩子。曹对张、宋二人说：起义准备工作不能间断，进山后，要多对弟兄们做思想工作，抓住机会组织起义，不必等他。最好能想办法和游击队取得联系……

“讨伐”结束后，伪军 14 团到烟筒山临时驻防，迫击炮连驻在了镇南头的“成德源”烧锅大院里。那个院子本是一个“响窑”，土院墙有一丈多高，四个墙角上都有炮台。

不久，曹国安护送连长家属也来到了烟筒山镇。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和张、宋二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东北角上的炮台里，分析了迫击炮连当时的形势。他们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目前士兵反日情绪很高，如马上起义，可以有 80% 的人响应；

第二，驻地接近山林，起义后容易和游击队联系上；第三，时值农历四月下旬，青纱帐基本上起来了，便于以后活动；

第四，迫击炮连的这个烧锅大院远离营部和其他部队，行动方便。

几天后，他们确定了起义的时间为端午节的午夜，并规定口令为“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行动暗号是高喊“日本人来缴械了！”

要说这事也真巧，端午节那天午后，伪连长因被提拔为少校团长特地请一帮军官喝酒。当官的都去了，当兵的照吃高粱米籽，弄得大家气不顺。这时，曹国安他们三个趁机自己掏钱分别请本排弟兄们的客，大家吃着他们的菜、喝着他们的酒，也就愿意听他们的话了。

晚上，他们三个人分别对一些人打过了招呼，说夜里可能有情况，要警惕点。那些人心里也有数，便个个装做喝多了，和衣而“睡”去了。

午夜过后，大院里响起了“不好了！日本人来缴械了！”的喊声，那些装睡的骨干们立即从炕上跳了下来，其他人也赶忙跟着跑了出来，不一会全连100多号人就都在院子里集合起来了。就在曹国安带着他们准备出大门的时候，伪连长出来了。他问道：“怎么回事？”

“日本人来缴械了！”黑暗中有人答道。

“这是谁说的？”伪连长问，“弟兄们，不要乱，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半夜三更的，哪有日本人来缴械的事，日本人要是真来缴械，还有我这个连长在？现在大家听我命令，各排排长到连部开会，其余的弟兄们回去睡觉！”

曹国安一听，事情要坏，便当机立断，打死伪连长！于是，便对张、宋二人命令道：“干掉他！”

曹国安他们几个的枪一响，骨干们便纷纷响应。伪连长、排长几乎同时被打死和击伤。这时，驻在镇西头的机枪连那边也响起了枪声，曹国安趁大家带没弄清怎么回事，大声喊道：“弟兄们，日本人就要包围我们了，大家赶快跟我走！”说完便带着队伍冲了出去。

张瑞麟见曹国安和宋铁岩已经把队伍拉出去了，便喊上几个正在上夜班的工人，扛起迫击炮和炮弹跟着冲了出去。天亮的时候，队伍会集起来了。曹国安开始讲话了，他说：“现在我们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又是真正的中国人了，不再是亡国奴了。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手里的枪要去打日本鬼子。要抗日，就得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人多才有力量嘛！”大家说：“我们愿意跟着大哥走！”

曹国安说：“那好！我看咱们这支队伍就叫“抗日迫击炮大队。

下面，我们大伙选一下大队长、政委和中队长吧。”经过选举，曹国安、宋铁岩和张瑞麟分别被选为大队长、政委和第一中队长，另外两个骨干为第二、第三中队长。选举结束后，队伍即在曹国安的带领下向东南方的山林里奔去。几天后，他们在玻璃河套找到了南满游击队。他们受到南满游击队教导队政委李红光和正在那里传达文件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热烈欢迎，并被正式授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总队迫击炮独立大队”的番号。

9 新军诞生

南满游击队自 1932 年 6 月成立后，经历多次战斗，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在杨靖宇同志领导的地区起了作用，……杨靖宇的游击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魏抱—1964 年回忆说），在南满地区形成了以游击队为核心的一大批抗日武装力量。这样，成立人民革命军的条件就基本上成熟了。

1933 年 9 月 18 日，杨靖宇在磐石县西玻璃河套主持召开了中共磐石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将“红军第 32 军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虽然独立师成立时只有 300 多人，还没有我们今天一个团的人多，但却挺正规。该师在司令部下辖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以及两个团和一个政治保安连。杨靖宇任师长（也称司令）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任参谋长。

就在独立师成立的当天，中共磐石县委在全县 10 多处地方组织了共有 2000 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同时，独立师还向“全东北三千万民众”发表了一个成立宣言以及《告反日义勇军战士书》。成立宣言在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之后，郑重宣布：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是东北三千万民众的武装力量，一师全体战斗员热烈地希望，并欢迎工人、农民、士兵、警察、贫民、学生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游击队，共同地与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作战。更希望工厂一中、农村里、兵营中、学校里，广泛地组织反日团体，扩大反日战线，早日达到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统治的目的。”

在《告反日义勇军战士书》中，独立师表示，愿意在（一）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底；（二）允许民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三）允许民众在进行反日战争等条件下，与任何反日部队结成反日作战同盟。

今天，当我们认真查找一下当年各支抗日队伍所发表的文件时，就会发现，以上这两个文件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杨靖宇个人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能体现杨靖宇个人政治水平的应该说还是在独立师成立后（10 月 9 日）所发表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这个纲领明确规定了人民革命军的奋斗目标、斗争任务和重要对策。其主要内容是：拥护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对日宣战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中国，推翻日伪在东北的统治；武装民众，保护民众权利，建立东北民选的人民革命政府；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及分给反日战士与民众；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被压迫民族等。

独立师成立后，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中共磐石县委在 1933 年 11 月 24 日《南满磐石关于日满匪围攻东边道情形致省委报告》中写道：

“我军所到之处，到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各地群众自动杀猪置酒送给队伍，请求我们到当地去活动。”

其实，关于这一点，不光是咱们自己这样说，就连敌人也这么说——“人民革命军均规律整严，似无禁鸦片、海洛英、赌博等恶习”。在伪满军政部的一份名为“满洲共匪研究”的材料中写道：

“人民革命军以‘红色民众’为基础方能存在；对于民众，注意很深，

严戒着士兵胡做非为。……人民革命军这种军规肃然的民众态度，有益于民众感情的融洽亲和，加强二者的结合。”“1934年五、六月顷，第31号保线工场所属保线工人，因有红军要求，议定：每人提供1元8角5分的水袜子（一种胶鞋——笔者注）83双，提供给红军。同年7月顷，李德以同僚的捐款采购了誊写板，原纸五、六十枚，白露纸五十枚，铁笔五枚，手交陈万富。同年阴历十一月顷，李德采购豆油5斤，煤油2斤，蓝条绵布、棉花2斤、蓝线一轴、盐5斤，手交陈万福。同年十一月顷李德采购了白面一袋，提供给红军。”

伪通化省警务厅的文件上写道：

“红军的活动状态，与土匪完全不同，行军中到民家吃饭的时候，一定开付饭钱，拿去的東西也一定给钱，如果当时没有带钱，日后一走送到。”

伪军管区的文件上说：

“（人民革命军）收揽一般农民的方法：对于贫农极其恳切叮咛，宿营之际，使老幼睡在炕上，自己却睡在地上，使役农民的时候给相当的酬金。”

得民心者得天下。由于独立师深受群众欢迎，所以尽管在其成立后即面临着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却越战越勇、越打越强。独立师力量一强，说话也就有人听了。所以1934年2月21日，当独立师司令部召集南满带17支反日武装的首领来开会时，大家都来了。会上，他们一致同意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并发表了《抗日联合军成立宣言》，杨靖宇被选为抗日联合军的总指挥。当时亲临会场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选举总指挥部的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用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雀无声，选总指挥的17张票，16张写着杨司令。”到1934年9月份独立师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已经发展到800多人。

这一年11月5日，中共南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临江县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杨靖宇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组织中共南满特委的提议。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下辖两个师及各个直属队。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朴宗汉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曹国安分别任第1、第2师师长。

第四章

10 特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军占领东北后东北党组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做出决议：号召与发动群众，开展罢工罢课与罢市斗争，进行游击战争，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共东满特委在反日问题上是一点不含糊的。他们立即着手做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件是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接二连三地发出了一大批用于指导抗日行动的文件。其中有《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的紧急决议案》、《反对日本占领满洲告群众书》、《农民运动决议案》、《兵士运动决议案》、

《反帝决议案》等等。

第二件是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揭露日伪所谓“韩人自治运动”的阴谋，在群众中进行“真正的民族自治”教育工作。第三件是派出巡视员赴汪清、琿春、延吉、和龙等地，具体地检查并指导各地的反日工作。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共东满特委还是干了不少事的。但遗憾的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他们对那一地区的反日斗争的领导工作还是不得力的。这里面既有思想上比较混乱的原因，同时也有组织上不够健全（特委书记离职去省委，其他人工作不主动，汪、和、琿等县县委受破坏）的因素。

中共满洲省委看到东满的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去那里当特委书记，加强党对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这个临危受命的人就是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童长荣。如果谁要是以为中共满洲省委这次给东满派去的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话，那他就错了。这位肩负重任的书记，其实是一位只有24岁的安徽小伙子。别看他年轻，但却是一个有着较长斗争历史和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只要你看一下他的简历，便会觉得这个小伙子非同一般：

1921年他14岁的时候，参加安庆学生推翻省议会、驱逐省长的斗争；

1923年，组织领导安庆教职员的“索薪运动”和反对省议员的“贿选运动”；

1925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留学期间仍然时刻关心着祖国。从下面这封历尽沧桑得以保存下来的珍贵的信件中便可看出这一点——

母亲大人：

好久没写信回家了，劳你老人家挂念，心实难安。老人们或者以为我忘了家吧，其实我决不，我无日不想回去看看乡里的沧桑、家庭的状况、你老的平安！

想回去而不回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来回要百多元。——春假了，还是欲归不得。

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吧，——这是不能平呵，在社会未变革，上下未颠倒以前，——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五叔常说的‘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日本近日全国捕去千多革命者，但是劳农的反抗也就随着高涨起来，压是压不下去的。我在求学之时，听到或者看到这些事情，就常常不禁浩叹。——我家为什么这样破落？你老人家年老了，为什么不能得到事养？我读书之年为什么没钱读书？怎样能解决这些问题？

又听说广东东江和海南岛一带的小百姓全都赤化起来，……田契债据都

烧掉了……，——他们胆子真大呀诸长、诸兄、诸友皆问好！

敬叩金安！

荣儿三、二十四

在日本期间，童长荣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救中国必须实行彻底革命，扫除帝国主义的压迫，肃清国内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人民才有解放的可能和建立合理的新中国的希望。”

1926年，他被选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他带领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并组织起了“中国留日各届反日出兵大同盟”。日本当局将他抓进了监狱，但并没有使他屈服，后便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行将他驱逐出境。

1928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由于他在斗争中表现出色，很快便就步入了“高干”行列了——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1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工作，将他从河南调到东北，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1931年11月，童长荣来到东满后，立即着手整顿那里的党组织。他按省委的指示，改组了中共东满特委，并担任书记。然后便带领所属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各种反日团体，组织反日运动，建立反日武装。

由于童长荣和新的东满特委的出色工作，东满的抗日斗争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建立起了延吉、汪清、琿春、和龙、安图等抗日游击队。这几个游击队在建立之初，主要是通过从敌人手里夺和自己造这两种办法来获得武器的。在夺武器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绝活”。

日后名扬全球的金日成将军，是1932年时受共青团东满特委派遣到安图县明月沟创建抗日武装的。这年4月，他和李英培、金哲熙等人一起创建了安图游击队。

笔者在金日成的一本传记中看到了这样的故事，想来应当是安图游击队中发生的了。

这是一个革命老战士对日本评论家高木健夫讲的：“我体验过一件很有趣的事。

“有个时期，‘牛皮步枪，这个词很时兴。尽管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只要他们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口粮就会断的。于是，他们就去抢农民的牛来宰了吃。开头他们把皮剥下来扔掉，可是等牛肉吃光了，就把牛皮再捡来烤了吃。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等两三个敌兵来捡牛皮时，干掉他们夺取武器。我们把用这种办法来夺取敌人步枪的同志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在制造武器方面，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兵工厂，而且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

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虽然这是一个只有10多个人的地下工厂，主要是打制一些大刀、长矛之类的原始武器，修理部分损坏的手枪和步枪，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生产出了使敌人恐惧的“辣椒面炸弹”及威力更大的土炸弹——“延吉炸弹”。东满各县的游击队成立后，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各个游击队的力量也在战斗中逐渐发展起来了。据东满特委在1933

年 10 月所做的一份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吉游击大队下辖 4 个中队，汪清游击大队下辖 3 个中队，珲春游击总队下辖 2 个大队 4 个中队，和龙游击大队下辖 4 个小队。总计共有游击队员 700 多人，步枪 305 支，洋炮和别力弹（独子枪）约 300 支。此外还有 1000 多人的群众武装自卫队。

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之后，东满的抗日根据地便也开辟出来了。在抗日根据地里，先后建立起了 6 个区苏维埃政府和 20 多个村苏维埃政府。中共东满特委在《关于苏维埃建设工作大纲决议》中曾规定：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要“开设学校，除免费发给教科书，教育儿童外，在财政可能的情况下，儿童用纸、笔、文具之类，也应由苏维埃发给。”此外，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并办起了《斗争》、《两条战线》、《战斗日报》、《反日

报》、《少年先锋》等各种抗日报刊。

东满抗日运动的发展，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紧张。他们于 1933 年冬和 1934 年春先后两次调集兵力对那里进行大规模的“讨伐”。虽然这两次“讨伐”最后都被粉碎了，但却也给东满的抗日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反敌“第二期讨伐”时，童长荣率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和部分游击队员及群众在汪清县北部十里坪一带坚持斗争。1934 年 3 月 21 日，他们被敌人包围。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童长荣在指挥战士和群众突围时中弹了。这时一个名叫崔今淑的朝鲜族女战士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了重围。但是，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这位年仅 27 岁的特委书记在突围后便牺牲了。童长荣牺牲了，他的同志们还在继续着他的事业。1934 年 3 月，在延吉县三道湾张芝营召开的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上，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首先合编延吉、和龙两县的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然后再合编汪清、珲春两县游击队成立第二独立师。

但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后，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会上做出的这个决议去办——只成立了一个独立师，即“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这个独立师的领导班子主要来自原延吉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任师长，大队政委王德泰任师政委。

独立师下辖 4 个团，其中第一团是延吉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二团是和龙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三团是汪清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四团是珲春游击大队的老底子。

独立师成立后，就面临着来自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他们撤离了部分根据地，到外线去开展游击活动。自 1934 年冬到 1935 年春，他们共进行了 40 多次较大的战斗，打破敌人的冬

季大“讨伐”。

11 神经过敏

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受到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讨伐”外，他们还受着“左”倾错误的反复危害。东满可以说是“左”倾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在那里，不但有在整个东北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在作祟，而且还有一场颇具地方特色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所谓的反“民生团”运动。

“民生团”是1932年2月经过日本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组成的专门用于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组织。“民生团”鼓吹民族自治，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联合。

“民生团”出现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东满特委的关注。他们针对“民生团”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号召中朝各族人民对“民生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也觉得“民生团”的口号这时已经不利于它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这使民生团失去了支持它们的后台老板，于是就在这一年7月的时候解散了。“民生团”虽然解散了，但它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头脑里造成的那团阴云却一直没散。其实这也难怪，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们头脑中那根防奸反特的弦是很难松下来的。“民生团”解散后不久，1932年8月，中共延吉县委书记宋老头被日本宪兵捕去，一周后放回。县委在审查宋老头期间，抓获两名日本宪兵队的翻译，经审讯，供出宋老头是日本宪兵队派回来的密探。县委立刻把宋老头抓了起来进行审问。经过严刑拷打，那宋老头吃刑不过，便招出自己是“民生团”，而且还供出20多名“同伙”。县委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又把那20多个人都抓了起来，进行审问。

这一审问可不得了了，“民生团”分子越来越多了。据此，中共延吉县委认为：“民生团”不但还存在，而且已经钻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既然那些该死的“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呀。于是一场深入揭批“民生团”分子的运动便在全县党团组织中开展起来。中共东满特委根据延吉县委的情况认为，既然在延吉发现了“民生团”分子，那么在其他各县会没有吗？既然有，那当然也得反呀！就这样，这场运动又迅速波及到了整个东满地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东满特委把反“民生团”运动当成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来抓，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这样，一大批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军的骨干遭到严刑拷打、关押、枪毙。东满特委发动的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运动，还得到了敌人的“大力赞助”。他们不断向游击区内派出特务，还通过写假信等手段制造出一种“民生团”分子“大大的有”的假象。这就使得中了敌人反奸计的东满特委越反越来劲了，越来越多冤、假、错案也就应劫而生了。

这场运动给抗日斗争带来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光是它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的“裂缝”就足够后来好好弥补一阵子的了（在反“民生团”的运动受到打击的主要是朝鲜族同志）。在当时就有所谓“朝鲜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朝鲜共产党”的说法。

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正确态度。对此1978年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出版的《金日成——卓绝的传奇式英雄》

一书中这样写道：

“司令官同志（指金日成）了解了儿童团的生活情况之后，把所有的队员，连同马鞍山的队员都召令在一起，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关心儿童团员的生活。他说：‘你们说这些孩子加入了民生团，请问这些孩子是怎样加入民生团的，又为‘民生团’做了些什么？你们说说。……你们想一想，这些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再说他们的年纪虽小，但他们都誓要为父母报仇，干革命，所以在游击根据地解散以后，也不去敌占区，跟着游击队员来到这里。可是，不但没有很好地照顾他们，反而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当成民生团有关者，这是多么蠢的事，又是多么大的罪过啊。’

当时在座的人当中也有受民族沙文主义者影响的人，但他们在像阳光一样分辨黑白的司令官同志面前再也没有敢辩解。”

12 拨乱反正

当 1935 年到来的时候，敌人的“讨伐”和党内“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中共满洲省委也开始感到了东满的形势有点不太妙，于是便在 1934 年底派巡视员魏拯民急赴东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在如此关键时刻出场的魏拯民，人如其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本是山西屯留县人，是 1932 年 5 月才受党派遣从关内来东北工作的，而在此前，他一直是在关内从事地下工作的——早年在太原念书时就曾积极参加过反对阎锡山的学生运动。1926 年入团，翌年入党。1928 年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30 年受党派遣入国民党安阳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后又回到北平到北大听课，并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由于魏拯民有了如此丰富的经历，本人工作水平也挺高，所以他一到东北就被赋予了重任：先是任中共哈尔滨道外书记，不久就当上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在其担任书记期间，哈尔滨的工作是搞得不错的。此时，中共满洲省委把他调到东满来，就是希望他能改变那里的被动局面，扭转那里错误的工作方向，把大家领回到正道上来。

几乎就在将魏拯民派往东满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还向东满党、团特委和人民革命军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满洲省委在 2 月 1 日的指示信中，首先强调了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告诉东满特委，党领导的部队必须要与坚持反日的武装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才能顺利打破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讨伐’，才能迅速扩大反日游击战争，才能把自己形成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还告诉他们，1934 年冬天省委特派员提出的把东满的所有的山林队和“救国军务部”全部缴械的 3 项条件——“（1）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是“极其有害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应当立即纠正。”

其次，省委指示东满特委，要“人民革命军造成东满一带反日救国游击战争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为此要求“人民革命军应当站在主动的地位积极号召一切救国军、山林队……结成广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其形式可以采取共同指挥部的形式。”

2 月 10 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也给东满特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中指出：目前反日运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第一向安图、额穆发展，实现与该地反日队伍联合，进而与北满、东边道反日队伍的联合；第二向宁安、东宁发展，与该地区反日队伍打通联络。

关于“民生团”问题，吉东巡视员在指示信中明确指出，东满特委“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

魏拯民是 1934 年底到达汪清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下车伊始，他便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等把情况摸得差不多了，他便在东满党团特委和二军独立师师部所在地——延吉县三道湾的能芝营给东满的领导干部们办了一个学习班，给他们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信的精神，为进一步纠“左”创造条件。

然而，要想纠“左”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魏拯民给大家办班的时候，中共东满特委委员、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都因被怀疑是“民生团”分子而被关了起来，以致这两个人在不久后相继逃跑，朱镇叛变。

朱镇叛变后，东满特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为了免遭损失，只好向汪清县大荒崴游击根据地转移。并于2月末、3月初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

大荒崴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情况及今后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指出“在目前不论哪个民族，不分哪个阶级，只要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示不满与反抗，我们尽可能地把他们完全组织和统一于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周围……我们提出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工夫的出工夫，有人的出人，有什么力量出什么力量，把一切同情和赞成反日的都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并同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一个《反民生团斗争决议》，虽然决议中仍然说反“民生团”是有“必要”的，但指出了前一阶段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分清敌我两类矛盾，区别对待，不搞逼供信的问题。

大荒崴会议还改组了东满党团特委的领导班子。魏拯民和周树东分别担任党、团特委书记。

3月21日，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领导人在汪清县腰营沟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再一次指出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通过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待遇条例》，决定在1935年再创建绥芬河和安图两块游击根据地。

这次会议后，对独立师师团两级班子进行了调整。魏拯民带着十余名地方干部经琿春到苏联学习考察，在此期间他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要求和形成统一领导和指挥机关的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1935年5月30日正式宣告成立了。王德泰、魏拯民、李学忠和刘汉兴分别就任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参谋长。

5月30日，二军军部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二军政治部还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联合起来，提出“在东满，凡是反日的人员和部队，不分党派，不论军头，都联合起来，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集中一切反日力量，统一东满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加紧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一致的行动和指挥之下，完成我们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的倡议。

13 分兵远征

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各团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历次指示和东满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二军分兵向安图、额穆和宁安、东宁地区发展，扩大游击区的战略决策，开始行动。具体的行动计划是：

二军独立师一团主力部队由团长安凤学、政委周树东率领，于 1935 年 4 月末，从安图县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出发，向敦化、额穆、蛟河、舒兰等地进军，目的是在这一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并与在哈东地区活动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打通联系。和他们一起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还有第二团的一部分部队。

三、四团在军参谋长刘汉兴，三团政委金日成，四团团长侯国忠、政委王润成等率领下，于 6 月间向东宁、宁安进军，以扩大游击区，使之与吉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并争取和在吉东地区活动的四、五军取得联系。

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 2 团的第 2、第 3 连组成西征队，于 1935 年 8 月从安图县车厂子出发，经抚松向蒙江地区进军，以期与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取得联系，实现两军联合作战，将东满和南满游击区连成一片。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二军部队进行远征行动的话，那可以说是边走、边打、边发展。吉林省革命博物馆王瑛等人讲述的“夜摸敌车”的故事就发生在一团主力远征的途中：

“1935 年 5 月 2 日夜晩，二军 300 余名战士，穿过横在敦化、蛟河之间的密林，沿着铁路向哈尔巴岭前进。队伍来到距离哈尔巴岭车站不远的地方，选择有利地形埋伏下来。深夜 1 点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了一辆日寇警备专用装甲车，由于队伍埋伏地点与铁路较近，装甲车疾驰而过，在战士眼前卷起一阵旋风。待装甲车开过，几个战士跃上铁道，不大一会儿，约有 20 多米长的铁轨被挪下路基，约有半点钟，由大石头方面发出的 202 次特别列车，吐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装着几百名酣然入睡的伪军官。突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车头猛然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也陆续脱轨倾覆，引爆起火。这时，人民战士向列车发起了勇猛的冲击，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寇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不甘他们的失败，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射向正在冲锋的我军战士。战士们士气高昂，手榴弹像下雹子一样掷向车厢。顷刻间，敌人的机枪变成了哑巴。车厢里传出来悲惨的喊叫声。车内的残敌，相互叫骂着，撕打着，拼命争夺逃路，我军战士登上车厢，把他们拎起来，押下了车。“战斗结果，俘获日伪军官 13 名，缴获手枪 10 支，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反动气焰，他们在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上也不得不承认：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后来，当地人民群众把‘夜捣敌车’编成民谣，其中《灯花爆》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词中这样写道：

“灯花爆，喜事到，
哈尔巴岭的火车掉了道，
城里的鬼子发了毛，
慌里慌张把兵调。
第一团，有功劳，
不用地雷扒铁道，

火车到这底朝天，
鬼子到这把枪缴。
中国地，中国山，
中国铁道中国管，
鬼子要想从此过，
留下脑袋当买路钱。”

1935年8月底，第二军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2团两个连150人与活动在蒙江的第一军第二师的部队在蒙江北部的那尔轰胜利会师。为庆祝这次会师，两支部队在一起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大会。当年曾经参加过这次会师大会的松五回忆说：

“（会师）当天开军民联欢大会，有抗日军民双方参加。在大会上二军代表李学忠讲话，略谓：‘一军在南满，二军在东满，两军相距甚远，在敌人包围封锁之下，两军今能会师此是不容易的……’。次由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2师师长曹国安讲话。会后双方拿出自己的特长技能来演习，二军抛手榴弹，一军抛军刀，并由两军士兵及指挥官完全同意之下订立竞赛条约，有效期一年。其条文：（一）为全部换三八式步枪而斗争；（二）我军完全变为铁军；（三）互相供给经验。此条约当时经过双方负责者签字，由即日起发生效力；同时为了纪念两军之会师，双方交换了干部和互赠礼品，如一军给二军一个妇女干部，二军给一军一个炮手，一军送给二军两支匣子枪，二军送给一军一些手榴弹。”其实这次大会还不是正式的会师庆祝大会（其中有关大会的情况似乎也有些出入），直到9月末，杨靖宇率第一军军部及教导团抵达蒙江后，才干10月4日在距那尔轰10里的老龙岗正式举行会师庆祝大会。

现在可以查到的不少材料上都记载了有关这次会师的情况。1935年10月4日出版的《人民革命报》的一张号外上，在《反日前途日趋顺利》的大标题和“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军事力量总配合”的副标题下刊了如下消息：

“10月4号，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与东满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之一部，于×××地接头并举行会晤式。首由东满二军代表宣布开会，报告东满革命形势与第二军发展情形。次由南满第一军军长演说，大意谓：我人民革命军向以抗日‘救国为天职，四年来与日匪血战，屡获胜利’。今日得与东满二军接头，更为光荣，因我两军战士，均奋勇冲锋，方有今日两军之会晤。此后我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一二四五六军与各抗日军，共同组织东北抗日联军，更能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顺利地打出日匪云云。”在同年12月14日出版的《人民革命画报》第67期上，登有3幅生动的钢笔画，反映了当时大会的热烈场面。以下是画报栏头上的原有说明：

“上为军民均到一二军接头式的会场，×主席团安配军民所站的位置后，进行会议的光景；下左为会议开到余兴的日程，上面有×的二军西征队队员苏联式的跳舞，配合军乐来进行，而得到满场军民的欢迎招手；下有为会议完毕后，二军西征队抛手榴弹，与一军画一邵贼本良的×象，以机关枪扫射他等的军技演习，来威胁日满匪与观望群众高举红旗欢呼胜利万岁的光景。”在大会以后，东满和南满的党政负责人一起商讨了许多重要问题，并决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共同夺取安图县城做为抗日根据地。

这次以会师的热闹场面与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相比的话，那还是微不足道的。研究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的专家们认为：“这次会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打通了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和两军的关系，消除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便于今后密切协同作战，并且为沟通东满、南满党组织与抗日部队联络的开端，使两军指战员认识到各自的斗争并非孤立，它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斗争的整体的一部分。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威信，鼓舞并增强了广大抗日战士与群众的胜利信心。”

此次会师后不久，李学忠率二军部队回师安图，一军二师则留在了蒙、桦、抚边境一带活动，杨靖宇率一军军部直属队绕道桓仁、宽甸至辑安与第一军一师会合去了。

第五章

14 十三条枪

赵尚志不是党员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消沉下去。坚定刚毅的他对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仍然是那么执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于1933年3月来到了在宾县一带活动的反日义勇军孙朝阳的队伍中当了一名马夫。

金子在哪里都是亮的。赵尚志来到孙部不久，孙便发现他手下的这个马夫并非等闲之辈。那是在一次作战中，孙部受到敌人三方面的攻击，处境十分危险。这时，赵尚志站了出来，他对孙朝阳说，咱们不能这样单纯防守，应该以攻为守，去打宾县县城。孙依计而行，果然打下了宾县县城，部队也转危为安。这一下，孙朝阳看出了原来让赵尚志当马夫实在是埋没了他，于是立即下令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参谋长。1933年7月间，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对赵尚志的问题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县委领导们肯定了赵的革命积极性，并对中共满洲省委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而开除他的党籍提出了疑义，随后向省委反应了这一意见，建议省委恢复赵的党籍。与此同时，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关化新派崔钟鸣和侯后刚到孙部找到了赵尚志，把县委的这一决定正式通知给他。同时还告诉赵尚志，现在队内的李后东、李根植、姜熙善等都是党派到队伍中来的，并为他们接上了关系。

8月份的时候，孙在再次攻下宾县县城后没有采纳赵提出的要立即撤出的建议，遭到敌人的疯狂进攻，部队损失惨重。当其撤出来的时候，孙朝阳已经是心力憔悴，抗战信心不足，做出了带队进山的决定。

赵尚志不同意孙的这个决定。他说，目前应该总结教训，重整旗鼓，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积极地进行抗日游击活动。但孙根本听不进去，于是赵便请示县委，要求把我们党掌握的力量从孙部拉出来。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接到赵的请求后没有同意，因为省委曾经明确指示在反日义勇军中不要采取哗变政策。赵要把人拉出来，这不又与省委指示不符了吗？

赵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他也就只好随孙部一起进入了大锅盔山里。可就在他们进山不久，敌人派来的奸细也跟了进来。那个奸细对孙说，他是关内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派来的，让孙和他一起进关去领抗日经费。赵觉得这事有点不太对头，便劝孙不要上当，要提防着点。孙本来觉得这是件好事，听赵这么一说，心里就有点犯核计。来人一见这种情况，便对孙说，赵这个人不是善茬子，他不同意你去是别有用心。还说，赵准备杀掉你，把队伍拉出去。你应该把他扣起来或者趁早将他干掉。

人在不顺利的时候本来就容易疑神疑鬼，孙朝阳此时正是这样。听了一番挑拨离间的话后，他顿起杀赵之念。

就在孙与那个人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没想到隔墙有耳。一个名叫王德全的战士把这些话都听去了。这个王德全本是巴彦游击队的一名队员，说起来也是赵的老部下了。听到这些话后，王德全马上找到赵，将这一切告诉了他。赵听了他的话后，立马找队内的几个党员到一起，决定立即离开。当晚，赵尚志、李后东、李根植、姜熙善、王德全、姜甘昌、金昌满等7人带着一挺机关枪和11支大小枪离开了大锅盔山。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满洲省委得知赵尚志他们已从孙部哗变出来的消息后，都十分重视。县委给他们派去了朱新阳、李福林等同志和枪支、做冬装用的棉布和棉花，使他们感到了党的温暖；省委则专门派出了省军委负责人

张寿钱，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前往珠河。

这位张寿钱，就是今天尽人皆知的李兆麟将军。他原名叫李超兰。辽宁辽阳县人，1931年11月在北平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2年跟随中共地下党员冯基平回到他的家乡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并在这一年11月受中共奉天特派员遣到本溪煤矿搞工运工作，1935年5月后又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

张寿钱来到珠河找到赵尚志和中心县委的同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和他们在一起进行了学习讨论。大家对中央“指示信”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然，最高兴的还是不久前被省委以右倾名义开除党籍的赵尚志了。在这一指示精神鼓舞下，中共珠河县委及赵尚志与张寿钱一起对如何建立我们党自己的抗日武装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做出了以下5项重大决定：

1.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为队长；2.在游击队内建立党团组织，李福林为党支部书记，李启东为组织委员，朱新阳为宣传委员，李根植为青年团小组组长；3.为加强和保持党对游击队的领导，建立起了其与县委和省委经常接头的地点，并要求省委经常派出巡视员到游击队检查指导工作。

4.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与其他反日义勇军（特别是孙朝阳部）的通信联系，与其订立反日作战协议；

5.将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暂定在石头河、板子房、黑龙宫一带，待队伍扩大后再向延寿、方正、五常、双城一带发展。1933年10月10日，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现尚志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虽然这支队伍只有13人和13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条不紊。哈尔滨反日总会的代表、珠河中心县委和农民自卫队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赵尚志带领全体游击队员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一成立，便显示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特色来了。当年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的13名“种子队员”之一的朱新阳后来回忆说：

“游击队成立初期，在铁路南三股流一带活动，每到一地，必召集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并帮助群众推磨、担水，晚上就睡在群众家地下，纪律严明，很受群众欢迎。因为人数少，赵尚志也和大家一起轮班站岗。到了冬天，下起了大雪，可大家还没穿上乌拉。正在为难的时候，铁路北的一个朝鲜族同志来队，提出抓日本走狗解决乌拉，我们非常高兴，很快实现了。从此，便没收日伪汉奸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

游击队成立后，便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此，他们先后缴了三股流一带的好几个地主大排队的枪，杀了一些汉奸恶霸，扫荡了三股流周围五六十里内的日伪政权，建立了农民委员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组织。

不用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今天，我们从抗联老战士刘云阁回忆他当年做为一个小长工看到的情形，便可见这一过程之一斑：

“一天晚上，大雪纷纷扬扬，我们几个小伙计正坐着闲聊，忽然听墙外有人来回走动。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们住在山里有个规矩：遇到什么情况，不准说话。脚步声停了，只听屋外有人问：‘里面有人吗？’我们之

中的郭文彬答道：‘有人。’说时，我们点燃了一块‘明子’。不一会从外面进来七、八个人，他们大部分都手持扎枪头，只有站在最前面那矮个子腰里别着一支六轮手枪。他十分爽快他说：‘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就走，有吃的吗？’我赶紧下炕，从锅里盛出一盆大棒子粥，忙说：‘你们饿了吧’这些人并没有说什么客气话，每个人盛出一碗蹲在地上吃了起来。那个矮个子一边吃一边叮嘱说：‘可不要让二保（指日本组织起来的汉奸队）知道啊。’他们吃完饭，说：‘蹲在屋地上合合眼就行啦。’这时我躺在炕上，瞅着这些不速之客，心里纳闷，他们是什么人呢？待人这么和气！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大概是午夜时分，这些人悄悄地走了。不大一会，他们又匆忙回来了。这次不像刚才那样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走进了屋里。一进屋就说：‘快点上灯’，我被响动声惊醒，睁眼一看，除刚才那些人之外，还带来一个五花大绑的朝鲜族人，被他们推着踉踉跄跄地进了屋，然后又把这个人吊在高高的梁垛上。……天大亮时，他们把那个五花大绑的人带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被抓来的那个人是哈尔滨到一面坡这个区段的特务头子。他们临走时，留下8角钱，说是给苞米^糗子和盐钱……

“从这以后，他们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渐渐地熟了，也跟我们讲实话了。……令我们惊喜的是，那个矮个子、黑脸膛、头戴狗皮帽子、身穿半截多处磨光了皮露出一绺绺羊毛皮袄的人，原来就是流传在老百姓之中的抗日英雄赵尚志！”

如果说上面的这段回忆反映出了当年游击队所进行的秘密活动的情况的话，那么，抗联老战士李春山、张青林、张俊丰、邱岳五等人讲述的“赵尚志土炮攻宾洲”则反映了当年斗争波澜壮阔的一面：

“1934年3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赵尚志、张寿钱率领游击队员50多人，义勇军‘黄炮’队伍100多人，向宾洲进发。城内的党组织早已按游击队约定的时间做好了准备。联系的口令是‘冬草’，‘春活’。……当游击队到达城下时，城内敌人已经发觉，日寇守备队、伪警察骑兵团、山林警察队等早已在城上固守，并有伪大排、商团武装配合。由于城墙坚固，护城河又宽又深，游击队没有重型武器，怕攻城不下，便不战而归。

“游击队认真总结了没有大炮，摧毁不了敌人城防工事，打不进宾州城的教训。赵尚志发动战士们想办法造土炮，战士们在杨家烧锅弄来一根有碗口粗、7尺长的铁管子，利用古代火炮的原理设计了一门土炮。他们在铁管子外面镶上柳木，用铁丝一道道地缠上，配上炮架，再把炮涮上黑色，蒙上红布，分辨不出是土炮还是钢炮。

“做好了攻城准备之后，5月14日，赵尚志给宾州城里的伪县长李春魁打电话，问他是接还是打。李回答说：‘别说你是抗日军，什么军我们也不接。’同天上午，张寿钱政委作了攻城战斗动员，重申了进城后不要损害工商业和居民等纪律。下午游击队动员了400多人，义勇军‘黄炮’、‘吕绍财’、‘占九营’、‘九亏手’等队伍共1000余人，加上400多助战的乡亲们，在赵尚志的带领下，分三路向宾州城进发……

“游击队到城墙附近，开展政治攻势，向伪军们喊话道：‘伪军弟兄们，你们不要当亡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城内日伪军十分恐慌，1个小时内向哈尔滨打了7次电话告急，并不停地向城外无目标地射击。游击队一面唱着歌，一面高呼口号，一时声势大振。伪军长官听后十分恼怒，下

令向城外射击。游击队战士喊道：‘伪军弟兄们快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用炮轰城了。’伪军长官接着喊道：‘弟兄们别听他们吹了，他们没有炮，只有国军和皇军才有大炮。’一个战士气得骂道：‘你这个不知死的东西，吹不吹你就等着瞧吧！呆会儿叫你尝尝滋味。’这一骂日伪军恼怒起来，又向城外乱射一阵。这时，赵尚志仍然没有下令攻城，游击队战士严阵以待。

“夜里1点多钟，伪军情绪散了下来，只有日本守备队到处督战。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打一阵枪，走过之后，枪声就稀落下来。此时土炮的射击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炮膛里大约装进了20多斤火药，14~15斤碎铍铁。夜里两点多钟，赵尚志一声令下，守炮战士点火放炮，一声巨响，只见火光一闪，一条火龙直落到敌人的阵地上，只听一片惨叫声。游击队突击队和少年连的战士，冒着浓烟冲进城去……”

就这样，到1934年的夏天，珠河游击区已经扩展到了宾县、延寿、五常、双城等县的一些地区。这一年的7月，各地代表来到三股流开会，成立起了珠河县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长。

农民委员会虽然不叫政府，但在人们心目中它就是政府。老百姓一见到吴景才就叫他吴县长，吴开始时还一再向他们说，我不是县长。老百姓则说，老吴你别客气呀，我们说你是县长，你就是县长！于是，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而老百姓们则在他的带领下，拥军支前，侦察敌情，铲除敌人的密探，为游击队传送情报以及成立地方武装配合游击队作战。珠河一带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群众都这样称呼根据地）。

15 凶信频传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在珠河地区存在好几十个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的队伍。这些人除了在反日这个问题上与游击队还能讲到一起以外，其他就很难找到一样的地方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觉得游击队不是正经络子，对游击队存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因此，游击队开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打算，队内的关门主义思想还很重。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他们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了他们的这一错误：

“关门主义非常浓厚——经常有几十人跟在队伍后面数日，要求入队而被拒绝，队伍几乎每天数人以至十数人下队，请假归队的不要，这是关门主义极严重的错误，队伍每到一地，群众热烈地要求组织反日会，而你们只以派组织员来敷衍之，地方上武装组织热心要求上前线而被拒绝，最好的反日义勇军（如黄炮队）愿与我们经常联合作战，而你们甚至企图采取分离和疏远的策略，在一切义勇军中。甚至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义勇军中（如黄炮铁军等）没有组织群众性的反日会，在反日游击队中党的组织仍然是狭小到不能允许的程度。”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满洲省委在 1933 年 12 月 31 日在发给珠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指示信中对游击队不能与反日义勇军联合作战和对义勇军抱有一些错误认识提出批评，并要求游击队在扩大现有武装的基础上，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与反日义勇军订立反日协定。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赵尚志于 1934 年 3 月在中东路铁道北的秋皮屯，召集在珠河一带活动的各种义勇军首领“爱民”、“青林”、“北来”、“七省”、“友好”等人，开了个“诸侯会”。会上，赵尚志根据省委关于游击队与义勇军联合的三项条件，与各路“诸侯”们一起通过了反日通令，并协商成立了以赵尚志为首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

“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相继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特别是在宾县三岔河一战中消灭日伪军近百名，使得赵尚志和他领导的队伍的影响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主大排和伪自卫队，如黑龙宫和宾县七区的大排等，也被迫与游击队取得联络，甚至随同作战。一时间各种武装队伍都换上抗日的红袖标。

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之所以要开扩大会，那当然是因为本来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某些人却又恰恰是少不了的人物时，所要采取的一种办法。赵尚志这时虽然不是党员了，但讨论游击队问题没有他又不行，所以他也被扩大到这个会上来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研究改编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原则和计划。由于省委有明确指示，所以这件事在开会的当天——1934 年 6 月 28 日就定了下来了。于是第二天的会就是包括被改编队伍在内的全体人员的大会了。会上，宣布和通过对这些队伍进行改编的决定，同时“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宣告成立。

“哈东支队”在编制上采取“三三制”，支队下是总队，总队下是大队，大队下是中队。全队共有 450 多人，其中有 9 个中队（180 多人）是由中共领导的队伍，实力最大。这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赵尚志都是当然的支队长，同时他还兼任第一总队的队长。政委则由张寿箴担任，原来的大排队头子黄英（人称黄炮）任第二总队长，原来的黑龙宫保卫团团团长曹德生任第三总队长。此外，还设立了骑兵团和教导队及少年队。

哈东支队成立后，赵尚志手下的人多了，枪多了，活动范围也大了，但问题也就多了起来。原因很简单，进来的人太杂了，有些人参加联合军本身就是想借赵尚志的牌子来图个人目的的。关于这一点，中共珠河县委在 1933 年 12 月 25 日的报告中说：“队员现在的情绪，不如已往，已往九、十个人的时候，除了一个群众之外尽是同志，但是现在队员已达 40 名，内中还只有这几个同志，并且这几个同志中多数是韩国人。……但最坏的队员要算是由朝阳此次叛变的第 3 队，他们在一来游击队的时候都这样说：‘赵尚志的队名誉也好，也敢干，所以他们绑许多值钱的票，所以一心要来咱队，但到这队以后才知道这个队并不是像胡子那样绑票，也不像胡子队的随便，虽然有几个钱，并不挑片子，一举一动都有规定，甚至吃饭都要限制 15 分钟，他们一看之后，当天就走了两个，没有走的人，虽然不反对这个队，但是表现出不满意和极苦恼的状态来。”

哈东支队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和于九江队的冲突以及黄炮和铁军队的叛变。

7 月中旬，哈东支队二总队攻打五常县失利，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一总队在乾松顶之战中也没有取得胜利和第三总队和于九江队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总队长黄炮便擅自带人逃回了黑龙宫。

黄炮原本就是黑龙宫一带大排头子，他之所以参加了游击队，完全是因为当初游击队发展十分顺利，哈东地区的抗日大潮高涨的形势下的一种权宜之计，现在形势变了，他也就跑了。黄炮带人跑了以后，原来归顺游击队的铁军队也跑到九千五镇一带投奔于九江队去了。

于九江原是一老胡子头，“九·一八”后也打出了抗日的旗号。他与游击队的关系可以说是不疏也不亲，6 月份时还与游击队一起有过协同行动，但在游击队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他的那张脸也开始“晴转多云”了。

为了说服和争取于九江一起抗日，赵尚志带哈东支队从乾松顶子到了八区，经过一番不太容易的工作，于九江终于同意与赵尚志一起进攻延寿县城。但在队伍经过三岔河附近的一个姓徐地主大院时，那个地主却说啥也不让他们过。为了不误战机，赵尚志下令武力解决，缴了他的十余条枪，罚了一千发子弹。但这样一来，暴露了攻延寿的企图，只好临时决定东进，到宾县南部去建立新的游击区。

于九江虽然与赵尚志订立了共同作战的协定，但却耍两面派，他乘赵尚志带队东进之机，闯进了宾县和珠河的中东路南、北，包括游击区在内的一部分地区，到那里收捐缴枪，把哈东支队的游击区划分为各个山林队的地盘。还到处说：反日军缴山林队和义勇军的枪，他们要是胜了还得收拾我们。听了于的这些话，许多原来支持抗日军的地主、豪绅都开始改变了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率队回到了宾县八区。他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印发哈东支队《告反日抗满义勇军书》，揭露于九江及黄炮、铁军之流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经过宣传，许多人又转变态度，一些被于收编的大排也脱离了于九江队投奔哈东支队。形势一有改变，哈东支队的其他领导人便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于九江已经成了孤家寡人，到了该收拾他的时候了。于是，就派部队到于九江队的后方，将其后方的一些家属抓了起来。这一下可坏了，于九江到处说哈东支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即于的地盘），把一些本来已经脱离于的义勇军、山林队又窜拢到一起，联名向哈东支队写信下战表，并主动向哈东支队发起进攻。虽然他们的进攻被哈东支队打退了，

但却抓走了哈东支队执法处的 19 名人员。后经延寿县警察大队哗变出来参加反日义勇军的首领朱万金出面调解，双方互相交换了所抓的人员才算是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同于九江打起来之后，赵尚志感到黄炮的问题也很严重，为了巩固联合军的团结，他急忙从宾县返回到珠河铁道南游击区，并两次派人去做黄炮的工作。黄炮表面上对来说，他只是要在黑龙宫休兵整队，没别的意思，以及如何愿意参加联合军等。实际上他对哈东支队没收汉奸地主的财产和发动群众分粮斗争的做法十分反感，同时他也受不了反日军物质生活上的艰苦和严格的纪律约束，早就准备叛变了。不久，他在日本特务的收买和利诱下公开投敌，并纠集了“老头票”、“全好”等队，向哈东支队的黑龙宫游击区发起进攻。在那里烧杀抢夺，逮捕反日会员，解散妇女会和儿童团，还将农民自卫队改成反动大排。这时，与黄炮有亲戚关系的中共黑龙宫特支的书记王鸿生也叛变了，那里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

16 连战皆捷

赵尚志听说黄炮把黑龙宫给闹成了“黑窟窿”后，立即派部队去支援在那里与叛军战斗的反日群众武装。黄炮见赵尚志和他动了真格的，不敢继续抵抗，逃走了。

虽然哈东支队和地方党组织一起重建了黑龙宫根据地，但他们知道：要想摆脱被动逆境，重新打开局面，巩固老游击区，开辟新区，就必须在军事上取得新的胜利，否则就是说破了大天也。没有用。胜利，只有胜利，才是最可靠的保障。为此，哈东支队的领导们决定要打出几个漂亮仗来给抗日队伍和群众提一提气。8月份，他们先小打小闹，袭击敌人的铁道交通线91次，造成了16次脱轨翻车事件，使日伪感到“实不可再忍”。9月份，赵尚志决定要干个大的——打五常堡。

五常堡是距五常县城30华里的一个重镇，这地方不但“富甲五常”，而且其设施的坚固程度也是五常县城都比不上的。小镇的四周是很高的“镇墙”，墙外是深壕，“镇墙”内围着的是东、西、南、北各有3里地的正方形街市，“镇墙”的四角上和里面的一些重要路口上都设有炮台。镇内除了驻有警察队、商团、大排200多人外，还有一些备用枪支。一旦有事时，里面的人都能执枪上阵。五常堡里的人听说赵尚志和张寿钱带队向五常方向开过来后，并没太害怕。他们大咧咧他说：事变那年，冯宫、宫姚旅等自卫军都没敢进，小小游击队敢进五常堡？

五常堡的人不是牛气得很吗？赵尚志就要利用一下他们的这股牛气。他先放出风去说，哈东支队这次非要打下五常县县城不可。但暗地里却悄悄做好了进攻五常堡的准备。

8月15日，赵尚志指挥哈东支队及义勇军、山林队在内的200多人已经把五常镇包围了起来。随后，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该镇。哈东支队进城后，军歌震天，将日伪统治机关和炮台烧毁，除了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外，还从敌伪的当铺和商号里弄来了不少布匹、胶鞋和面粉物资。此外，他们还把以前拒绝他们要求救国募捐信的60多人抓了起来教训一顿。然后，便很快撤了出来。当敌援军赶到时，他们已经撤走了，敌人也没敢追上来。从五常堡撤出来后，眼前很快便来到敌人设在四道河子的据点。赵尚志决定“撸草打兔子”，顺便把它也收拾了。但这次他却不想硬打。

根据赵尚志的命令，哈东支队的骑兵队化装成伪军，大摇大摆地进了道河子。传令兵向里面的包队长报告说：“‘国军’刚才和赵尚志的部队在五常堡打起来了，没干过他们，现正在向村子里撤退，你们快去迎接！”

那包队长信以为真，赶紧集合起队伍到场院里列队迎接。这时赵尚志率队进来了，他对那帮伪军训话说：“赵尚志已经打进村子了，你们都在干什么？”吓得包队长一个劲地陪不是，但赵尚志那里管他这些。他下令说：“把他们的枪给我缴了！”

在四道河子，游击队把缴来的布匹一部分给部队做冬装，一部分分给当地老百姓，一部分送回老根据地。群众一得到实惠，立即就被发动起来了，不久就组织起一支300多人的自卫队和50多人的青年义勇军，积极支援游击队作战。

强攻五常堡和智取四道河子，果然起到了“提气”的作用。这些胜利不但使哈东支队解决了过冬的军需物资，更主要的是扫除了自和于九江冲突及

黄炮叛变后哈东支队头上的“秽气”，中止了山林队和义勇军脱离联合军的“连锁反应”。

人们常讲“乘胜前进”，其实倒不如说“乘胜取胜”更为合适，因为战场上的胜利往往也是一串一串的。赵尚志他们在取得上述胜利后不久，又接连取得了犁树沟、肖田地战斗的胜利，打退了叛徒黄炮对根据地的进攻及日伪军的冬季“讨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11月进行了“肖田地突围战”。当时，赵尚志带领200多人在行军途中被日伪军800多人包围起来，情况万分危急。但是经过7个多小时的激战后，在赵尚志的指挥下，他们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消灭了日伪军100多人、白俄警察20多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杀开了一条血路。此战结束后，就连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游击队的战斗力，说“此战必有名将指挥”。

打不打胜仗就是不一样。

哈东支队打仗失利的时候，联合军就动摇、分裂，根据地也不稳定；在打了胜仗后，这些就立即翻了个个——联合军内的那些原本想闹分家的不闹了，根据地的红地盘不但大了而且也更红了。

日本人说那里是“共匪”的“哈东乐园”。

17 好事成双

哈东支队连战皆捷和珠河抗日地不断扩大使得赵尚志的名声越来越大——“哈尔滨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反日联军赵尚志”。可是这位带头创出“共匪哈东乐园”的人却不是党员，这岂不是有点不那回事了？其实，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因此他们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多次给中共满洲省委写报告，要求省委恢复赵尚志的党籍。但是，省委却迟迟没有做出这个决定。究其原因倒不是因为办事效率低，而主要是由于在此其间省委还接到了其他有关赵尚志的报告。

在抗联的领导人中，赵尚志可以说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从现有的一些材料来看，一些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人对他这个人的评价也是很不一致。

对于赵尚志，当年哈东支队少年队的队员刘云阁回忆说：“少年队成立之后，我们和赵队长朝夕相处，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小同志，有时像个大哥，有时像个老妈妈。在行军中，他看谁走不动了就说：小崽子，上马！随后就稠到他的马背上，自己却步行。到了宿营地，他把我们这些小战士安排在炕上，而他自己和他的副官却睡在地下，这已成常事。在和赵队长接触的日子，他的一言一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作战勇敢。为人师表，说到做到，严格要求，是全军著名的。战时，他是一个威严的将军；平时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首长。他非常善讲，特别是战时宣传鼓动工作，有几次战斗就是他宣传喊话，使对方把枪扔出炮楼，缴械投降。赵队长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每到一地，总爱跟老太太、小孩子拉家常，讲故事。在他的宣传下，像吕老妈妈和她的儿子都为抗日联军做了不少事情，支援我们抗日。有人形容赵队长善讲叫他“赵铁嘴”。赵尚志队长平时的作风就像一老农。那时，我们游击队大都活动在山上，每到宿营地，他常爱蹲灶坑，蹲下来就蹭脖子，把脖子蹭得油黑锃亮。我们和他开玩笑说：‘司令，你怎么不把脖子洗洗？’他风趣他说：‘革命不成功，我是不洗的，有了这玩艺护着，还能挡风耐寒呢！’

“他的穿戴总离不了那件花绺条条的羊皮袄。冬天穿的乌拉，是战士不爱穿的，他捡来套在脚上，连乌拉草都包不住，腿绑也几乎是全队最坏的。行军时，他总是大步流星地走在掌旗官的前面。最有趣的是他鞋里垫的乌拉草，不等到达目的地，就都叫马给吃了。他依然昂首阔步，乐呵呵地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一向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对部队的情绪影响很大。”

王明贵回忆他对赵尚志的第一印象时说：“赵军长身材不高，不修边幅，穿戴和战士们完全一样。战士们都说：赵军长一点架子都没有，如果没有人介绍，简直就看不出那就是使敌人闻风丧胆、赫赫有名的赵司令。”

但是在此期间，中共满洲省委却接到了不少反映赵尚志的种种毛病的报告。例如，在满洲省委巡视员 1934 年 2 月 22 日的《巡视报告》中写道：

“……老赵在承认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还是很勉强不彻底，一点一点地接受。他认为称义勇军为匪军没有什么破坏统一战线。因为实际上这些义勇军还都联合我们，关于我们称义勇军为匪军，他们并不怪，因为他们都是称掌柜的。在队内，老赵完全不经过党和团的同意和讨论，任意地开除队员，说是肃清不良分子。在过年时，老赵召集队员讲话，问弟兄们谁愿意请假回家过年，这是一个好机会，以后就不能请假了，当时有几个队员请假，以后来队，老赵就不要了。他说：这种办法就是看看哪些队员有动摇 1935 年 1 月 12 日，中共满洲省委终于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议》。《决

议》指出：1933 年春，由于巴彦游击队失败而“开除赵尚志同志的党籍”，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赵尚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能继续艰苦工作，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具有坚决勇敢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开辟了很大的游击区”，故“决定正式恢复赵尚志党籍”。

好事成双。就在省委做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的半个月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3 军在珠河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赵尚志出任军长，冯仲云（当时化名冯群）任政治部主任。

18 巾帼英雄

第3军成立后，珠河游击区不断扩大。在哈东地区几十个县的范围内，敌人的军事据点不断被摧毁，“讨伐”不断被冲破，对敌伪在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样，珠河根据地也就遭来了敌伪一次接一次的“讨伐”。

敌人的“讨伐”给珠河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珠河中心县委在1935年8月11日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敌人的这次对我路南游击区所采取的焚烧政策的规模是很大的（笔者注：指1935年夏委的那次以日军为主的‘讨伐’），敌人的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我路南游击区除距铁道线南10余里地方未被焚烧外，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已成一片焦土。”

在这种情况下，第3军根据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决定，由军长赵尚志带主力部队向延寿、方正、依兰、勃利、通河、汤原一带转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

1935年秋，第3主力部队撤走之后，其第2团和第3团被留在了珠河根据地继续坚持活动，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转移。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这两个团的干部战士们与前来进攻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极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巾帼英雄赵一曼，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殉国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人。她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曾经多次带领同学们举行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1926年入党，10月份被党组织保送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可以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她在处理与丈夫、与儿子的感情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就可以知道她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赵一曼离开武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年的9月，她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她与同去东方大学学习的黄埔军校学生陈达邦相识，在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苏结婚。但一年后，由于国内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干部，赵一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告别陈达邦回国，此时，她已有5个月身孕了。

回国后，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子宁儿。做了母亲后的赵一曼并没有耽误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从南昌到九江，又从九江到上海，其间的经历决不是一句“艰难困苦”所能说完的（她带着儿子要过饭，被敌人追捕过，还曾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个草圈假装沿街叫卖孩子）。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得到党组织的批准。临行，她将儿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儿子，到东北去了。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春，经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和她谈话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我游击区展开工作。

在游击区工作期间，赵一曼以坚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抗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那是1935年2月，当时我刚满

13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了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20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们抗联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虽然赵一曼在这里让大家管她叫“一曼”，但是从现有的许多材料来看，当时人们好像并不经常管她叫“一曼”，而是亲切地以“瘦李”呼之（大概是知道她本来姓李，而同时又有一个长得较胖的姓李的人和她在一起工作）。

《东北抗日烈士传》一书中讲的有关赵一曼夺枪和运枪的两个小故事就很可能反映出赵一曼点子多、考虑问题周到的特点：“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同志为此精心策划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同志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锋，一曼同志和另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一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炎同志就地蹲着装解手，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里啪啦似的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警备或转身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枪支、割电话线……”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器，用油布、油纸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卡，日军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板猛加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转到部队了。”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在敌人那里也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登有《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1935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讨伐”最残酷的时候，赵一曼挑起了中共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和第3军第2团政委的重担。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随后在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突围出去的机会。直到天黑下来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我带一班掩护。

王团长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护！赵一曼说：什么男的女的！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这样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赵一曼等在完成任务后撤出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次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带着其他3名同志在珠河县第3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去找部队。但是，就在她住下没几天以后，敌人便得到了这一消息，并由第3区讨伐队队长张福兴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在与伪军的搏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俘。

张福兴抓到赵一曼便把她送到了珠河县伪警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那里。远间重大郎根据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的指示，又马上将赵一曼送到了珠河县城。

到了珠河县城以后，敌人便开始审赵一曼，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残忍的大野泰治便命伪军紧握赵一曼的伤口，疼得她多次昏死过去。

为了搞清楚赵一曼的身份，大野泰治连夜拷问在押的 20 多个人。当知道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后，才感到不能让她死了，于是就安排医生对她进行“不发生生命危险的治疗”。10 天后，又将她送到伪滨江省警务厅。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直到她大腿的枪伤化浓后，才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但即使是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也都要来审问赵一曼。

自从进了医院后，赵一曼就意识到，敌人还不想很快杀害她，现既然进了医院，身体就有好起来的可能，这样就不应该坐以待毙，要想办法逃出去。

但是，要想从医院里逃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她身边一直有一个伪警察在看着她。但赵一曼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她的突破口就选在了看着她的那个伪警察董宪勋的身上，办法就是给他讲道理，启发他的爱国心。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董宪勋开始同情他的这个看管对象了。应赵一曼的要求，他偷偷地拿来了笔和纸。有了笔和纸，赵一曼便开始了力所能及的写作。她把她在沈阳看到的日军暴行、中国人民被屠杀的惨状以及她对祖国的热爱等都用通俗易懂的小说体写了出来，使人读过之后便会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做为这些作品的第一读者的董宪勋最先受到感染，他对赵一曼的态度也从原来的同情变成了佩服，进而愿意服从于她了。这样，在敌人的魔窟里，赵一曼有了第一个“同党”。不久，赵一曼又用同样的办法把经常为她换药的护士韩勇义——一个人如其名的好姑娘争取了过来。有了这两个人，赵一曼的逃走计划便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其所订的计划中，把逃走后的去向定为宾县三区，即赵尚志率领抗联三军经常活动的地方。按照赵一曼的安排，董宪勋负责筹集物资，韩勇义负责筹集经费。一切都在计划进行着，到 6 月份时候，董宪勋探听到警察将要换防的消息，便更加加快了准备工作。不久，一切就都准备就绪了：一顶用来抬赵一曼的小轿、60 元（韩勇义卖掉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的钱）、必要的医疗器械。另外，还有一个名叫董广政的同行者。

6 月 24 日，赵一曼他们开了逃走之前的最后一个秘密会议，定于 6 月 28 日晚上开始行动。

6 月 28 日晚 9 点，韩勇义先到了赵一曼所在的第 3 病室，董宪勋则雇了一辆白俄司机开着汽车将事先做好的小轿拉到南岗文庙的后面。然后又和董广政一起来到医院，将赵一曼抬到汽车上，回到文庙后再舍车上轿奔阿城方向而去。

小轿很快便到了董宪勋在乡下的一个叔叔家。在那里，董宪勋急速处置了小轿，然后又雇了一辆马车，将赵一曼抬上车后由董、韩二人相随奔我游击区而去。

6 月 29 日上午 7 时，伪南岗警察署接到医院关于赵一曼等逃走的报告后，立即派人进行追捕。经过调查 6 月 28 日这天进出医院的所有人和车辆，

又打听到了北五道街做小轿的地方，然后很快判断了赵一曼等的去向，派骑警向宾县三区方向追去。6月30日早5时，伪骑警在阿城县李家屯追上赵一曼（如果再向前走20里路就到了我游击区了）。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8月1日，他们把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就义。

第六章

19 借鸡生蛋

1931年11月，一支日军测绘队未经同意闯入了驻在延吉翁声砬子的原吉林省防军第13旅63团3营（该营的基本力量原是营长王德林带领的一支绿林队伍，后被延吉道九营统领收编为骑兵第3营，后来虽经多次改编，但其番号一直都是第3营，故人称“老三营”）的驻地测绘地图，并旁若无人地直趋该营炮位窥测。当时带班执勤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但日军根本不理。这下子可把他惹火了，他当即下令开枪射击，两名日军应声而亡，其余的都吓跑了。

老三营的人打死了日本兵后，吓坏了他们的顶头上司第13旅旅长吉兴和大汉奸熙洽，他们下令把老三营调到敦化。王德林知道这是要挨收拾了，因此表面上遵令而动，实际上却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等到了敦化火车站的时候，他突然带着老三营500多人离开了那里来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了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共产党员李延禄（据李说这种友谊始于民国7年时，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王对他有一种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前往王部。于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支旧军队中创建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李延禄是在1932年2月从延吉出发前往王德林部驻地的，这时救国军成立没几天的时间，可以说来得是挺早的了。但是，还有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代表盖文华等3人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虽说是个空衔，但其“正宗”的地位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与盖文华带来的礼物相比，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带来的礼物可实惠多了，那是一张代表着一万块白花花、硬梆梆的现大洋的支票，此外，还有一个团的番号。

除了以上两家代表外，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也来了。以上这些人到王德林这里来，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目的。他们有的要求王接受其改编，有的劝王“自固待机”。而王德林在这些人喋喋不休的劝说面前，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暗地里，他在派人四处打听李延禄的行踪。

李延禄到后，王德林带着他见了各方代表。这时的李延禄正是年轻气盛之时，看到那些人便明显地表示出了厌恶感，王一见此情直紧对他说：“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话。”可是整整一天的工夫，因为那些人总围着王德林转，李延禄也捞不着机会与王深谈。直到当天深夜一点多钟的时候，李延禄待各方代表离去后，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王德林问：“你什么都知道了，现在你说吧，我该怎么办？”李并未直接回答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今年五十几了？”王低沉他说：“五十四了！”

李说：“是呀！你已经是五十四岁的人了，难道你还能再活一个五十四岁吗？”见王不语，他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当岳飞，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听到这里王再也不能沉默了：“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咱们一定要抗日，绝不能给子孙留下骂名。可那三个国民党的代表怎么办呢？”

“打发他们走！”

“李杜代表说要收编咱们的事怎么办？”

李延禄知道王德林正为此事犯难，他此时兵强马壮，正想独树一帜，李杜要把他收编为一个团，他岂能干？李杜的自卫军此时兵力十分雄厚，装备也比较精良，且占着吉东和北满地区的大片地盘，也得罪不得。所以他想了下对王德林说：

“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了一万元军饷，这事如果干脆拒绝恐怕不好。但咱老三营就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有点不合适。所以我觉得倒不如收下这一万元军饷，咱们也正需要，再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接着，李延禄给他进一步分析了这样做的利害得失，王德林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觉得李延禄讲的都在理。最后，他决定就按李说的办，并请李延禄留下来给他当参谋长兼李杜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

“好！”听王德林这样一说，李延禄自然满口应了下来。王德林又说：“咱这队伍里多数都是大老粗，这样是成不了大事的。你能不能找几个识文断字的秀才来？”

“行！”李延禄一听这话就更高兴了，因为这可是安排党员进救国军工作的好机会。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400多名，组成了3个连（后改为营），又从老三营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李凤山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朴重根到补充团当连长、副连长。

不久，共产党员孟泾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金大伦（北京大学的学生）、贺剑平等人也来到了补充团，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党支部，孟泾清任书记，陆续吸收了史忠恒、李凤山、李延平（李延禄的弟弟）为党员。这样，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便在救国军中悄悄地出现了。

补充团成立后不久便在救国军打敦化时充当主力，接着又在打额穆和蚊河两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救国军声威大震，补充团自己也有发展。

1932年春，救国军收复宁安后，密山县平阳镇小石头河子堡镇苏怀田和好友杨太和、聂海山、姜炮等几个人在共产党员田宝贵的带动下，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抗日队伍，并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同年5月，日军第10师团东犯，占领汤原、佳木斯等地后，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和护路军总司令丁超败退至密山，使密山境内的兵一下子多了起来，这些“正规军”一来，苏怀田他们这支民间武装就不太好活动了。于是，田宝贵就对苏怀田说，咱们到兴源镇去找李延禄吧。苏到兴源镇后，向李延禄说明了来意。李延禄很高兴，并经请示王德林后，把他们收编为第2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李延平任政委，苏怀田、田宝贵任副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又进一步得了发展。

20 大战天野

为了更快地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日军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着手修建吉会铁路（敦化至图门段）。王德林说：有我王德林在，日本人就别想修成这段铁路！并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一铁路的修筑工程，使日本人感到十分恼火。直闹得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一再下令给那一带的日军，要他们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 15 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那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鸡毛信后，立即召集了手下人商议此事。当下就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以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要“躲”，还有一种意见就是以参谋长李延禄为代表的人提出来的“打”，而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为此召开了一次秘密的支部会议。支部书记孟泾清在会上说：“就是他们都拉到山上去了，只剩下我们补充团 700 人也要抗日。是不是我们为革命牺牲了，就没有抗日的游击战争了，不是的。还一样有人会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依靠的是党和广大的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我们关里还有百万红军，就是我们牺牲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还会继续下去，还会有人继承我们的抗日斗争。最后，我们必将胜利。”关于对救国军内那些人，孟泾清说：“今天，我们还得耐心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如果他们有些人把队伍拉到山上去当土匪，我们只有 700 人，还是要找到有利地势，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孟的一番话表明了当时这些共产党人是下定了要打的决心。那怎么打呢？李延禄提出：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王德林在棺材脸子村再一次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参谋长李延禄便按党支部秘密会议定下的调子，在这次会议上力排众议，主张打。可是王德林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会议开到第三天，当他听到李延禄代表补充团表示：就是只有我们 700 人也要打的决心时，他终于下了决心。他说：“你们年轻人决心这样大，我一个 54 岁的人啦，不能成功，还能成仁哩！咱们到南湖头去，看看那边的地势再说吧！”

等到了南湖头看了地势，又看了李延禄等人制订的作战计划后，王德林最终下了打的决心，并且考虑到补充团的战士们平均每人只有 30 发子弹，下令将老三营库存的所有手榴弹用 20 匹马往返多次运到了补充团。

这次李延禄为补充团选的阵地——镜泊湖南头的“墙缝”，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好在哪呢？李延禄是这样描述的：“在我们的阵地上，既没有挖战壕，也没有什么丛林、树木之类的掩护物，我们就隐蔽在光秃秃的临大道的山崖旁边。沿顺这条足有 5 里长的蜿蜒的山崖线，是些巨大的嶙峋岩，仿佛远古时尸给海水冲积的海岸一样。我们的 700 名勇士，就依恃这些大块的岩石作掩护，只要是有大块卧牛石，或是巨大的马头石的地方，背后就有我们的勇士，三五成群地潜伏扼守。因为这是些光秃秃的山坡，只是山脚有些岩石，自然敌寇走到这里也会安然无疑。“山崖对面，可以望见牡丹江上游的支流，江那岸就是一块大盆地似的草甸子，因为放过荒火，烧得溜光。这时候，冰雪刚将融解，青草还没有发芽，望过去直到对面的山上，都是乌黑一片。那边的山脚下，也有一条大道，若是敌军选择那条道走，自然会安安稳稳通过，因为那里没有可以遮蔽的岩石线。而从‘墙缝’，我们

所潜伏的阵地上，没有远程射击的炮火，是根本控制不住那条大道的。敌寇要走那条道，需要绕远，需要过江，一般来说，是不会做出那样过于慎重的选择的。

“我们所扼守的，是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路。这条路就在嶧岩底下，紧靠大江，是条古老的通商道路。”

当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支部书记孟泾清就去县委汇报工作去了。临走前，他对李延禄说：“我们既要在这里坚决和敌人打，还要保持住我们的军队。我们要在战斗中发展我们的力量，不要拚老本，一定要见好就收兵。我个人看，抗日游击战争是长期的！我们补充团是党的珍贵财产呀！关系到整个抗日救国军的巩固和瓦解呀！”

孟泾清走后，李延禄和补充团的勇士们便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不走“墙缝”了。其实，他们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有一个名叫陈文起的人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现在我们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和卖主一起设好圈套让你掏腰包的人，他们或者假装买主，营造出一个“抢购”的氛围让你主动上前和他们争相购买；或者拿出什么优惠卡之类的东西让你占上一把“便宜”。北京人管这种人叫“托儿”，东北人则称其为“牵大驴”的，缺乏经验的人是很容易当上一回“蠢驴”的。现在，我们这位陈文起就要当一把“牵驴者”了。陈文起本是甫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在“墙缝”伏击日军的时候，便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他的好枪法。可呆了两天不见动静后，他就在夜里回到他家——瓦房店去探听动静，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是马胡子吗？”

“不是。打猎的。”

“你的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日本人一见他身上都是沾有死野物的血迹，的确是个打猎的；再看看他那股沉静劲，便不再怀疑，他们打心眼里为能找到这个难得的向导而高兴。连忙说：

“你的，前边的带路！前边马胡子的没有，你，好人大大的；前边马胡子的有，你，坏人死了死了的有。明白？”

“明白！”陈文起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已早想好了——“非把这些兔崽子领到墙缝去不可！”然后便牵着天野等八千多头“东洋驴”朝“墙缝”走去。此时正是3月20日的凌晨。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喊了起来：“什么人？”

“我们是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姑娘回答道。接着又有一个老头的声音说：“她是我姑娘，我们是找补充团指挥部的。”老头（后知其名叫史振德）见到李延禄后，告诉他说：陈文起已经牵着“驴”往这边来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之所以带着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寇那红肩章、刺刀和扛枪的臂膀所组成的行列了。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些光秃秃的山顶和大块岩石的背后，有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率领的700勇士，在这里等待着他们；而且是那么突然地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5里长的狭路同时纷纷下落，到处是爆炸声零

乱奔跑的脚步声和临近死亡那瞬间的枪惶的惨叫。在所有这些声音里似乎还有日寇指挥官的命令声，这声音疯狂似的响亮，带着一种意外的惊慌和恐怖。以后，我尽管经过无数次大小战斗，日寇指挥官的疯狂喊声，从来没有一回像这次那么凄厉，印象那么深刻。我感到我们依崖猛攻、猛打的700名勇士，在敌寇发出的狂呼声中，顿然精力增长百倍，心情豁然开朗，有的竟扔掉了棉衣和帽子，只穿着短褂往外扔手榴弹。”——李延禄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

就在补充团打得正来劲的时候，担任堵口子任务的戴凤龄独立营——一支被救国军收编的地主武装，却不顾事先定好的作战计划和命令开溜了，李延禄紧接着就接到了日军在狭路口外停止前进，行动不明的报告。这样一来，补充团就随时可能会遭到日军从背后对其进行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李延禄果断命令补充团：撤！

几天后，当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时，发现日本人在那里留下了三个火葬点，“所有枪支都随同敌人士兵的尸体，全部烧毁了……，我们总计得到了被火烧毁的残枪筒一千五百余件，另外还搜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两千多支。据此可见敌寇伤亡将近四千，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此一战，补充团付出的代价只有7个人！

需顺便说一下的是，从“墙缝”逃走的那些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入了李延禄为他们设下的火阵之中，逃出的那300来人在被共产党员李延青率领的工人游击队消灭了200来人，天野少将也被打死了。

最后，该说一下那位“牵驴人”陈文起了。

陈文起在枪响后很快就跑到一个石崖后边，但他并没有跑。当被日本人抓来的直车老板子们问他怎么还不快跑时，他却说：“我就这么空手出去呀！我还得弄杆好枪！”可是还没等我们这位勇敢的猎手把枪弄到手，日本人就开始到处抓他了。当他被抓住后，他大声说：“我早就没想活，早就想把你们这些兔息子送到‘墙缝’来了。”气红了眼的日本人把他吊在房梁上。陈文起骂不绝口，最后，日本人挑开了他的胸膛。后来，人们把他埋在了距“墙缝”不远的地方。

21 同室操戈

自从补充团成立的那一天起，李延禄和他的同志们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着两线作战——一面与日本人面对面的干，另一方面还要时常防备自己同胞从背后打来的冷枪。这些冷枪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李延禄本人，“首席枪手”则是救国军的副总司令孔宪荣。孔宪荣原来就是王德林的绿林班底，王德林被收编当老三营营长的时候，他是连长。在王德林起义前他已经退休了，等到王德林起义后，他便重归老三营，成为王德林的左右手。孔宪荣这个人的权力欲和财欲都很强，救国军成立后，他仗着与王德林关系非同一般，竟然明目张胆地进行拉帮扯派和聚敛钱财的活动。李延禄对他这些活动很看不上，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自然也就引起了孔对他的不满。在救国军打下兴源镇后，孔宪荣的一个亲信李副官与商人勾结，竟把占战利品总量八分之一的物资给盗卖了。王德林知道此事后，便亲自过问，然后给李副官定下了一个死罪。王德林情知这位李副官是孔宪荣的人，也知道他是在为谁弄钱，所以他虽然为了严肃军纪说了要杀李副官，但却迟迟没有下令杀人。这时，救国军总部的随从参议郭秀庭找到李延禄对他说，所有随总部来到兴源镇的人都已经向王德林求过情了，但谁说也不行。这个面子是总司令留给你的，你去说说吧！”李延禄说：“他吞的那些赃款吐出来了吗？”

郭秀庭说：“那还向哪吐呀？”

李延禄说：“这样的情我不能去求！”

王德林见李延禄没去求情，自然也就没了台阶好下，当天就把李副官给毙了。

孔宪荣知道此事后，恨死了李延禄。他先把李延禄从第21旅借来的迫击炮营扣下了，并杀了这个营的营长，然后便准备杀掉李延禄。

待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孔宪荣在穆棱打电话给在兴源镇的李延禄说：我已经带来第2旅从前方回来了，很想见一见你，请你到穆棱来一下。

李不知其中有诈，接电话后马上就要去穆棱。就在这时，从穆棱又打来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得很急，而且打电话的人也不通名报姓，只告诉李延禄不要去穆棱，还说事关机密，他马上就来兴源镇向他当面说清。

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等到满腹狐疑的李延禄见到来人时，他说啥也没想到来人会是孔宪荣的侄子小孔。小孔是中共地下党员，现在孔宪荣处当随从秘书。他一见面就对李说：你不要去穆棱赴约，孔宪荣已经准备好要杀你了！

李问：“他为什么要杀我？是不是为李副官的事？”小孔说：“还不是两雄不并立呗！孔宪荣常说有你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你！”又说，“打天野，人家说能打，咱们说不能打，到底人家带着700人的补充团去打，还是大胜。还说你手下的人，又都是识文断字的，长啦，在枪杆子里头还有咱们耍的呀，葫芦里的主药在这里，李副官的事只不过是引子。”

李说：“我要是不去，那以后在救国军里我们还怎么做工作呢？”

小孔说：“我们会布置，要他来看你啦！只要你不去看他，提防一点儿，就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这是我们在第2旅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决定的，不是我个人意见。”

李说：“那好吧！”

两三天后，总部的参谋郭秀庭来了。他对李延禄说：“听说你和耀臣（孔

宪荣字）两人误会啦！他让你去穆棱，你不理，是吗？”李说：“这可不是什么误会。他们在宁安南山开过会，要借机杀我，这是为什么呢？”

郭连忙说：“这是哪里的事呀！你可不要听坏人挑唆呀！要是你不去我叫他到兴源镇来看你怎么样？要是你不放心，叫他单人匹马来看你，好不好？有什么误会当面一解释就完啦！不见面，怎么一块打日本呀！”

李说：“我是不计较个人恩怨的。我们从大局着眼，个人之间的恩怨，实在算不上什么。他要是来兴源镇，我当然是欢迎的。”第二天，孔宪荣在郭的陪同下来向李解释“误会”了。虽然他受到了李心平气和的接待，但内心里却别提有多别扭了。因此，在这次谋杀失败后，孔并没有死了那份心。不久他又借口让李延禄去看李杜刚给他的一把 20 响匣枪，想借口枪走火打死李，只是由于李及早发现了他的“猫腻”才没有得手。

李延禄能躲过从后面打来的冷枪，他是幸运的。但这种运气并不是每个在救国军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有的。与他姓名只有一字之差的第 17 团团长李延青就没躲过去，他是死在被其收编的红枪会和黄枪会的王大法师和张大法师之手的。而最惨的则要算是第 2 补充团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了。

当时，在穆棱有一个煤矿，矿主是白俄，名叫谢杰斯，所以这个煤矿也就叫谢杰斯煤矿。谢杰斯矿上有一支二百名矿警组成的武装。谢杰斯本人反苏仇共，和日本人勾结。8 月份的时候，第 2 补充团奉命到谢杰斯煤矿去解除这支白俄武装，没收矿上资财。因为犁树镇有丁超的护路军驻扎，所以他们便先迂回到谢杰斯煤矿的背后，在距矿区近百里的石头河子镇宿营，团部就设在了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子里。

不知怎么搞的，这一消息被丁超知道了！原属东北军第 26 旅的王之孝团和车子久团奉丁超之命连夜从平阳镇赶到石头河子，包围了补充第 2 团的驻地。

他们派人到苏怀田、田宝贵二人说：谢杰斯煤矿是在护路军的辖区内，矿主受护路军保护，如果你们救国军的人要在护路军的辖区内活动，就得去和我们丁总司令把话说清楚。

苏怀田说：“谢杰斯和日本人有勾结，还非法经营工兵厂，我们是奉王总司令之命来的，既然丁总司令有约，不妨就去谈谈。”政委李延平和三营长杨太和则说：“哪有你们这样四面包围以后来请人赴约的，不去！”

来人说：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你们是哪部分的，等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你们是救国军的人。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和你们插草为香，对天盟誓。大家都是抗日的队伍吗，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的。

这几句话一说，苏怀田便决定带团部的所有人员都去拜访丁超。但杨太和却说什么也不同意，并且在送苏怀田和来人走的时候说：“要是我们的人到时候回不来，你们还不解围，我们就要开枪。”苏怀田等人一到丁超那里就被抓了起来。几乎于此同时，补充团第 1、第 2 营在王之孝和车子久两团的突然袭击下，被解除了武装。

按丁超的命令，团长苏怀田、副团长田宝贵为首的 6 名营以上军官被用大铡刀铡死，其余 30 多名军官枪毙！

在这次惨案中，第 2 补充团损失惨重，只有警惕性极高的杨太和带着他的第 3 营突围脱险而归。

22 独树一帜

1933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禄他们的日子可太不好过了。当时，李延禄正带领部队坚守在磨刀石车站附近的两个小山坡上。但就在这时，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了：先是接到铁路工人报告，说敌人已经乘铁甲列车抄了他们的后路，然后便是从广播里听到了有关自卫军第21旅旅长关庆禄已经在绥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也先后撤到国外去了，丁超则乘专机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内务府大臣的消息。

这接二连三传来的坏消息，对于正在与敌人作战的李延禄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后来回忆说：

“所有这些由敌伪电台广播听到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比听到东来的铁甲车是堵截我们后路的敌人更为意外。我们没有想到那些部队瓦解得这么快。尽管我们精神上已经作了准备，但我们还是感到事情发展得有些使人吃惊。

“我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带着部队在多瑙河作战，听到奥国联军所扼守的维也纳大桥失守，拿破仑的主力已经渡过多瑙河的时候也没有我们当时那样吃惊。”

情况变了，怎么办？

李延禄一边组织部队与敌人抗击，一边组织党员开会。会上，所有的党员干部——杨太和、冷寿山、史忠恒、李风山等人都同意李延禄的看法，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抗日救国的大旗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来扛了，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了。

会上统一了意见后，李延禄马上召集骨干、士兵代表会议，宣布：这个队伍从今以后正式归共产党领导了，名称就叫“抗日游击总队”。并宣布了游击总队的领导人：杨太和、李风山、邹凤翔、李延平分别任3个团的团长和游击支队的支队长；李延禄、孟泾清、张建东分别任总队长、总队政委和参谋长。

游击总队成立后，虽然暂时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却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此，李延禄他们决定要分头去找党组织，即：一路由李延禄带领去宁安找，一路由杨太和带着到密山去找。李延禄他们到宁安后不久便设法与中共宁安县委取得了联系。这时，原属抗日救国军系统的王毓峰部和史忠恒的第1团会师，并主动提出要和游击总队合并。在这种情况下，李延禄向宁安县委请示，要求将游击总队扩编为游击军。他的这一意见很快便得到批准。这样，李延禄原来的抗日游击总队就改称“抗日救国游击军”了。游击军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游击总队的原班人马，只是增设了一个副参谋长的职务，由化名为陈龙的人（本名为刘汉兴）担任（刘在建国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1958年病逝）。

抗日救国游击军成立后，在绥宁地区打了不少大仗。日本人为了消灭这支颇有战斗力的劲敌，调了大批的部队前来“讨伐”。1933年3月3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游击军活动的中心地区马家大屯展开了。战斗开始后，敌人一直用飞机、大炮猛轰游击军的阵地，游击军的指战员面对强敌，沉着镇定，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

马家大屯战斗结束后，当李延禄带着部队清理战场时，发现在我军烈士的遗体中混有一个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禄的脸当时就拉下来了，他找到负责

打扫战场的别动队队长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进来了？”李光赶紧说：“这可是个好人。”然后便告诉李延禄说，他在带别动队战士打扫战场时，在一片松林里发现了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和一具日本兵的尸体。在附近还发现了一封信，找来一位懂日语的人一看，上面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 10 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福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3 年 3 月 30 日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上面这件事中，我们可见亚圣之言之真。

在 1933 年的时候，日伪统治还没有完全在密山这个紧靠中苏边境的地方建立起来，李杜的自卫军退到苏联去以后，其残部散落在密山一带，形成了大大小小 80 多支抗日武装。这些队伍成分十分复杂，互相之间协调得也很差，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这就为游击军到那里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1933 年 7 月，李延禄带着游击军来到密山县平阳镇，与已在那里的第一团会师。这时，周围各部的义勇军都慕名前来，表示愿意接受编制和与其进行协同作战。为此，军部在驻地郝家屯召开了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议。出席者有“赵队长”、“金山”、“常山”、“邱甲长”等人。在这次会上，各路“诸侯”共同商定：坚决打日本、打汉奸、不投降、抗日到底；保护群众利益、从敌人手里夺武器。

在出席会议的人中，李延禄特别见到了那位外号为“赵挑水”的“赵队长”。这是一个山东彪形大汉，从头到脚，一身庄稼人打扮，斜披着一条布料的子弹袋，是个手中不离长枪的人物。他是代表手下那 100 多人来开会的，那些人多数都是他的山东老乡。李延禄问他：“是不是打算和我们一起抗日？”赵队长说：“你们收编，我们没话说，你们不收编，我们也跟着你们一起打日本。”

李延禄问：“你怎么和‘邱甲长’他们不一样呢？”赵队长说：“我是干什么出身的，他是干什么的，我是给人家挑水的！”

虽然像赵挑水这样的人不少，但是由于受“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游击军在收编各支抗日武装的问题上还是迈不开步子。甚至就连“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样的口号也不敢提（直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赤峰来了以后，告诉他们可以提这样的口号，他们才敢这样）讲。同时，由于游击军初到密山，对各方面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因此吃了不少亏，特别是军部受到了伪军骑兵部队的袭击，损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吉东局和密山县委及时帮助他们建立党团组织，做思想工作，使队伍稳定了下来。不久，省委巡视员吴赤峰再一次来到了密山。

吴赤峰告诉他们，省委已经做出决定，让他们取消“救国游击军”的名义，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游击区也将扩大到虎林、饶河一带，原在虎饶游击区活动的李学福游击队也将划归第4军领导。

1933年9月1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正式成立。这实际上是一支以游击军为核心组成的“抗日联军”，各支队伍虽然统一了编制，但平时还是独立活动的，只是作战时才协调行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成立后，转战密山、勃利、林口、方正各地，同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在1933年10月攻打密山县城一仗就得步枪130支，短枪4枝，子弹万余发。1934年5月，为支援土龙山农民暴动，袭击依兰县日军“讨伐”队，击毙日军大尉3人、中尉和少尉各一人，士兵50多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成立后，李延禄和其他领导人仍感到对许多问题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例如，在对待义勇军的态度上、在是否要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问题上（吴赤峰原来也只是说他个人认为可以提）等，都搞不清楚，由于大家对这些问题理解的不一致，所以经常为此争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34年2月，李延禄只身入关去寻找党中央，求个正确的“说法”。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到了关内的不少地方，但却未能找到中央，只好又回到了东北。

李延禄没有找到中央，可中央特派员吴平却找到了他们。1934年8月，吴平来到了第4军，根据李延禄向他反映有关“一提抗日周围人力物力就容易调整动，而一提苏维埃革命，许多人就和我们疏远了”的实际情况，吴平建议他们改“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

吴平的话说到了李延禄的心坎上了。第二天，他就召集各抗日武装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提出改人民革命军为抗日同盟军的建议，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在这次会上，中央特派员吴平说：在南满，我们有杨靖宇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吉东有王德泰的第2军，哈东有赵尚志的第3军，你们现在就正式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以后，周保中可以在宁安建立第5军，要是谢文东愿意接受我们领导，我们就给他第6军的番号。

第七章

23 荆璞起事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宁安县一个名叫李荆璞的青年汉子的耳朵里的时候，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民族意识促使他决心放下祖祖辈辈一直传下来的锄把子，拉起队伍去和日本人挤上一场。

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听了李荆璞的这一想法后说：“好使！”可是他们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没枪。连做个“草头王”都需要有枪，更何况是去打日本呢！怎么办？但这事并难不倒李荆璞，他对大家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嘛，向那些家里养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用。”

学胡子的哪一手？对于这些经常听到、甚至自己就曾领教过胡子们的手段的伙计们来说，不用说大家也知道。那年且东北有许多胡子在刚“起局”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往往就拿着用红布包起来的条帚疙瘩、带个弯儿的木头棍子什么的，往人家后腰上一捅，任你是皇上他二大爷也得乖乖地给我举起手来——尽管有些人也知道这些“枪”可能是“虎”牌儿的，但好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每当这时候，求生的欲望一准会使人们宁肯信其是真的了。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用锅底灰上色、用红布“包装”起来的木制匣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的家里。他们对吓得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来‘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一下，等把日本子打走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又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安保卫队的一个班的枪。有了这些枪，他们很快就发展到100多人。

李荆璞的队伍拉起来后，先是投奔了王德林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的一个连，李荆璞任连长。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不太坚决有力，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一退再退。跟着他们退到哪里是个头呢？当队伍退到老爷岭的时候，他把自己手下的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说：“兄弟们，看来这打日本的事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现在还要往东宁逃跑，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保卫家乡！”

李荆璞的话刚说完，连里一个名叫于洪仁的士兵说道：“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打日本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走哇，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一旦枪响，那个连很快就会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这好办，咱们不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自信他说，“连长可以带着人去找营长，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以应付意外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然后便带着人行动去了。

他们的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天晚上，他们悄悄地离开了老爷岭，回到宁安老家去了。

在向回走的路上，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就拉倒了，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让大家知道咱们为什么要走。”“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

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一个吧。”

“好！”

于洪仁起草的这份宣言发表后，果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宁安一带的一些小股武装都纷纷慕名来投，他们的队伍也很快壮大起来了。日伪军则也因此将他们当成了讨伐的重点目标。其中伪宁安地方保安队就一直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拼了！”嘴上常挂着“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的李荆璞，被跟在后面的这个“大尾巴”弄火了。关键时候于洪仁又走到他面前，对他说：“连长，现在不能打。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刚拉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现在打还没把握。我们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了几个能干的队员和敌人兜圈子，把敌人一点一点地诱进他们的伏击圈，然后一举歼灭了这支伪军的大部队。

打了这次胜仗之后，于洪仁在整个队伍中，特别是在李荆璞的心中的地位一下子就高起来了，大家都觉得这位戴着眼镜的于先生有办法。李荆璞还特意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当“贴写”——相当于我们今天跟在首长身边的秘书，虽然官不大，但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李荆璞还不知道，他所信任的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竟是中共宁安县委专门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共产党员。队伍拉起来了，总该有个名吧。报个什么号呢？李荆璞十分佩服当时在宁安一带广为传说的一个名叫“平洋”的好汉——据说他一个人打死6个鬼子，还到哈尔滨去杀富济贫，因此他自己想报号“平东洋”。可是马上就有人说，这个名字不行。因为按照“一生、二死、三逃、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的说法，这“东”乃八划，为降，这可太不吉利。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改掉这个字。南字是九划，吉利，改成南字吧！

可是，叫平南洋和打日本又怎么能挨得上呢？李荆璞想了想说：挨得上。因为从地图上看日本差不多就在宁安县的南面，所以用南字也说得过去。于是，平南洋就成了李荆璞的报号。李荆璞原打算把这支队伍叫做“平南洋反日游击队”，于洪仁说，还应该加个“总”字，这样有利于收编其他队伍。这样，这支队伍就正式称为“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了。平南洋是总队长，于洪仁则当上了副总队长。

在总队成立大会上，平南洋和于洪仁带着大家在一面红地中间带个黄月亮、上书平南洋三个大字的队旗下，发出了誓言——坚决抗日到底！

平南洋的旗号打出去之后，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队伍的影响大起来了，来入伙的人也多了起来。由于这些人成份十分复杂，所以平南洋队伍里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抢东西的、绑票的、杀人放火的都有了，日伪借此散布说，平南洋是宁安一带最大的土匪头子……。平南洋自己听到这话后，十分生气，为此还毙掉了几个，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让他感到生气的事还多着呢。有一回，总队调来许多联合部队攻打宁安县城，进攻前，平南洋和于洪仁一起给大家定下约法三章：

第一，各部队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二，有组织有计划地没收敌伪财产；第三，严禁没收中国人的商店和市民的财物，违者以纪律论处。

当时大家没有也不敢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来，可一打进宁安县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烧、抢一阵之后，便各奔东西，气得平南洋破口大骂：“他妈拉巴子的，这哪像抗日的队伍啊？……”这时，于洪仁又及时地找他来了。

“总队长为什么不高兴呀？”于洪仁明知故问。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就是为咱们的抗日前途！”平南洋接着反问道：“你看，日本子打来后，东北军几十万军队都跑到关里去了，现在救国军和自卫军也完蛋了，南京政府啥时候才能出兵抗日呢？”

“哈哈……，我当为什么呢，原来是为这件事。”于洪仁笑了起来。

“这是件大事，你还打哈哈！”平南洋不满他说。“这件大事不能指望南京国民党政府。”于洪仁收敛笑容，一本正经他说。

“那靠谁？”平南洋问。

“要抗日，必须靠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

“共产党？红军？”平南洋以前只是听说过，但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于洪仁便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讲了南方的苏维埃、红军……

就这样，“我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心里点亮了一盏明灯，时间长了，我就明白了同我朝夕相处的于洪仁就是中共党员了。”——几十年后，平南洋回忆说。

自从平南洋知道于洪仁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到队伍里来做抗日工作的以后，便多次提出入党的请求。但是，于洪仁却给他摆了三个条件：

“一是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行！”

“二是要坚决抗日到底。”

“行！”

“三是要把部队交给党。”

“这……，我得考虑考虑。”听说要把部队交出去，平南洋犯起了核计。

一见平南洋对第三条还不理解，于洪仁进一步对他解释说：“让你把部队交给党，不是让你离开部队，你还是部队的领导。不过，在队里得实行民主制度，要实行官兵平等……”

“行！”

1933年5月5日，经中共吉东特委批准，平南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派到这支部队中来，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党支部也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党支部建立起来后，于洪仁提出了要改换队号。平南洋表示同意，并建议说，应该将队号改为“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你是怎么想到工农二字的？”于洪仁问。

“你不是常讲，我们的队伍是为工农群众打日本、求解放的，是靠工农养活我们的吗？”

“那么，这义务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于又问。

“我们成立这支队伍由谁给我们发饷呢？谁也没有。这不是尽义务吗？”

“太好了！”于洪仁高兴他说，“那就叫这个名字吧。”于是，“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就变成了“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24 “日本探子”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人，白族。少时家贫，只读一年初中便辍学了。15岁时（1917年）与同伴杨茂才到昆明闯世界，后在一同乡帮助下入云南陆军第1师教导营当学兵。8个月后学兵期满，被编入靖国军第8军，并随军参加“靖国护法”战争。在“靖国护法”战争中，周保中因在作战中表现勇敢而被提升为排长，成了一名军官。但此时的周保中却因看不惯上层军官们勾心斗角的那一套，而无意在军中干下去了，遂不顾一切返回乡里。

回乡住了一段时间后，周保中又再次到昆明投军，并于1921年春被选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7期工兵科学习。1925年他见到了中共两广区军委书记张伯简（张也是云南白族人），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从张伯简那里，周保中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看后思想豁然开朗，他向张伯简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后，张伯简非常高兴，当即写信给著名军事家杨杰，介绍周保中到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为程潜、党代表为林伯渠）去工作。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周保中在这次战争中屡建奇功，官职也不断上升，由营长而上校团长，由上校团长而少将副师长。1927年周保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他继续留在第6军中工作，并准备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一起将这支部队拉出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而未能成功。此后，他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末，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军事。

1931年9月，周保中回到了国内并来到民族危机最深的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他到宁安组织和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周保中到宁安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才能打进当时在那里的吉林自卫军内部。只有先进到里边去才能谈下一步如何领导他们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保中想出了一个充满危险、但却是十分简便易行的办法——先让他们把自己抓去。周保中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实现了。1932年5月，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在宁安花脸沟将周保中抓住了。但他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却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因为口音太重，那帮东北土生土长的士兵们听不懂，便怀疑他是朝鲜人，是日本人派来的探子，不由分说就把他给绑起来要杀了他。后经周保中费了好大劲向他们解释说要见他们的领导人，才使这些士兵放下了已经举起的屠刀，把周保中的要求报告了上去。当时，自卫军左路军的领导人们正在开会，听说抓住了一个日本特务，便停了下来，开始审问。

审问一开始，周保中便向这些人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后，对他们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内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我才来投奔你们来的。”“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疙瘩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

这可问到周保中的强项上来了，他对这些问题早就有所研究。于是，他先对他们讲了当前的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东北的形势，然后讲到了他们最关心的他们这支自卫军所面临的形势及应该采取的救国方略。他说：你们自卫军现在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这种形势于我们十分不利，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利形势呢？那就要主动出击，派出兵力去袭击敌人的后方，通过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恕我直言，据我所知你们自卫军的战士虽然抗日的士气很高，但纪律却不够严，长官贪污腐化，士兵搔扰百姓的事还不少，

老百姓对你们这一点很不满。这样的军队是不会打胜仗的。如果真想抗日，那就得整顿军纪，改善与群众的关系，还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让群众与军队共同抗日。还应该看到日本人不是一天两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长期的事，所以就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要与其他抗日队伍团结一致去打日本人。对南京政府，大家用不着抱有什么幻想，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来抗日了，他们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对“国联调查团”就更不用抱多大希望了，他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周保中这一席话一下子就把自卫军的那些头头们给震住了，他们相信周不是日本特务，而是一个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于是，他们顿时满脸赔笑，一边连连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一边急忙让人给他松绑、请坐、敬烟、上茶。最后，请周保中留下来，到他们左路军的总指挥部的宣传部里作指导工作。周保中也就这样实现了他要打入自卫军内部的愿望。

周保中来到自卫军左路军总指挥部宣传部后，很快就扭转了它原来的宣传方向，把反共宣传变成了实行统一战线、彻底抗日救国的宣传。这就引起了自卫军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将领的不满。他们虽然钦佩周保中的才干，表面上也不得不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赏，但背地里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的那一套！”不久便找个借口将宣传部给解散了。王德林听说周保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想把他收为己用。所以在宣传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受王德林之请，来到了救国军总部，当上了总参议。

这个总参议本应该是在总司令身边出谋划策的角色，但周保中觉得光是这样呆在上面对在救国军中开展党的工作不太有利，便主动要求到前线去指挥作战，王德林同意了他的请求，便让他去给救国军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当参谋长去了。

周保中到了救国军前方指挥部后，立即采取了几次比较大的动作。袭东京城、攻安图县、克敦化城，后来又两次攻打宁安县城。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周保中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不仅指挥有方，而且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最典型的就是在1932年10月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时的表现了。当时，救国军遇到了城里日本人的顽强抵抗。为了迅速打下宁安县城，周保中亲率敢死队，一马当先冲进了城里。进城后，他首先带人炸毁了军火库，击毙了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人。激战中，他被流弹击中，鲜血直流。但他并没有退下去，一直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他让人用一把大钳子把子弹给拔出来了，然后又用刮刀一块一块地把被打烂的肉刮下去。这一下，可把大家给看服了，人们纷纷赞叹说：“周参谋长‘刮骨疗毒’真了不起，胜过昔日的关云长！”12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第二次攻打宁安城的战斗，结果消灭了好几百名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周保中的声望更高了，做起工作来也就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周保中建立起了秘密的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团员。

关于周保中及其领导的党组织在这一段的工作，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何成湘在1933年11月24日写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党在）吴义成（部），（有）二百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军

委书记)的意见,得过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去中。”何成湘在这份报告中把当时被人称为“周蛮子”的周保中,给说成了“周麻子”,可见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周保中与省委的直接联系并不太多,主要是自己独立开展工作,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还是把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当救国军和其他义勇军个别领导人抗日不坚决的时候,这些党团员纷纷站出来,在反对投降、保存队伍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就在何成湘报告中提到的“占领东满安图”一事(1933年6月16日)后不久,由于吴义成收受贿赂等原因,使得救国军四分五裂,很多人都不再听他的指挥了。在这种情况下,吴义成只好带着一帮人到东宁老黑山一带的山里去了,留下周保中在安图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组织起了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周保中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周保中把领导范围扩大到吉敦线以至吉海线上的各支抗日队伍,受其指挥的部队有不下1000人之多。1933年冬天,按照中共吉东局的指示,周保中正式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个连到宁安与平南洋的“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

1934年2月,周保中带着队伍与平南洋的队伍会合后便由周保中出面,召集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因为周保中的名气很大,所以在那一带活动的柴世荣、王疏峰、傅显明、王汝起、裴振东等人都来了。这次会议一共开了3天,会上做出了三项决定:一是成立“宁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并由周保中出任该办事处的主任;二是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三是划分5个大的游击区。

在上述会议后不久的3月1日,“宁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用最大的力量使边区军和工农义务总队成为宁安一带反日运动的中心力量”。

25 日伪心病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绥宁地区就成了“满洲国”的一块心病。为此，日伪将这一地区列为 1934 年秋季开始的大扫荡的重点地区。

既然是重点地区，日伪在进行“讨伐”时便既肯下本钱，又肯动脑筋。这次“讨伐”中，在军事上，他们用的是以日军为主，并从辽宁调来伪满“皇军”——伪靖安军，采用四面包围、重点进攻的战术；在经济上，他们实行封锁政策，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实行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在宣传上，他们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以孤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敌人的这些宣传口号确实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

1934 年 8 月 21 日，工农义务总队的两位领导人平南洋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几个叛徒闯了进来，二话没说就先把枪给他俩支上了。

当时，平南洋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就让叛徒们给两手反扣绑起来了，于洪仁当时正好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上，那几个人难以立即接近他缴他的枪。于洪仁平时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并且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在这危急时刻，他迅速伸手摸枪，但是还没等他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就这样死在了几个毛贼之手！那几个歹徒不但杀了于洪仁，而且将队内的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驱逐，还虏走了 50 多个人去当了土匪。平南洋本人则因有共产党员陶净非等人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

这次叛变事件使平南洋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委认为，不能让这面旗帜就这样倒下去，周保中也同意了这一意见，于是，他们在 8 月末和 9 月初的时候，又将其恢复起来。平南洋李荆璞还是这支队伍的队长。9 月份，敌人的“讨伐”开始了。敌人来势汹汹的“讨伐”，对绥宁地区的抗日武装来说的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讨伐”一开始，抗日武装便遭到了不小的损失，活动在宁安西北山区的反日山林队被打死 200 多人，其余的人把枪埋到地下，四散而去；做为同盟军主力的宁安游击队和工农义务总队被迫转移到宁安南部山区。敌人则跟着他们屁股后面就来了。日军、伪军、警察、自卫团一齐出动，就连飞机也经常光顾同盟军的头顶。在那段时间里，平均四五天就要打一仗。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宁安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反日同盟军和前来支援他们反“讨伐”的第二军派遣队立即采取冲破包围、开辟新的游击区的作战方针。即以工农义务总队与第二军派遣队之第 4 团第 5 连向宁安以东发展，另以宁安游击队一部到西北山去活动，形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此外，让救国军王毓峰部和第二军第 4 团 4 连分别返回南湖头和汪清，借以分散敌人的兵力。与此同时，中共宁安县委还专门通过了一个旨在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于反对“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口号和措施。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再加上各部队都打了不少胜仗，终于使日伪寄予极大希望的秋冬季大“讨伐”以失败而告结束。1935 年 1 月，已经就任中共吉东特委（因吉东局在 1934 年 6 月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满洲省委遂决定撤销吉东局，成立吉东特委）书记的吴平到达宁安。吴平告诉大家说，省委和特委对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工作很满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准备将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部队统

一改编为抗日联合军性质的部队，以便贯彻由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纲领，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部队。

中共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根据吴平的这一指示精神，很快就做出了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的决定。在获得中共满洲省委的批准和原绥宁反日同盟军内各部的一致拥护之后，反日联合军第5军正式成立了。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健东任参谋长。1935年2月10日第5军公开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说：“最近改编的由绥宁反日同盟军所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是反日救国的中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的，它是东北有历史的绥宁各地的救国功绩显著的军队。……这次改编的反日联合军第5军和珠河、延寿的第3军及密、饶一带的第4军为同一系统，和南满的人民革命军第1军及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2军结成亲密的联系，共同反抗日本强盗。为了统一力量，发展救国运动，在这里列举出本军的行动纲领的最主要内容，对全中国及全东北的同胞加以说明：

“第一，我们的任务是专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推翻其走狗满洲国，恢复中国领土，以建立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政权为目的，不是实现共产主义或者实行匪贼活动，而是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反日救国运动。

“第二，我反日联合军是人民的救国武装队，它虽然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但凡是我中华民国国民，不论地主、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艺者，不问政治派别，都有参加的权利……”第三，反日联合军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民众必须加以支持……

“第四，被日本强盗及走狗集团满洲国压迫、欺骗和利用的亲日军队、政治家、社会团体，若能秘密地组织或者回到救国运动方面来，都加以欢迎，而且要互相帮助和合作。”

从上面这段宣言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爱国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周保中和他所领导的第5军党委的高人一等的政策水平。

从1935年1月到3月这段时间里，第5军共编成了两个师，每个师3个团，共有900多个人，800多条枪。平南洋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1师和第2师师长。

第5军成立后，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特别是由于统一战线的“路线对了头”，使得伪靖安军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有的伪军听到我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专打日本兵”的口号后，对被围的日本兵不予支援）面前不断发生哗变事件，有不少人还在打死日本人后携枪前来投奔，搞得日本人对伪靖安军越来越不放心，最后只好把这支伪军调回原驻地辽宁去了。伪靖安军一走，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在东部，伪警察队的警察们说：“人家抗日军在宁安把满洲国的皇军——靖安军都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我们这些破烂兵呢？”吓得他们从此不敢出战；在西部，伪军们私下里都说：“红军真勇敢，专打鬼子，这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我们不能打红军。”

这样，日本人不但没能去掉他们在绥宁的这块心病，反而又多了一块心病。

第八章

如果你要是真想知道到底什么叫

“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话，那只要看一下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建立抗日游击队的过程就会一目了然了。

在经历了最初三次大的挫折之后，他们没有气馁。

1933年6月，汤原中心县委派出了戴鸿滨、黄吟秋、徐光海等人到义勇军“青山”、“占中央”、“阎王”等部中去工作。这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中心县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定以青山等部义勇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但是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不宣而散了。残酷的现实使汤原中心县委认识到，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党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并形成骨干力量，才能打开汤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然而，祸不单行。正当他们一面号召在义勇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认真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一面集中40多名党员积极准备建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时候，由于特务告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1933年10月4日，在日军的大搜捕中，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委员金成刚（女）等12名共产党团员和爱国青年被逮捕，施以严刑后活埋在深坑里；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一起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被日军搜出来，当场用刀砍死在田野里。骤然间，汤原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中……在这场浩劫中还有一个幸存者，这个命特别大的人就是中共汤原县委委员夏云杰。

夏云杰，这个从山东沂水县闯关东来到东北的汉子，种过地、做过工，还做过生意。曲折的生活经历和朴素的爱国心使他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1932年9月，他被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吸收到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后经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介绍入党，不久即因工作积极、能力也挺强在1933年8月举行的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第6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县委委员。

现在，县委的其他人都不在了，夏云杰成了汤原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他勇敢地站了出来，通过秘密联络的办法，把汤原各地的党组织逐渐联络起来，他自己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因此夏云杰在恢复党组织活动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创建反日游击队。

创建游击队就要有枪，而枪却在敌人手里。怎么去夺呢？1933年11月末，夏云杰先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了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在小于把那里的情况摸得差不多以后，他又派外号叫镐头的徐振江和小于，还有一个叫老曲的队员以卖大烟土为借口，再次混入黄花岗自卫团的营房。夏云杰带着20多个队员拿着一枝大枪和一把没有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等到那帮团丁们纷纷围上来买大烟土的时候，镐头和小于两人突然发出行动信号，这时，隐蔽在院外的20多个徒手游击队员一拥而进，三下五除二地缴了这帮团丁的枪。此次行动十分顺利，共缴得大枪14枝，短枪2枝。

这次缴枪行动的成功，使汤原游击队再也不是一支玩“空手道”的队伍了。

1934年2月8日上午，戴鸿滨根据夏云杰的指示，率6名队员佩带两支手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这时，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和他舅舅两人

满脸是血，吵吵嚷嚷地一边撕打着一边向伪自卫团的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里去讲理。戴鸿滨等人则跟在后边“拉架”，这一行人热热闹闹地没费多大劲就闯过了哨兵的拦阻，进入了伪自卫团的大院。

伪自卫团当兵当官的一看来了一对打架的，觉得挺有意思，一边幸灾乐祸地喊着“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一边走出来看热闹。戴鸿滨一看他们人都出来了，便亮出了手里“家伙”，伪自卫团团长高魁一见这阵势，当时就傻眼了，只好让团丁们把14支枪全交出来了。

戴鸿滨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并没有走，他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结果又缴了13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的枪。此次缴枪成功，一举扭转了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的局面，大大增强了这支抗日武装的战斗能力。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夏云杰带着他亲手创立起来的这支游击队在太平川一带屡战屡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共满洲省委在7月份的一个文件中对汤原游击队的评价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反日纲领，成为下江反日反满的唯一中心力量。”8月份，夏云杰奉命调到哈尔滨参加中共满洲省委举办的训练班。主持训练班的省委领导对他的评价是：“深刻学习，对党忠实，能够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并正式任命他为即将于10份成立的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总政委（戴鸿滨为总队长）。

27 毁家纾难

大火一场接一场地冲天而起！

汤原县境内的几个大户人家的家园在这熊熊的大火中相继化为灰烬。

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火着得太不一般了！

这火着得的确是不比寻常——是它没人救，尽管这些房屋的主人就在跟前；二是纵火者就是一贯反对杀人放火的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

显然，这把火是经那些被焚房屋的主人的允许之后才着起来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做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决定的主人们——黄友、张传福、刘铁石。

先说黄友，这位在冯仲云“脑海里永远不能忘的人”，此人本是汤原县的一个大地主。就他这出身，如果是在那个大搞阶级斗争的年头，准是一个被革命群众带上“四类分子”帽子的专政对象。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不爱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黄友他并不愿意自己单独在家享福，看着可怜的同胞遭受日寇的压迫，于是他发奋起义，将自己的土地全抛弃了参加到抗联游击队里工作去了。”

由于黄友后来在抗日队伍里并不是显赫的人物，所以对于他当年在所做的具体工作，今天我们已经所知无几，但他却有一件很出名的“代表作”——“牵驴”。

那是抗联三路军成立以后的事情了。有一天，敌人发现了他并将他逮捕，要他带路破坏三路军的后方。对此，他一口答应了。那些鬼子还以为这个“老地主”回心转意要给他们出力了呢，跟着他向汤旺河上游的小兴安岭里走去。其实那儿哪有什么三路军？哪是什么三路军的后方啊！那里有的只是刺骨的寒风满世界的冰雪。黄友就是成心把日寇们送进迷宫好饿死他们的。等到他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便瞅个空子溜走了。

黄友一走，那些跟着他进山的鬼子们可就惨了。你别看这帮洋鬼子能从他们日本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真的一进了风雪茫茫的小兴安岭，那就真成了牛犊子叫大街——懵门子了。左走是山，右走是树，前走是冰，后走是雪，反正就是走不出来了。这样没几天便不断有人因缺粮断炊冻饿而死，700多人只跑出来30多个。而黄友自己则也因衣服不多又没带火而把双手双脚都冻坏了，幸亏被咱们自己人发现了才没被冻死。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忘了他，两年后专门派部队把他杀了。

据说，黄友死前毫不屈服，破口大骂。

和黄友的出身差不多，张传福也是汤原县太平川田家屯的一个大地主。他家有300多响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的。1933年，他接受了敌伪的任命，担任了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虽然是给日本人干事去了，但他的良心并没有“坏了坏了的”。当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以十分残忍的手段屠杀爱国群众的时候，他感到心里很惭愧。听到夏云杰、冯治刚、刘铁石等人拉起队伍公开出来抗日的消息后，心里也很佩服这些人，但当县委书记夏云杰派他的结义兄弟、游击队员蔡玉斌、王甲长前来劝他参加抗日时，他却露出了一脸难色：“不抗日，看来别无出路，眼下日本人欺人太甚，拿咱中国人不如鸡狗，说杀就杀，说刚就刚，不赶走这些强盗，连老祖宗都对不起。参加抗日吧？可惜我张传福投降过日本人，虽说没有干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共产党也不一定信得过我。手下的兄弟心也

不齐，往出拉队伍恐怕还要费周折。”

蔡一听张出此言，知道有门，便对他说，“张兄如果有意抗日，何必顾虑？如今国难当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抗日就是一家。过去你张传福虽然给日本人干过事，那是出于无奈，你的事我还知道吗？错了咱们就改过来，谁还会纠缠旧事！”“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张传福是个精细人，他对蔡王二人的话还是感到不放心，“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遵守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出面和我谈谈。”

张传福从那以后，对共产党游击队开始有了好感。但日本人和汉奸对他却有了戒心。加上与他平时就不太对劲的警察署姜署长又在日本人面前给他上了不少的“眼药”，所以他在日本人那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一次他被日本守备队传到县城里，一进门，鬼子队长就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又打了他两个耳光，大骂：“八路，良心大大地坏了！”过了一会又像哄小孩子似地对他说：“张的，以后忠心地，金钱、地位，统统地给！”接着就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

张带着一肚子气回到自卫团后，对兄弟们说，“上头有令，‘狗’也盯着我们，走！带上武器，跟我去打马胡子，不过有一条要记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要是打了，小心自己的脑袋！”说完，领着队伍在山里转了一圈，朝天上放了一阵‘朋友枪’就草草收兵了。

没想到姜署长又把这件事报告给日本人后，日本守备队长大骂县伪警察大队长廉秃瓜子，接着又命他去整治张传福。廉秃瓜子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就找张传福算帐了。他来到张传福自卫团的驻地后，不见张传福来接，气得浑身发抖，站在门外大骂：“张传福，你瘟死了吗？”

张传福闻声出来报告说：“昨天夜里自卫团打了一宿的仗，弟兄们正在休息。”

廉秃瓜子用马鞭狠狠地抽了他三下，然后又指挥警察把张打了一顿。临走时还交待说，让张传福第二天到县里去找皇军领罪。张传福从来也没吃过这样的亏呀！回到家后，他把哥几个都找到一起，恨恨他说：“这几天叫鬼子、汉奸折腾了好几顿，我哪能咽下这口气？看来，我得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了，你们几个要是能守住家地过日子就过，守不住就各自找出路去吧！”全家人都出来相劝，但张传福却是下定了决心。

游击队一直在关注着张传福的情况，张传福的这些举动早就有地下党的人报告给游击队了。为此，县委专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戴鸿滨主动要求去作张传福的工作。虽然有人替戴鸿滨担心，但戴自己却并不害怕。他说：“我这次去不是去送死，危险和希望都是有的，还是成功的面大。《三国演义》里不是有关云长单刀赴会吗？我就不能去会一会张传福吗？”

夏云杰对他说：“这次去会张传福，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可怕。但却要注意随机应变，张传福要是不仁不义，就先下手。要想尽办法争取他起来抗日，这个人影响很大。希望这次会见，马到成功！”

戴鸿滨走后，夏云杰把游击队调到了太平川附近，在距戴、张会面的地方三里地外埋伏好，又派了5名有经验的党员到会面的地方暗中保护戴鸿滨。但是，这一切安全措施最后都没有用上，因为戴、张的两人会面谈很顺利，张传福当场就要回团部把事情挑明，准备“能拉出几个就拉出几个”。

对此戴鸿滨没有同意，他让张传福回去以后再进一步做一做自卫团员们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再往出拉。

张传福回去后便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到 1934 年农历十月二十九这天，他认为时候到了，便派人给游击队送信。然后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出去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

等到了荒山脚下的时候，张传福对大家说：“弟兄们都跟了我一年多了，拍着良心想一想，我对你们哪一个也不薄。现在，我决心跟共产党上山抗日了，从此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弟兄们你们有愿意跟我抗日的留下，不愿意抗日的就各奔家乡；但有句话得先说明白，如果有谁日后为鬼子、汉奸卖命，小心以后我的枪子不认人！”

张传福的话一说完，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们都愿意跟他走。他从此带着这些人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张传福等人的加入，不但使游击队人多了，而且装备也很快得到了改善。张家有钱，张传福让家里人卖掉自己的家产，为游击队买了 60 多套棉衣、机枪（价值 1200 块现大洋）和手枪。他弟弟张传禄有些心疼地对他说：咱们是自己家带枪上山抗日的，还花这么多钱干啥？张传福则说：我们抗日连命都豁出来了，还要钱干什么？

张传福带着自卫团来到游击队后，夏云杰将他们这部分人改编为一个中队。自然，中队长就是由张传福来担任了。刘铁石，是年仅 27 岁时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长的年轻人，心高志大，早有一番了不起的抱负：“首先掌稳教育局的大权；其次把我的儿子、侄子都分批培养起来，念完中学后到各校去当教员，他们再结交朋友，培养学生，二十几年我的人就可以遍布全省教育局。那时我就可以竞选县议员、省议员、国会议员，直至同蒋介石竞选总统。”

但是正当刘铁石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碎了他的美梦，他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所蒙受的耻辱”和“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负的责任”。为了不给鬼子的奴化教育效力，他决定辞去教育局长的职务。但是，辞职后又该于什么呢？这个他倒没有想好，这时，他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虽然以前他与夏云杰只是因为买烟卖烟而常常聊上几句，但他总觉得这个生意人不比寻常，来历不浅。可当他来到老地方时，夏云杰早已不知去向。

下了辞职的决心以后，刘铁石先把妻子送回乡下，然后便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清晨，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一个人骑着马回到了乡下。

回到家后，刘铁石心里很是苦闷，便不停地打探城里和外面的消息。这时，中共汤原县委也注意到了他，特派宣传部长刘忠民去找他作工作。刘忠民告诉他说，现在外面已经拉起来许多抗日的队伍，并对他说：“你是教育局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在县里和上层人物也有关系，你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为抗日出力。”还介绍他参加了“反日同盟会”。

1933 年夏天，刘铁石终于见到了夏云杰，这时夏已经拉起了队伍。他向夏提出要跟着上队，夏对他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抗日工作……”

刘铁石在汤原有威望、有名气，当然也就是敌人重点注意的目标。所以没过多久他就被抓了起来，是他家里人卖了 20 多石黄豆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从狱里出来后，刘铁石又去找夏云杰，说这回我得跟队伍一起走了。可

夏云杰对他说，你还是最好先别上队，现在游击队里的枪支弹药都很缺，你最好能利用你的关系再给搞点。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就再回去干。

刘铁石到处为游击队搞枪支弹药，被敌人知道了，就要抓他。为了不连累全家，也为了躲避敌人，他悄悄地把自己家搬到了一个小屯子里。但就在他刚刚搬到那里的第3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他说：“爸爸，鬼子来抓你了，快跑吧！快……”还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本鬼子带着伪军正端着枪向他走来。情况万分危急，以至于刘铁石在多年后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没容我思索，一个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刘显（刘铁石的名）的有？’从鬼子的问话和神情我断定他们不认识我。我急中生智，用手指着胡家窝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在这帮抓我的人中，多数警察是认识我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中国人的良心而出卖我。后边的两个翻译，一个正是出卖我的姓金的汉奸，但他不认识我本人。另一个原来是夏云杰游击队的少年连连长赵东国，曾和我多次接头。后来不幸被俘，被迫做了翻译。此时，他向我递了个眼色，我窥空回了个眼色，彼此默契后，见他对鬼子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伙人便朝西院走去。“我趁机借助于房子、柴垛和行人的遮挡，向村东头疾行。正走着，遇见我大姐。她见我神色紧张，便问我：‘老兄弟，怎么了？’我急匆匆他说：‘鬼子正在抓我。’大姐一把拽住我说：‘决躲到猪圈里去。’我一看那不是藏身之地，又继续向村外跑去。“正在我朝东猛跑时，一个骑大自马的人迎面而来，到我跟前他问道：‘干啥去？’我抬头一看是本屯的耿三爷（开明绅士）。他一听鬼子正在追捕我，便立即跳下马来，摘下身上的匣枪，连同马缰绳一块递给我说：‘枪和马我都不要了，都送给你，快骑上往东赶，鬼子撵不上你。’我接过枪，翻身上马。耿三爷又接着说：‘老先生（当时人们对我的尊称），快上山找游击队去，上队打死也合适。’

“我骑马一口气跑到河东，甩开了鬼子……”

当夏云杰得知刘铁石逃出来的消息后，便立即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刘铁石上队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战斗。这次战斗同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格节河边的一片树林里，我们（刘铁石与其两个内弟）同游击队相见了。孟副官握着我的手说：‘刘先生，您受惊了，我受夏云杰之托接您上山……’

“孟副官叫我先休息一下，吃完了饭好赶路。这时我才觉得又饥又累。几个战士忙着做饭，只见一个战士从河里舀了一盆水，倒进一些小米就放在火上煮了起来，谷批子和谷糠漂在水面上。还有一个战士手里提着刚刚摸来的鱼，膛也未开，扔在盆里就煮上了。

“我心想，做饭不淘米、做鱼不开膛，这饭可怎么吃呢？饭好了后，孟副官客气地请我吃饭，可是看着饭，我怎么也吃不下去。孟副官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要不你去你妹夫家吃点吧，饿着肚子怎么赶路呢？’我一听心里挺高兴，等他们吃完饭，我们就向离仅半里地远的我堂妹家走去。

“到那里后，听说我没吃饭，妹妹赶紧点火做饭，我和小内弟到另一个院去休息。不一会就听到‘叭叭’几声枪响。原来是一辆日军的送款马车经过这里，有六七个日军在后押车。站岗的小战士没经验，一见他们慌了神，冲着马车打了两枪。枪一响，日军如临大敌，滚下马车，把机枪支在上院外

的猪圈上，冲着院子开了火。

“我和小内弟赶紧贴着墙根往回跑，这时两个日本兵已到了大门口，幸亏大门没上底闸，我就地一滚便进了院。跟在后面的小内弟翻身上了院墙，刚一上去就被击中了，‘啊’的一声掉到了墙外，院内大内弟已倒在血泊中。院里院外打得十分激烈。后来多亏义勇军从另一个大院支援我们，几个日本兵因腹背受敌才逃跑了。

“为了我一顿饭，使三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心中悲痛、悔恨，更对日本鬼子刻骨铭心的仇恨。

“到游击队后，夏云杰派我担任了军需官……”

28 智斗顽敌

张传福带着太平川自卫团投奔游击队的消息一传出，敌伪又惊又怒，并派出大兵对其进行大讨伐。他们从佳木斯调来好几百名日军和两个团的伪军，在太平川到格节河金矿摆开了 10 公里长的阵势，想一举将汤旺河畔的这把火给扑灭。

敌人来势汹汹，但夏云杰可不是那种只知拼命的莽汉，他不和敌人硬拼，而是把队伍拉到山里去，等敌人迫进山后，再找有利地形打他们。这样一来，敌人不但没有消灭游击队，反而倒死了不少人，最后只得收兵回营去了。

没打着游击队，怪谁？

日本人对和他们一起行动的伪军说：皇军是大大的能干的，是你们能耐的没有！你们也配拿枪吗？

日本人不光是这样说，而且说着说着还真的把一部分伪军的枪给缴了。这一下把那些本来就对日本人有些反感的伪军给弄火了，就连伪军的旅部也告诉下面要准备防止和反抗日本人再来缴他们的枪。有一排伪军还杀死了日本指导官和翻译官，公开进行了哗变。这时，游击队则抓住这个机会发动群众，去缴伪军的枪，一时间搞得敌人草木皆兵。而他们自己也在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打敌人、缴武器。其中在下江一带广为流传的“四扮日本指导官”的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堪称“黄金搭档”的朝鲜族战士徐光海和裴敬天。

徐光海老练、勇敢，遇事沉着，通晓日语，一脸的络腮胡子，长得也像日本人，当然就是“日本指导官”了；而裴敬天不但会说汉话，而且也会讲日语，自然就是翻译官的角了。这两个人第一次出场亮相的时间是在 1934 年秋天，地点是在汤原县龙区，任务是按照夏云杰的指示去除掉一个经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药房先生王风舞。

“日军大佐”徐光海知道王不懂日语，便用朝鲜话问道：“你的，内嫩摸儿哈那？”

王风舞回答说：“太君，我是行医看病的。”

“啊！看病的，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八嘎呀路！”徐光海对“日本兵”说，“代一嘎路（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的有联系。这不，前几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那就把他带出去死了死了的有吧！”

第二次扮日本指导官是在 1935 年正月十四那天。地点是在桦川县的火龙沟和依兰县的舒木河。那天火龙沟的大地主姜海泉正在组织大秧歌队准备欢迎一支日本守备队的到来。没想到却先迎来了徐光海他们。徐光海他们在大街上等看热闹的群众来得不少了以后，便露出了真面目，在向群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工作后，便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仍然以日本指导官的身份来到了舒木河不费吹灰之力就缴了那里自卫团的枪。

第三次装扮日本指导官是在 1935 年 8 月，顺利地缴了太平川反动地主耿子修、乔玉柱家的枪。而在此后没几天，他们就又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这第四次出演的出发地是一块苞米地。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外，还有 20

多个“警察”跟在后边。

何木林一听皇军来了，急忙来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的“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房。何家有钱有势，家里的几个儿子也都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等人一时也不好下手。这时，正好何家的三个儿子回来了，他们身上都带着匣枪。一见上屋有“日本人”，便到下屋去了。但当他们出来时却没带枪。戴鸿滨估计那肯定是一支没领枪照的枪，便到下屋找出那支枪，把它交给了“日本指导官”，还一边使眼色一边说：“太君，他家窝藏枪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等到何木林把家里的40多支枪都拿出来后，“警察署长”戴鸿滨对“日本翻译官”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用。”“巴嘎呀路！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然后又冲着吓得抖的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心，不予治罪了，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吓得赶紧让他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40多支枪，送“皇军”走了……。

夏云杰对贯彻“中央指示信”精神十分得力，自从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和汤原一带的各支抗日部队关系弄得非常好，经常和他们一起战斗。在这些反日队伍中就有一支是由格节河金矿警队改编的“文武队”，队头名叫冯治纲。这支队伍曾经和游击队一起联合采取过多次行动。经过夏云杰的不断教育和启发，冯治纲对党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就主动提出要参加游击队。1935年9月，他终于如愿以偿，他的“文武队”成了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第2中队。

1935年12月，赵尚志的三军李延禄的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他们会师了。赵尚志来了以后，根据夏云杰的建议，利用一次喝酒的机会成功他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个伪军连长，使他带领全连把武器交了出来。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批武器（两挺轻机枪，百余支步枪）全交给了夏云杰。这样，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更强了，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革命军第6军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1936年1月，以夏云杰为军长、张寿钱代理任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宣告成立，并发表了如下成立宣言：

全东北工农劳苦群众及各反日义勇军士兵学生们：万恶的日本强盗占领我们东北四省已经有4年多血腥的惨史，在这4年多的残酷的黑幕里，日本帝国主义一贯的执行其殖民政策，轰炸了不知多少城市，烧毁了不知多少农村，屠杀了不知多少劳苦群众，掠夺了不知多少土地财产，强奸了不知多少妇女，整日炮火连天，杀声震耳，日本强盗用尽了杀人的武器无时不在向我们全东北民众轰炸与扫射着，这就是说：我们全东北民众日日都有掉头的危机……

四年多被日本帝国主义血洗压榨中的东北民族，不但没有在他的奴隶的统治中屈服着，没有甘心做亡国奴，反而激起了全东北反“满”抗日的怒潮日益澎湃起来，东北的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及各反日游击队，各反日义勇军等，到处与日“满”匪军做长期的战斗，予它无数的打击，开展了广大的反日游击区，团结了广大的反“满”抗

日群众，产生了更多反日民众武装队伍（如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等）；及地方反日政权（如人民革命政府、农民委员会等）最近汇合东北一切反日队伍，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号召全东北民众参加伟大的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不但能完成东北民族的独立解放的任务，同时还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行反革命反苏联战争爆发的前夜，予它致命的打击。

在东北民族革命浪潮这样的高涨中，我们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两年来在与敌人的血战中，已经获得许多光荣胜利的历史了，如宝宝山之战，黑金河之战，凉水河之冲锋，三甲阵地解除敌之全体武装，关旅二营一连之全部缴械，与屡次的冲破敌人之大举讨伐，真使敌心惊胆战，同时在汤、萝、绥及富锦地域开展了反日游击区，号召与领导了许多反日义勇军，团结组织与领导了大江广大的劳苦民众，进行了反“满”抗日斗争，实际上得到了民众的深刻同情与拥护，因此汤原的民众反日游击队的声望和威信，在全东北日益高涨起来，但是我们为了更有力的为东北民族解放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为彻底实现东北民族自由平等而战，还需扩大与坚强我们的队伍，所以我们继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之后，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是有万分的必要，并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由是我们敬告于全东北的劳苦民众之前，特此宣言。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 1936 年 1 月 30 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6 军的成立，标志着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汤旺河畔的大火越烧越旺了！

第九章

29 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候，再一次向全国同胞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呼吁，是为有名的“八一宣言”。

为抗日被国告全体同胞书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的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们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热、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4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是，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即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郭、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的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对，就是日寇提出要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的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不能！绝对不能！……，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19路军及民众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敌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英勇作战，都在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都在表现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

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与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使国防政府真的能担起国防重任，为使抗日联军真的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做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做先锋，有千百万民众做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5年10月，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行程达25000里的长征，到达陕北。有关专家认为，此举“不仅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红军的对日作战创造了立足点与出发点，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后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与台柱子准备了条件”。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又通过了两项重要的决议：一为《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一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已经抵达陕北的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打通抗日路线”，决定“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为此，红军于1936年2月20日发动了意

在经山西去绥远，与入侵绥远的日军作战的“东征战役”。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则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了党内存在“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系列举措，对全国，特别是对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以后，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30 六三指示

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后，东北抗联即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此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运动便由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直接领导了。在抗联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六三指示信”就是于1935年6月3日从莫斯科发往东北的。

下面便是笔者根据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总政治部印刷所于1939年7月20日翻印的信文所做的摘录：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在东北的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在中央领导之下，与日本帝国主义“满洲国”作英勇斗争，在各地建立和扩大了我们的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及一切反日队伍；初步地实行了统一战线，扩大了党在民众中及其他反日义勇军中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成绩，东北人民的英勇的反日运动，游击队的奋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全世界人士的赞扬。最近研究了你们的文件，先给你们这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游击运动的问题：

（一）游击运动的新特点和我们的策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三年来的统治，成千累万的人民被屠杀，无数农村被毁灭，土地被侵占，银行、矿山、铁路与森林被没收；民族工商业的倒闭，严重的水灾与病疫，造成广大劳苦民众的失业贫困与流离，厉行公卖与诱食大烟、白丸，强迫奴化教育，使东北人民处在残酷的血腥的人间地狱。

这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他们用各种方式（请愿、抗议、罢工、游击战争、武装起义）进行反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的斗争，即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也表示不满意。因此在东北造成了广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

目前游击运动的特点，其优点是：1. 相当的扩大工人农民的参加，使游击队的成分发生改变，旧的领导的变更，新的领导的产生。

2. 一部分的山林队、义勇军与民众的关系有了相当的改善。

3. 新的队伍不断的产生与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的形成与不断扩大。

4. 国民党的影响减少，共产党的影响扩大，许多队伍在我们影响下初步的联合。

其弱点与困难：

1. 没有统一的军事上与政治上的领导，存在着散漫的与自发的性质。

2. 政治上的薄弱与组织上的复杂，一部分山林队和义勇军与人民关系的恶劣。

3. 党与其直接领导下的游击队的薄弱，未能结成广大的统一战线。

4. 武装与给养的困难。

5. 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不断的残酷的进攻。估计到这些优点弱点与困难，共产党应当知道，这一切的有利条件，将给我们以可靠的基础，使东北反日游击运动成为一种不可消灭的力量，使这一运动必然的发展与扩大起来，同时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六大纲领，得到中国各地极广大反日民众的拥护，江西红军西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这一切的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给了东北民众解放以光明的胜利前途，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做估计到目前的状况，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阶段而是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之时期，因为现有的反日力量还不可能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驱逐出去

（二）关于游击队的问题：

甲. 目前我们怎样来进行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因此——第一，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特别是我们的队伍，要使其成为强有力的，能够影响一切反日武装力量的中心队伍，一切拒绝民众入队的行为都是错误，入队条件不要过高，只要是真正参

加反日的，就把他吸收到反日队伍里来，绝不能因为防止奸细的混入，或因缺乏枪支给养而把广大的反日民众拒绝门外，只有吸收广大的民众到队伍里来，才能真正反对奸细和解决给养问题。在游击队中肃清日本奸细及民生团走狗是必要的。第二，要实行的全民统一战线，在游击运动现阶段中，很大的一部分工农劳苦民众参加了反日队伍，使游击队的成分和领导有了新的变化，因此，现在东北各种反日队伍，一般的都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与可能，我们不应机械地背诵过去的4种游击队的公式，而现在要普遍与各种反日武装队伍，建立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我们现在要巩固和扩大建立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一类的组织，……号召东北各种反日武装团结一致，……我们要加紧各地的群众工作，准备召集全东北义勇军代表会议，建立全东北的军事领导机关，如东北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的名称——统一游击队的领导和指挥，这里必须指出：（一）你们在各地建立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是正确的，如认为是上层勾结或者说只有有巩固的下层基础，才可以结成上层战线是错误的，根本取消联军司令部更是极大的错误……。（二）不能要等人家来找我们联合，我们应该是统一战线的主动者。（三）统一战线的领导条件不要太高而主要大概是：1.不投降不卖国与日帝及‘满洲国’作战到底。2.拥护民众的利益，给民众以民主自由。3.允许民众武装民众联合共同抗日。4.对于那些还不愿意接受上述三个条件，而同时仍可以和我们临时共同作战的反日队伍，可以和他们订出临时作战协定，这一协定的条件不要太严格，一般的大致是：1.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不得出卖友军，不得临阵私行逃跑。2.没收日帝及走狗的财产，不赶边猪。3.战利品共同分配等……

“到底哪些条件最好，你们应该随地根据具体条件来决定和执行。

“目前对于我们最主要的是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破坏统一战线，孤立我们队伍的策略，因此对于统一战线及运用这些条件时，不是机械的应用，而应当估计实际的环境，各队伍的具体条件，只要是抗日武装队伍，只要是有一点的可能我们就利用各种形式与他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不要因为某些队伍中，有吃大烟的或暂对民众的关系尚不密切，我们就认为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障碍……。

“第三，吸收其参加联军司令部，使由临时的联合走向经常的团结。对于那些正要投降的部队，我们要宣传他们，投降就是缴械送死，宣传他们不当亡国奴，号召他们反日到底，对于那些已经投降不积极进攻我们的部队，我们要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分散他们，并鼓励他们继续抗日，嗣后各地军队（我们也好联军也好）的名称不要加以赤色，或工农等字样而应称做抗日救国军或人民革命军等，以便能够号召广大民众，同时避免日帝的特别注意。

“（五）党的工作：

“（1）为要实现以上的工作，党……首先要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解释工作，使之正确的了解这些新的策略，加强游击区党的领导，在游击区广大的发展同志建立支部。（2）要使党的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游击运动，必须将机关的一部设在游击区里改造党组织庞大机构（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缩小管理的区域，使之能灵活的巧便的独立工作，适合战争环境，在游击区党应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准备在游击区退出时，能留在地方秘密的工作。（3）极大的改善干部政策，……要珍贵地保护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不要轻于牺牲和损失，……要提高警惕性来反对奸细，加紧秘密工作，仔细考察干部。（4）要加紧与关门主义及一切右的倾向做斗争，在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中，要估计到干部的幼稚，要多给以教育说服耐心的解释。

“向东北在一切反日战线上英勇战斗的党员战士及民众或布尔什维克的战士敬礼！”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这封来信后，即向下做了传达。虽然有的同志对这封

信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但这封信的精神到底还是很快地被贯彻执行了。

31 统一建制

就在东北党组织贯彻“六三指示信”精神的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又向他们发来了与这封信精神一致的另外两个重要指令。一个是 1935 年 11 月发出的关于取消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一个是 1936 年 2 月提出的《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

“六三指示信”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随后做出的这几个决定，很快就在东北发生了效力，使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格局：

第一，使党在东北的领导机构发生重大改变。1936 年 1 月 9 日，中共满洲省委被撤消，代之而建立起了中共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北满）省委及哈尔滨特委。

第二，促进了东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的抗日联军的出现。1936 年 2 月 20 日，以当时在东北最著名的几个抗日领袖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等人和汤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联名签发了下面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谨向全中国同胞及全东北一切抗日武装军队同志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图藉“防共自治”夺取我黄河以北五省，提倡“日华提携”，欺骗全世界，以实现其吞并我全中国的企图。近来日本屡次向和平的苏联挑战，又与德意两国相勾结，并对英、美、法准备开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冒险，必将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我 4 亿 5 千万同胞的生命、财产做为最大的牺牲品，使中国同胞完全变成亡国的牛马和奴隶。

每个有热血又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除抗日之外，别无生路。因此，自去秋以来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国运动，虽多少有些曲折，但“抗日则生”“不抗则死”，已变成了全国同胞一致思想和行动。

现在全中国必须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合军，”全国总动员实行对日作战，因为这一抗日救国运动，实际就是中华民族国家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关键。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各军与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军及各反日游击队，为了收复东北领土，为了中华祖国，作战四年，在东北反日总会的指导下，我们将各反日救国武装同志及反日民众的战线统一起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誓以游击战争进行奋斗，并期其彻底。

现在根据全国救国运动的进展，必须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的组织、统一抗日军队的行动。因而就要改革抗日军队的建制、废除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全部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及抗日军××游击队，兹宣布如下各条：

（一）东北抗日联合军由于其政治上与民众救国运动，有着紧密的关系，故均需受东北反日救国总会的指导。

（二）全中国同胞及一切反日武装军队，不分宗教信仰，政治派别，社会团体，性别和富贵，皆有抗日救国之义务，我东北抗日联合军，当亦不论海内外同胞、南京政府派别，在野政党，都要共同一致拥护中国红军的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的主张。

（三）东北抗日联合军，应随时准备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合军，并欢迎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合军，以促使政府建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四）欢迎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如鲜人、内蒙古人、台湾人、个人或团体参加我东北抗日联合军，结成少数民族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反帝国主义的朋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相提携。根据目前的国际政策扩大国际影响，以使英、美、法国及其他朋友社会主义国家

都同情或赞助我抗日联军。

（五）昨天的国贼——日本间谍，如今天能痛改前非，在今后决心为中华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尽力，投入我联合军者，我军则‘既往不咎’，并与之今后抗日对策上相互提携。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今天决不是一个什么强国，只不过是一些极其凶恶的财阀，贵族（地主）和军阀等一时逞其横暴罢了。……我们深信中国的抗日救国事业必然会获得成功与胜利！”

上述宣言发表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主体，联合一切反日爱国武装力量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各个部队便陆续成立起来了，东北的武装抗日斗争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向全国发出的号召，首先在东北得到响应。东北的抗日斗争正在走向辉煌！

第十章

在东北抗联的历史上，到底是先有第1军，还是先有第2军？由于第2军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第1军和第5军之间，所以他们与这两个军的联系也更为紧密。除了前面讲到的与第1军会师那尔轰以外，第2军的领导人与第5军的领导人也有两次重要的会见。第一次是1936年1月中旬王德泰、李学忠在宁安县镜泊湖游击根据地与周保忠会面。在这次会见中，他们对两军的整顿问题进行了讨论，做出了第2军正式成立军部并扩编为两个师的决定。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但是，这个决定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执行，这是因为第2军与第5军领导人在第二次重要会见中又做出了新的决定。1936年1月，前去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第2军政委魏拯民从苏联回来了。2月5日，魏拯民就在中共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的陪同下到第5军军部会见了周保中。在这次会见中，魏拯民向周保中传达了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关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按游击区建立南满、东满、吉东和松江四个省委、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指示。2月9日，魏拯民动身西去。在额穆县境内与王德泰、李学忠等会师。然后一起南下安图游击区，并于3月上旬在安图县一个名叫迷魂阵的地方召开了第2军领导干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魏拯民、王德泰、李学忠、金日成、周树东、安凤学等人。迷魂阵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部队改编和分区作战的问题。

根据这次会议作出的决定，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成为东北各抗日部队中最先改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新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按照中共的建军原则，从军部、师部都建立了党委，政委兼任党委书记。第2军党委由9人组成（军长、政委、军政治部主任以及下属的3个师的师长、政委），魏拯民任党委书记。

抗联第2军成立后，各师仍然继续进行分区作战。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第2军的部队不断取得胜利，队伍得到了很大发展，游击区也迅速扩大了。

就在抗联第2军进行分区作战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南满地区的游击活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巩固这些成果，明确今后的任务，杨靖宇决定返回金川县河里根据地，召开中共南满党的第2次代表大会。

1936年7月，中共南满党的第2次代表大会在第1军设在河里会家沟的密营里举行，杨靖宇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肯定了过去一段时间里的工作成绩、找出缺点的基础上，通过了《南满党第2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并正式宣布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杨靖宇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第1军军长兼政委。

魏拯民是在中共南满党的第2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带着一个连来到了河里地区的。魏、杨两人相见后，彼此都感到非常高兴。魏拯民送给杨靖宇一本《共产党宣言》，杨靖宇接到书后说：“老魏，你给我马列主义，我给你杀敌武器！”然后，他回赠了一把小手枪给魏拯民。

南满党的第2次代表大会刚一开完，杨靖宇和魏拯民便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东满及抗联第1军、第2军干部联席会议。此次会议即为抗联历史上有名的“河里会议”。根据魏拯民向大家传达的共产国际第7次大会精神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有关指示，“河里会议”做出了三项重要决定：第一，将抗联第1军和第2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并成立总

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任第1路军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第1路军下辖6个师（第1军辖第1、2、3师和第2军辖第4、5、6师）；第二，将原来的中共东满、南满党组织合并组成新的中共南满省委（也称东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3人为省委委员；第三，确定了新的军事计划，决定部队要冲出东边道，向辽南、辽西发展。正式决定第1军军部和第1、第3、第4师经“辽西再向热河、外蒙边境”远征，打通与关内红军的联系。第2师留在抚松、蒙江、通化老游击区活动。第2军军部与第6师与第2师相配合，在坚持南满老游击区的同时，开辟长白根据地。第5师仍然留在东满绥宁地区与第5军相配合，开展东满地区的游击斗争，同时保持第1路军、南满省委与第5军、第3军和吉东、北满党组织的联系，以便各军协同作战，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研究抗联历史的专家们认为：“‘河里会议’是抗联历史土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使东北抗联第1、2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中共南满省委和第1路军总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为进一步将东南满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高潮，做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河里会议”之后，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从河里地区出发南进，以便向第1师和第3师传达“河里会议”精神。途中，他们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杨靖宇与其劲敌邵本良之间的较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终于见了分晓。

33 杨邵斗法

日本人讲究什么事都要有个顺序，因此对于那帮跟着他们屁股后边打抗日队伍的汉奸也按本事大小给排出了个座次。邵本良、王友成、李大善三人并称“东北三大厉害”，其中邵本良又称为“东北第一大厉害”。

邵本良这个人其实本来就不良，他是一个有20多年匪龄的老胡子头，还做过东北军的团长。“九·一八”以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伪军的团长。日本人来了以后，发现了他这个“人才”，于是他又成了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

为虎作伥者凶于虎。邵本良在打抗联这方面就比日本人厉害。日本人虽然枪法好，又有武士道精神，但他们那两下子一进山就玩不转了，经常被抗联战士们把他们当驴在山里牵来牵去，然后再打上一顿。邵本良可不吃这份亏，他是钻山林的老手。他手下的那些兵也都多是土匪出身，这些人打仗的时候不但带着枪，而且还要带上一把刀，一进林子就开始砍路标，这样，他们在山里怎么转也迷不了路。冬天下雪时，抗联的人在和日本人打完仗后，钻进林子，然后把地上的雪印一扫，日本人就不知他们的去向，但这办法对久钻山林的邵本良却不管用，你就是把雪扫得再干净，他也能找到你的踪迹。也正因如此，邵本良才敢在日本人面前夸口说：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

邵、杨之间的较量开始于1933年11月15日。当时，杨靖宇率部初到松花江以南地区活动，其后卫部队就与邵本良的部队遭遇了。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人11名的战果，但却付出了3伤4亡的代价，在死的4个人里就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金伯阳。

邵本良在这第一次较量中是实实在在地得上了一分，但杨靖宇也不是好惹的。就在那次遭遇的一个多月以后（12月20日），杨靖宇和李红光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功地用调虎离山计把邵本良的主力调出了他的老窝——柳河三源浦，然后乘虚而入逮捕了汉奸走狗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摧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了他的几十间营房，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

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源浦不但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且是梅辑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许多人都说打下三源浦比虎口拔牙还难，但杨靖宇却把它一举打了下来，这一下给一直在吹牛的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邵本良也并未因此而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

在第二次较量结束不久，第三次较量就开始了。这一次，除了邵本良的部队外，还来了2000多日本兵，他们在柳河县大小荒沟一带摆开阵式，对杨靖宇的部队形成了包围态势。

虽然敌人包围了杨靖宇的部队，但却轻易不敢往深山密林里打。谁都知道杨靖宇是“山林之王”，要想进山打他恐怕不容易。那怎么让他出来呢？

邵本良说：“我有办法！”于是，他虚发了一封给其部下的信，信中假称东部有他的重兵，然后又故意让这封信落入了杨靖宇的手上。

杨靖宇得到这封信后，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敌情和地形情况，看穿了邵本良的把戏。因为从地图上看，东部山高林密，邵本良是不可能把重兵摆到那里的。一定是敌人怕我突入东部深山里才故意发出这封信以把我引入他布有

重兵的西部地区钻他的口袋底的。看破了这一点后，杨靖宇便决定将计就计，也发出了一封给部下的假信，并故意让邵本良将信得去。信中说，他打算从西部突围出去，让部下来配合。

邵本良得信后，自以为得计。那天深夜，就在他憋足了劲在西部等着杨靖宇的时候，杨靖宇却带着部队从东部突围而去。次日上午，杨靖宇又带队向北急行 30 多里，乘虚打下了邵本良的后勤基地——金川县凉水河子，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邵本良听说杨靖宇打下了凉水河子，急忙回援，但此时杨靖宇已经撤走了，并放出风说，他准备去打柞木台子，邵本良急忙兵发柞木台子，但那想到杨靖宇却去攻打八道江镇。

经过这一个回合的较量，邵本良算是知道了杨靖宇的厉害了。他私下里说：“我邵本良就够鬼的了，杨靖宇比我还鬼；我一个邵本良的兵可以打 10 个胡子，一个红军却可以打我 10 个邵本良的兵。”

在连得两分之后，“山林之王”杨靖宇的头脑没有发热。他知道，邵本良决不会白吃了这个亏，他一定还会找上门来的。为了对付这个劲敌，杨靖宇可是费了不少脑筋。虽然杨和战士们一样恨不得一下子就除掉这个家伙，但他更知道打邵本良并非易事，弄不好可能会闹个打蛇不成反被蛇咬的结果，所以他在想出怎么打的办法之前，他先想出了几个“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自己代价太大不打、对当地老百姓损害大了不打。

那么怎样打呢？杨靖宇也想出了 4 条：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

1935 年 8 月，杨靖宇下决心要集中自己的主力部队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老 7 团——这是邵本良的家底，是要害。但就在杨调动好部队，马上就要向柳河发起进攻的时候，邵本良那只好使的狗鼻子嗅出味来了，并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敌变我变，杨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的部队前脚一撤，邵的兵马后脚就跟了过来，并在两天后在一条山岗上打一仗，虽然这次敌人没占着什么便宜，但他们却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地粘上了。当杨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的时候，杨一看地形不错就下令停下来，在那里埋伏好，等着邵。而这时的邵本良却只忙着往前追，没有想到杨敢停下来和他打，结果把他手下的一支 200 来人的队伍和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到了杨靖宇的口袋里。杨邵之间斗智斗勇的第 4 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杨靖宇又得了一分。正当邵本良为这次失败气得不得了、准备找杨报仇的时候，杨靖宇则主动来找他了。

9 月份，杨通过安插在邵身边的内线——邵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 7 团要从柳河县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其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便在他们的必经之地——金川县境内的朝阳沟设伏。结果，不但消灭了那一个连的伪军，截下了几十辆大车，而且还抓住了邵的小老婆。邵本良赔了夫人又折兵，杨靖宇再得一分。

转年 2 月，杨靖宇接到我们的内线报告说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里，就派出了一个由 25 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半夜一点多钟准确地袭击了伪军的团部，虽然由于邵当晚不在（到通化开会去了）而躲过去了，但那个伪军团的副团长以下的六七十人连同他们的武器、许多大米、白面和布匹都落到了杨靖宇的手里。

杨靖宇在连连得分后，便把部队拉回到河里地区的密营中休整练兵，等待时机准备再次出击。

3月上旬，杨靖宇又接到内线——邵部第7团第4连连长通过我在通化一所中学里做地下工作的王德裕同志转来的报告：邵本良刚从沈阳开“讨伐”会回来，邵向日本的三毛司令夸下海口，说是要在3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寇除了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和答应派飞机支援邵作战外，还调了不少伪军归他指挥。

杨靖宇接到报告后，立即连夜召开了军党委会研究歼敌方案。第二天，整个部队就开始了战前训练，内容主要就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

4月初，杨靖宇他们在龙岗山西麓二道威子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后，邵本良的部队就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就都做好了与其进行决战的准备。但杨靖宇给他们下的命令却不是“打”，而是“走”！

杨靖宇下令要走，战士们就走。可这一走就好像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就这样马不停蹄地走了两天之后，有的人就有点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呢？这仗到底什么时候打呀？杨靖宇看出了战士们的心思，他派军部的徐处长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是不做的，这次敌人的胃口很大，计划要吃掉我们第一师和军部，然后再分别围歼我磐石、桦甸地区的二师，桓仁本溪的一师。敌人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军党委决定，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两个字‘走’和‘拖’！”日本人和邵本良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了我在老秃岭子地区的第一师，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看出了他们的这一伎俩后，便一来了个将计就计，不顾连日的倾盆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敌人一见杨靖宇“上了圈套”，便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还派出了飞机。可没想到杨靖宇带着部队到了老秃岭子转了一圈以后，就又走了，与此同时，被敌人包围的第一师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当杨靖宇率军部和一师的部队在宽甸县的佛爷沟门汇合后，让部队在那里休整了几天，然后传下令来：走！

离开佛爷沟门后，部队便开始兜起圈子来了。今晚向南走50里，明晚又向北走60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地方走了一夜。这样一连几天下来，把许多战士都走糊涂了。他们开始在下面悄悄地起来了：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去了？此时敌人高兴了，他们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进入4月中旬以后，杨靖宇又带着部队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邵本良则在后面穷追不舍。有时部队刚刚到一个地方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了上来，杨靖宇就又开始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不断地扔下一些衣服和其他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家的东西吧！”呈现出一片败军之象。

4月末，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了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这天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话，他对大家说：咱们一连走了20多天，现在不走了。原来我们一直走，那是因为打的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这里是高山险路居民不多加之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打的时候到了。现在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战士们早就等着杨靖宇下打的命令呢，现在一听，顿时来了情绪，连夜构筑好了工事，然后就在里面静等着邵本良了。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一个先头营一进“口袋”，负责扎口的1师3团就立即把他们的后路给切断了。邵本良一见后路断了，便只好让伪军往沟里冲，可他们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6团给打了回来。这时，杨靖宇

下令，让教导 1 团和 1 师的少年营将敌人拦腰斩断，不久又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但是，就在这时，坚守北面制高点的我少年营营长一见下面打得这么热闹，便再也忍不住了，他不等上面的命令，就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了，山头上只留下了一个班的人。邵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他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于是便带着人拚死夺下了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则也表现出了十足的“鬼”劲——他一看不行了便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后，又带着一个团的兵力和三个月的军饷等准备于 8 月初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后，便在四道江——邵本良的必经之地布了埋伏，“迎接”他的老对手。虽然这次邵本良又一次侥幸逃脱了——战斗打响后，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老乡的家里抢了一件衣服，落荒而逃（但他的日本顾问却未能再用老办法脱身，被打扫战场的战士发现后乱枪打死），但他却再也没有机会与杨靖宇比试了。

34 天不作美

在“河里会议”制定的军事计划中，第1军军部，第1、3、4师将要远征辽西。其实，早在这个计划出台之前，第1军第1师的部队便已经有过一次西征了；而在“河里会议”正式决定改编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之前，他们也就已经在1936年春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非正式”地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了。第1军下辖程斌的第1师和曹国安的第2师，军长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

5月，第1军在原教导第2团和第5团两个连的基础上，吸收部分地方游击队员，组成第3师。师长王仁斋。

6月份，第1军做出了西征的决定。

23日这一天，第1军的团以上干部在本溪与风城之间的和尚帽子山里开会。宋铁岩向大家做西征动员报告。他的报告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是西征的目的和任务是配合关内红军东征抗日，打通与党中央及关内红军的联系；第二是本次西征行动的具体部署——以第1师主力部队第3团和少年营从本溪、风城中间地带突破，插入辽阳后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奔辽西和热河地区。为掩护其迅速向西挺进，第4、第6两个团将负责在其翼侧配合其行动。

6月28日，第1师主力部队共400多人，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1师师长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从和尚帽子一带出发，正式开始了西征。

由于可以想到的种种原因，从我方的档案材料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有关这次西征的具体情节的记载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下面这些从敌伪档案中发现的李敏焕记述当年西征情况的日记，却可以为我们做出一点弥补。此日记是李敏焕牺牲后，日本人从其遗物中发现并译成日文的，在敌伪档案中的标题为《程斌匪阵中日记》。这里引用的是孙继英根据日文档案翻译过来的日记摘抄：

六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初十）

晴星期日

早饭后，在上石棚附近休息。下午六点钟，部队全体集合，讲话之后开始行军。经由沙窝沟、大东沟，到达草河口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街里响起了侵入的敌人的枪声。开始交战约三十分钟，我二、三分队向街外退却。接着，我队全部退出。

六月二十九日（农历五月十一）晴星期一

拂晓后到达沙窝沟，继续行军。绕过山岭，在后石头砬子休息，下午四点钟集合，移向响水沟子附近宿营。六月三十日（农历五月十二）晴星期二

早饭后于上午七时集合出发，到达矿洞沟，与宋铁岩以及占东洋、黑字等抗日部队联络。下午五点钟在双岔沟附近出现敌情，我们登上山顶打了一阵枪。下午六点钟，敌人向沟外退却。我队集合，在行虎沟、韩家堡子附近宿营。

七月一日（农历五月十三）晴星期三

早饭后集合出沟。大队向石家堡子附近移动。二分队的一名宣传员（一名队员）前往石家堡子，有枪声，宣传员战死。敌人一部分爬上南方山地，一部分在大房子里。我队继续行军，经过前后二三道沟的最高点，在前三道沟的裴家堡子吃午饭。又经二道沟黄柏峪，

在山歪（崴）子与南坎的冯游击队相遇。我军登上山岭，越过安奉铁路，到达朝天贝（笔者注：此时，宋铁岩肺病加重不得不返回本溪和尚帽子山密营，部队继续西征。此后，敌人开始发现第1军的西征企图，遂派大批兵力对其跟踪追击、层层包围）。

七月二日（农历五月十四）晴后雨星期四

早六点钟左右，刚刚做好饭，就受到敌人袭击。我队立即退向昆岭的最高点，在九才峪长背沟吃午饭。午后一点左右，据哨兵报告，陈家堡子有敌情。我队立即集合，开往库仓沟、大庙沟、陈家堡子宿营。在今天早晨到达曹（朝）天贝的时候，有一个农民不开门，我队将其家包围。天亮后，从屋里出来一个老头，拿着扎枪，把我二、三分队的两名队员刺伤。枪响后，三分队队员被敌人俘去（日本人注，是被今田部队所属的藤田队逮捕的）。

七月六日（农历五月十八）晴星期一

吃过早饭，于清晨两点钟集合，来到庙沟里。上午十点钟左右集合行军。在高家堡子附近遇到了装载着货物的马车，没收了若干货物，在山顶附近休息。下午五点钟，发现三百余名敌人，与之交战。日落后，我队在大阳沟休息。

七月八日（农历五月廿）晴星期三

早晨两点钟，我队出狐狸沟北岔，到达倒岔沟姜家堡子。晚上八点钟，敌人来到姜家堡子岔道口。我队决定分成三部分活动，化整为零后，中队部行军到龙眼沟吃晚饭（笔者注：在第1师部队西征受阻后，他们立即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争取主动、打击敌人。这里说的三部分分别是程斌和李敏焕带的师部和保卫连、第3团政治部主任李铁秀带领的第3团和由营长王德才带领的少年营。其中程、李带队回师摩天岭，下面的日记讲的便是这一过程）。

七月九日（农历五月廿一）星期四

早晨三点钟集合行军，到大闹沟岗的前伟站沟里休息。下午一点钟左右，敌人跟踪追击而来。我们迅速登上山顶，退到矿洞沟。后来敌人进入二团的潜伏地区。开枪后，我们经过矿洞沟、碰子沟、西山堡，到达陈家沟休息（一分队一排有排长以下三人失踪了）。

夜里十点钟左右，越过制高点向不知名的山退却、休息（今天敌人出动了侦察机）。

七月十二日（农历五月廿四）晴星期日

十二点钟左右（日本人注：疑为中午），在东方山脊方面二十余步远的地方又发现日寇，并且在我们十多步远的地方走过去了。

午后五点三十分左右，天下起雨来。午后七点钟开始行军。当越过南马峪、柳家堡子后面的山岭时，和二十多名棒子队遭遇。下了山岭移动到大头沟、小儿沟，进入了警察队潜伏的地区。又在距离南马峪三华里的孙家堡子，同二十余名警察队谈话（孙注：原文如此）。我们越过山岭，经过四道沟、果家沟，在生铁沟、小黄岭休息。

午前十点，由于又在生铁岭出现敌兵，我队开始行军。午后六点钟到达赵家堡子。要吃晚饭时，七点钟又在王家堡子发现了数十名日本兵。

因而，我军登上后边的山脊上休息。

七月十四日（农历五月廿六）

阴、大雨星期二

早饭后，于清晨两点集合，经过阳沟、二道沟，到达大长岭。因下大雨，在附近居民

家里休息。

上午七点钟集合，经八盘岭，到大碾子沟吃午饭。上午十一点钟集合，经新开岭，到大榆树沟、二道沟休息。

七月十五日（农历五月廿七）

晴星期三

早饭后，于下午二时三十分行军至摩天岭休息（笔者注：此时，第1师设下了埋伏圈）。

李敏焕的日记最后就写到了这里。笔者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测，大约就在他刚刚放下手中的笔的时候，一直尾追他们而行的驻连山关日本守备队第二中队的敌人就赶到了。等敌人一进埋伏圈，程、李指挥部队对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激战，消灭日军今田中队长以下30多人。但是，第1师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上述日记的主人——师参谋长李敏焕就是在这时牺牲的。摩天岭战斗后，西征无法进行，第1师化整为零返回本溪游击区。

虽然这次西征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它是第1军向辽西进军的首次尝试，特别是摩天岭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抗联的影响。杨靖宇对这次西征壮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曾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西征胜利歌》：

红旗招展，刀枪闪闪，我军向西征。
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寇心胆惊。
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
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

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
西征大军，夹攻日寇，赶快来会面。
日本国内，党派横争，革命风潮涌。
对美对俄，四面楚歌，日寇死不远。

紧握刀枪，向前猛进，同志齐踊跃。
歼灭日寇，今日全队，我队战斗好。
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
盔甲枪弹，胜利无算，齐奏凯歌还。

同志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
拚着热血，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铁骑纵横，满洲军队，已有十万大军。
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

第一次西征未能取得成功，但杨靖宇他们却并未因此放弃进行西征的打算。1936年11月，第1军军部在桓仁县外三堡召开了第3师领导干部会议，专门讨论的部署两次西征的问题。杨靖宇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他亲自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他要求第3师要在2个月的时间内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并吸取第一次西征的经验教训，把第3师参加西征的部队全部改成骑兵，计划

在冬季趁辽河结冰封冻之机，快速冲过吉奉、南满铁路，跨过辽河，挺进热河，与关内的红军取得联系。

11月下旬，第3师在完成了西征准备工作后，便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和参谋长杨俊恒的带领下，从兴京出发，向辽西挺进。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这次西征一开始进展十分顺利，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便已经“饮马辽河边”了。但是，当这些西征的勇士们来到了辽河东岸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勒住了马缰绳，望着眼前的这条大河徒唤奈何了。

原来，1936年的冬天气候反常，在这个往年“已是悬崖百丈冰”的季节里，辽河上下却没有“顿失滔滔”，更看不到“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看到的却是从天而降的冬雨！再四下里一望，辽河上连个渡船的影子也找不到。

过不了河，后面的追兵又上来了，队伍中也不断有人病倒。这样，他们只好绕道返回清原、兴京抗日游击区。

两次西征，虽都未能达到目的，但由于西征部队插入了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区，又取得了不少胜利，扩大了中共及其领导的东北抗联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据说，当年在西征部队打过来的时候，那里群众都奔走相告：“东山里的红军打过来了！”

第十一章

35 联手破敌

当珠河抗日根据地遭到日军破坏、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的时候，第4军军长李延禄和军参谋长胡仑正在第4军的根据地青龙沟。根据情报，他们知道日军下一步就要到来“围剿”第4军了。李、胡经研究后决定：为了打破敌人的冬季“讨伐”，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由李延禄带领西去方正、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一路由胡仑带领向北去开展游击活动，以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当李延禄带领部队到方正后，经过一段卓有成效的工作，开辟出了大罗勒密游击根据地。其后不久，第3军的政治部主任张寿钱、第1师第1团团长刘海涛、政委金策来到了方正三家子屯。

李延禄听到第3军的人来了以后，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4军军部的各部门干部来到三家子屯。两军的人一见面很自然地就谈起了关于各自与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联系的问题，当4军的同志们谈起他们与地方党组织之间还有着紧密的联系时，三军的同志们对此感到很惊异，因为他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地方上的党组织无法取得联系了，更不知道中共满洲省委在1934年遭到破坏后的情况，也没有听说吉东特委成立的消息。而当李延禄向他们出示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告诉他们中央特派员吴平到东北来了，并在第4军呆了一个多月，新任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到来之前，省委工作由杨光华代理等情况时，他们就是瞠目相顾了。

当时，张寿钱正在患肺病，但是听到李延禄讲起有关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中央特派员吴平是如何帮助第4军建军、第4军是如何建立起“内红外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等情况时，即显得特别有精神。尤其是当谈起“八一宣言”时，他的劲头就更足了。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多年后李延禄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四个人一夜都没有睡，谈到第3遍鸡叫，还以为是刚过半夜，见到窗外大亮，才吹熄了蜡烛。仿佛这是北方的夏季夜晚似的，短的出奇。我们四个人的情绪，是一直在兴奋的状态中，我们既谈到决定吸收谢文东部，扩编为抗日联军第6军，也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华堂部为第7军，并且还决定了联军拔除南刁翎敌伪据点，准备夺取敌伪物资，解决联军的给养及冬季的装备。”就在第二天，李延禄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关于拔除南刁翎敌伪182

据点的联合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9月10日左右，李延禄一边派人去联络第4军的第1、第3两个师，一边派人去联络依兰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他们都来到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是方正通往松花江以西的交通要道，村背后是山，还有一个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当时，那里有一个伪警备排。当3军的同志们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会，便不解地问：“为什么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呢？”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呀！”

3军的人一听更不明白了，都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然后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当初，第4军刚到方正的时候，曾经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北刁

翎有个何五爷和第4军的敌工委主任派出的工作人员接过头。李延禄率军部各部门人马到北刁翎后，敌工委的李主任已经通过何五爷的关系与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取得了联系。这个营长因为早就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的第4军之间曾经签订过秘密协定，所以对李延禄也不敢怠慢，但他还是留了一手，没有亲自去赴李延禄之约，而是派手下一个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正在李延禄会见那个伪营长的代表时，有人进来报告说，驻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的排长带着几个人在去依兰的路上被我们的人给抓住了，缴掉了他们十几条枪，都被押到村子里来了。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里召集第4军军部的一些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几个俘虏的问题。当时，以军部组织部长朴风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对于所俘虏的那些人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则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这一下，好多人转不过弯来了：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对大家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遵守，再说目前我们正在和伪警备营谈判建立秘密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先做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再说那个伪排长，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给放回去的话，那他肯定会被撤职，倒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还可以给我们保留一个秘密关系。我的意见是，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让伪排长亲笔给我们写一个保证书，给我们留下一个把柄，我们就可以还给他们枪，把他放回去。实际上，我们不该把目光盯在那几支步枪上，而应该从政治意义上去理解这个问题。经过一番争执之后，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李延禄叫人把那个伪排长带了进来，和他把自己的意思一讲，那个伪排长立即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而且向李延禄保证说，以后只要第4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就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他们住宿；而且他还可以带着伪军给第4军的部队巡逻、警戒。李延禄一见他接受了自己的条件，便对他说：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既然你愿意和我们签订秘密协定，那就请你把我们拟好的这份协定抄一遍，并在这上面签字画押吧！

等那个伪排长签完了字，李延禄把他带到了那个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给日本帝国主义当走狗，为了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个伪军排长的枪还给了他。

一见这情景，那个伪营长的代表立即一改原来的不信任态度，高兴他说：“贵军这种光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以后，北刁翎的伪军果然与第4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那个伪排长回去以后，也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4军最安全可靠的宿营地了。每当他们一开进去，那个伪排长就带着手下的人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一个通讯员在家看电话……

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后，都说第4军对伪军的工作出色，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们3军在哈东能建立上这种关系，那行军的时候还用住露天地吗？不也可以像4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当前来参加3、4军联席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李延禄向大家通报了南刁翎的敌情：那里的伪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伪地方保安总队，总队长是于廷舟；另一部分是伪警备旅的段营。段营的武器比较好，但由于北刁翎伪

军的影响，斗志并不坚定。而伪保安队在于廷舟的控制下却极顽固，但于本人没有什么军事头脑，主要是依靠段营。

根据敌人的布防情况，联军指挥部决定：3军1团攻西门、4军2团攻东门、李华堂部攻南门，谢文东部做为预备队驻扎在南山顶上……

就在李延禄等人研究完攻城布署，带领部队准备行动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孟泾清来了，此时他已经调任中共刁翎区委书记。孟泾清告诉李延禄说，我们地方党委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马上就要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讨伐”。

李延禄说：这个我们也听说了，我们这次打南刁翎就是为了夺取一批物资用来过冬，以应付敌人即将到来的冬季“讨伐”的。孟泾清说：驻在南刁翎的伪警备营的段营长最近经常流露出对日伪的不满情绪，在战斗打响之后是可能被争取过来的。另外，在林口驻有一个团队的日本骑兵（当时林口正在修建牡、佳铁路），如果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敌人就可能出动。李延禄、张寿箴等人一听，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并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后，趁林口的敌人出援之际，再袭林口，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是在9月16日发起的。战斗打响后，东西两路3军和4军的部队很快就得手了，战士们举着红旗登上了围墙。但就在这个时候，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炮起火，并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越来越激烈。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一见这场面，便认为联军此次攻击失败，形势不利，便带着自己的部队撤走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胜利果实，却不愿意承担一点风险。

但是，战斗形势并没有像谢文东想得那样坏，联军经过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伪军70多人，胜利地占领了南刁翎。缴获伪警备营100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100多人反正，最后，就连伪警备营的段营长也只好带着部队投降了。

李延禄亲自接见了段营长，问他：你是愿意和我们一起抗日呢，还是另有其他打算？

段营长说：我愿意抗日，但我不愿意跟你们一起走。李延禄说：这是为什么呢？

段营长说：说老实话，我是怕你们的目标太大，我这个人又吃不来苦。你还是让我跟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一起抗日去吧！李延禄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强迫你。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那就是如果不抗日，那目标是最小的了，可那样是没有出路的。

段营长说：我还是去找谢文东吧！

攻下南刁翎的当天晚上，李延禄、张寿箴等人便对那100多名反正过来的伪保安队员进行了改编。与此同时，他们接到报告说：林口的敌人出援了。由于近日秋雨连绵，致使柴河的水暴涨，马匹无法过河，所以敌人只好把马都留在了林口，变骑兵为步兵了。

李延禄与张寿箴等人一商量，认为此时正是打林口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在刁翎留下一个营的兵力，让第4军3师5团的李天柱部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到敌人刚一到达就派兵袭扰他们的后方，迷惑敌人使其搞不清楚我军主力在什么地方。考虑到是夜间行军，3军刚来，路还不熟，李延禄又特意派第4军的两个连和第3军的部队一起行动。当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3、4军的部队便以每天120里的急行军速度赶赴林口。

当李延禄、张寿答带领部队于9月29日凌晨3点钟攻进林口时，发现那里已经是一座空营。留守的敌人已经全部跑掉了，只有那300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此次奔袭林口的战利品。

当李延禄等人带着缴来的马匹过柴河的时候，也遇到了马不肯过河的问题。大家连打带哄才总算弄过去100多匹马，其余的只好丢掉了。

从林口回到方正根据地后，李延禄并没有因为连打了两次胜仗而高兴，反到显得有些沉重起来。这主要有下面两个原因：一是这两次仗虽然打胜了，但缴获的物资并不多，还无法满足部队过冬的需要；二是从第1师传来了师长杨大和在赴五道河子参加第4军高级干部会议的途中，与敌遭遇不幸中弹牺牲的消息。尤其是后者，使李延禄当时“觉得失去了右臂一样”。

按照军部的通知，前来参加第4军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同志陆续在1935年10月上旬以前到达了五道河子。只有第1师3团的苏衍仁部迟迟不到，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这次五道河子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精神，决定将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在这次会上，第4军参谋长胡伦要求大家一定要和3军的部队做好团结工作，以便共同打破日寇即将开始的冬季大“讨伐”。会后不久，赵尚志带第3军部队从青龙沟一带开过来了。回到军部后，李、赵二人很快得到以下情报：

第一，日本人在从哈尔滨到富锦的松花江以南、铁路以北的地区摆下了一字长蛇阵，集结了几个师团的兵力向北围剿；另外，他们还封锁了松花江南北交通线，截断了联军的退路，企图将李、赵等部压迫到江边上，在背水一战中将其消灭。

第二，从大罗勒密伪警备连送出来的消息说，方正县城及勃利一带已经住满了关东军，现正在附近山区在警备连的带领下进行搜索前进。

形势十分危急。

第3、4军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赵、李等人共同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拿出第4军的李天柱部，进军桦川、集贤，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牵制敌人的行动。派第3军第4师的郝桂林部和第4军第1师第2团留在方正、依兰一带山区，由金策带领，对敌开展游击战，原来第4军配给第3军第1师做向导的两个连仍然由金策带着活动；李延禄带第4军第1师第1团、政治保安连，赵尚志带第3军第1团准备从林口突围，绕到敌人的前后去，暗地跟踪敌人，寻找敌人的弱点，进行小规模歼灭战。

按照这个计划，赵尚志和李延禄带着部队奔林口而去，但还没有到达柴河的时候就因与敌遭遇而不得不掉头奔孟家屯，可就在去孟家屯的路上，李延禄发现前方树林上空有乌鸦和小鸟乱飞，他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通知走在前面的赵尚志停止前进。然后，他自己也迅速前进，来到赵尚志身边。

赵尚志问：咱们不是奔孟家屯吗？怎么停下来了呢？李延禄说：孟家屯一定被敌人占领了，你看看前面山头上的情况就知道了。

赵尚志本来就有一只眼不好使，再加上此时天色已晚，因此费了好大劲才借助于望远镜看到在前面的山头上有敌骑兵部队活动。于是他们只好再回到了五道河子，然后又从那里转到小罗勒密后山，想到那里渡过松花江，到通河县境内去活动。但当他们赶到松花江边的时候才发现，虽然已经是 11

月份了，但松花江的中心还没有冻上！此时又找不到渡船，于是他们只好躲到江边的柳树林子里等待机会再冲过江去。

十天后，派出去的侦察员终于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在十里以外的猪蹄河口方向有一个冷风口，那里的江面比其他地方冻得都早。得到这个消息后，赵尚志和李延禄马上带着部队来到了猪蹄河口。趁着天还没亮，江心封冻的机会，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便过了松花江，进入了通河县。

在通河县，他们首先袭击了二道河子的伪地方警备队，解决了部队的过冬服装问题。然后便一头扎进深山密林。在成功地甩掉了跟踪的敌人之后，来到了汤原，找夏云杰的游击队去了。敌人煞费苦心的冬季大“讨伐”，就这样被我 3、4 军联手打破了。

36 饶河新锐

1935年5月，当饶河反日游击队被编为第4军第4团的时候，他们还只是一支只有250人的队伍，而他们与其他各抗日武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不免有些势单力孤。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能够影响他们主动出击，积极地打击敌人。

6月初，团长李学福和政治部主任李斗文带着部队向虎林一带活动时，设法与驻在三人班、马鞍山的一个伪军连内有爱国思想的人取得了联系，并制定了一个哗变计划。后来虽然由于计划暴露了而未能成功，但他们却将这一个连的伪军缴了械，并成功地动员了一大半伪军参加了抗日队伍。

9月18日，李学福、李斗文带领150多名战士，突然袭击了驻小来河和小西山的伪军，缴枪30多支。

9月25日，在新兴屯与100多名日军和300多名伪军发生激战，击毙日军“高木司令”以下30多人。在这次战斗以后，周围一些抗日武装都纷纷前来投奔，要求接受改编。于是就有了第5团、第6团和第7团，至此，饶河一带的日伪势力只有在饶河县城的那几条街上才能显示出来，而在其他地方则是游击队的天下了。

1936年冬天，日伪当局对饶河一带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冬季大“讨伐”，但由于抗日的队伍采用灵活的战术与敌周旋，结果两个月下来，前来饶河沟里“讨伐”的敌人根本就没见到他们的影子。最后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回去后别人问：打到“红胡子”了吗？这些人回答说：一个人影都看不见，打谁呀？！

经过一个冬天的反“讨伐”，第4团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壮大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吉东特委在1936年3月12日写信给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和第4军第4团，告诉他们，第4团干得不错，还应该这样干下去，下一步要继续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要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抗联第7军。

中共吉东特委的指示给第4团的同志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考虑到创建第7军的条件还不太成熟，他们先在现有的几个团的基础上把队伍扩编为第4军的第2师。第2师成立的时候有兵力500人，师长郑鲁岩，副师长李学福，第4团的参谋长升任师参谋长。

人多了，枪多了，名气也大了。但是，第2师的领导们的头脑没有发热。他们十分清楚，他们的力量是宝贵的而且也是有限的，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还不能去打那种“硬碰硬”的仗。所以当敌人在1936年春天集中起3000多名日伪军向他们发起进攻的时候，第2师采取的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办法——由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地区与敌人周旋，而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宝清一带去活动，在那里不断地袭扰敌人。

带领部队前往同江、富锦一带活动的参谋长崔石泉可是个有勇有谋的人物。这位朝鲜族同志是饶河游击队的创始人，早在1932年就带着金文享等6个人，仅凭一把手枪，成立了令汉奸走狗心惊胆颤的“特务队”。后来又和李学福等一起组织起了“特务营”、饶河反日游击队。

在与敌人长期的斗争中，崔石泉深刻理解和掌握了中国古代兵书上讲的“攻心为上”的至理名言。他在战斗中特别注意搞好瓦解敌军的“攻心”工

作。此次带队前来同江、富锦开辟新游击区，他一到同江做的前两件事就是与此有关的。第一，他先派出人去调查当地的大排队情况，广泛联系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向大排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第二，他在部队内部开展组织性纪律性教育，要求大家以革命军队的模范行动影响大排队，使其中有爱国心的士兵逐渐向自己靠拢。

崔石泉的这些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成效。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 8 名士兵主动找到了崔石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当即派了 12 名战士前去帮助他们打死了日本教官和那个反动的伪警察队长，使那里的 20 多名警察带着武器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来了。

6 月 15 日那天，崔石泉带着 150 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 200 多名日军和 16 多名伪军、大排队遭遇了。这显然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与敌人“动手”，那肯定是要吃大亏的，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在“动手”的同时还要“动嘴”。于是，他传下令去，让战士们一边打一边高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可别小看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它们的作用可不小。那些伪军和大排队员听到这两句话后，慢慢就开始动摇了，他们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则干脆偷偷地跑过来，给抗联战士送来急需的子弹，还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及日本指挥官的位置都告诉了崔石泉。这样，这场仗从上午 9 点一直打到下午 6 点，抗联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 16 比 50（阵亡人数）的比分赢得了这次战斗。就在崔石泉这面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是干得有声有色。他把活动在那一带的“天军”、“北海”、“花牙子”等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 7、第 8、第 9 团。为了加强对这些队伍的领导，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了一部分骨干，经过培训后，分到那几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也与日伪军进行了 10 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随着第 4 军第 2 师的积极活动，使虎饶地区的党组织及群众抗日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活动在那里的山林队和红枪会等也都积极要求和他们联合，一起进行抗日活动。

到 1936 年秋天的时候，建立第 7 军的条件已经成熟了。10 月 26 日，第 4 军第 2 师在爆马顶子召开了各抗日队伍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 7 军。11 月 15 日，第 7 军正式成立。据第 7 军领导人回忆说：第 7 军在刚成立的时候，“基本部队总数 400 多名，早已收编的抗日队伍为 300 多名，采用三三制把基本部队改编一、二、三三个师。军长陈荣久兼代第 1 师师长，参谋长崔石泉，第 2 师师长李学福，第 3 师师长景乐亭……”此时出任第 7 军军长的陈荣久，在“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第 21 旅的一名士兵。“九·一八”以后，他和连里的一些爱国士兵一起，缴了准备带队投降的连长的械，并一起加入了王德林的救国军。在救国军对他们进行整编的时候，他被推举为连长。当救国军的领导人纷纷跑到苏联去的时候，陈荣久号召士兵们说：“我们决不投降！我们决不过界！就是最后只有我们一个人也要在国内抗日到底！”后来，当他看到李延禄的抗日游击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后，便带着自己的人来到了宁安，参加了抗日游击军。在抗日游击军里，陈荣久主动接受党的教育，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陈荣久表现更为出色，1934 年，他被组织上派到苏联学习。1936 年秋，他从苏联学习完回国。组织上便

把创建和领导抗联第7军的重任交给了他。

陈荣久上任后不久，便表现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他果断地处决了几名混入队内的敌特、奸细分子，粉碎了敌人企图通过挑拨第7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汉、朝民族团结来瓦解第7军的阴谋，巩固了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队伍。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在1937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我们这位英勇的指挥员在掩护大队突围时，中弹牺牲了。

陈荣久牺牲后，崔石泉挑起了代理军长的重担。第7军在他的带领下在饶河、虎林、同江、富锦一带，广泛地开展游击活动，主动打击敌人，争取伪军哗变，与群众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而使第7军部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37 以血还血

由周保中将军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是在1936年2月魏拯民从苏联返回吉东后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后,和第2军几乎同时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

抗联第5军成立之时,也正是日本鬼子对吉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大举“讨伐”之日。当时,日本人在政治上提出了“专打抗日军,不打山林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在经济上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封锁,不准群众有富余的粮食、不许商店多卖一尺布、一斤盐……。为了应付这日益恶化的形势,中共吉东特委在1935年底给第4军和第5军党委写信,对两军在1936年的军事行动计划提出了详细的意见。第5军党委根据吉东特委的指示,在1936年2月决定将主力撤出绥宁地区,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具体部署是:李荆璞的第1师以额穆县为中心,向五常、苇河、舒兰、敦化等县活动,打通与第1军的联系;傅显明的第2师以穆棱为中心,向东宁、密山、勃利一带伸张活动,与第3军、第4军取得联系;并打算与第2军一起组成联合指挥部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准备在夏季青纱帐起来以后,尽可能多地开辟新的游击区,熟悉地理环境,建立地方关系,以便在敌冬季大“讨伐”到来的时候与之进行有力的斗争。

按照这一新的军事行动计划,我先遣队第2师师长傅显明率第4、第5团经穆棱向密山前进。在到达密山后不久,即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5军第1师在师长李荆璞的带领下,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2月28日,他们与敌在莲花泡发生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使用了毒气,我军伤亡惨重,牺牲78人,伤45人,损失步枪60支、机枪3挺。战后,敌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日本人残忍,将我军阵亡战士的遗体弄得七零八落,到我抗日救国会的人前去收尸时,只找到了42具尸体,其它36人的尸体全被日军毁坏得找不到了!

莲花泡战斗后,周保中见原定让第1师绕道宁安西进五常的计划难以实现后,便决定让该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第3团和第6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

第1师和第2师在向中东路北转移的过程中,在穆棱、勃利、密山、宁安、林口等地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也得到了补充,战斗力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当第1、第2师传回捷报的时候,由军长周保中和副军长柴世荣指挥的第5军留守部队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光是3月4日和第2军第2师陈翰章部联合行动那一次,就缴得机枪2挺、步枪53支、手枪3支、子弹1.1万发、服装173套。

我军捷报频传,日伪心惊胆颤。

进入夏季以后,日军接二连三地出兵宁安,企图歼灭我军。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决定在8月份带领第5军军部和直属队也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为了统筹军事行动,他们在行军途中,于宁安泉眼头召开了一次第2军和第5军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周保中率第5军军部及教导队第1、第2队北进,去与该军第1师、第2师汇合;第5军第3、第6团和第2军第3师等部队留在绥宁老区坚持游击战争。在宁安地区建立第5军军部留守处,领导道南留守部队;将中共宁安县委与东满地区各地的县委合并,成立以张中华为书记的中共道南特委,统一领导那一带的抗日游击斗争。

泉眼头会议后，周保中即率部前往穆棱、勃利、依兰、方正一带活动。于此同时，第1师政治部主任关书范正在率第1师第1、第2团挺进松花江北，与第3军配合行动；第2师师长王光宇率第2师一部活动在依兰、桦川和富锦一带。在1936年下半年里各部均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到1937年初的时候，第5军军部和第1、第2师主力先后都到达了依兰东部地区，并在那里建立起了后方基地、医院、服装厂、印刷所等后方机关。在这一时期，第5军的部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进一步健全了编制和各级党组织。队内还成立了识字班和娱乐会，活跃官兵的文化生活。为了解决军需供应，他们除了像以往那样靠缴取敌人的和群众自愿捐助的物资以外，还采取了征收木材税、土地税（每垧地征收5角至1元）、车马税（按每头牛1元，每匹马2元，每辆车20元征收）、大烟税及反日特捐等，补充部队的活动经费及军需供应。这样一来，全军指战员也开始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津贴了。

部队条件得到了改善，打起仗来也更来劲了。从1937年1月起，第5军各部在军部的直接领导下，以依兰刁翎为基地，不断主动出击。著名的大盘道战斗和袭击依兰城的战斗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1937年1月，第5军接到抗日救国会的报告，说驻后刁翎的日军300多人准备向林口调动，勒令当地老百姓为其准备200张爬犁。

第5军领导接到这个情报后，对敌情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如果只是300多个敌人向林口调动，那只需要70—80张爬犁就足够用了，为什么日军让老百姓给他们准备200张呢？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兵力外，还一定有大量的军用物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的行动一定会比较笨重。于是，副军长柴世荣果断决定调动第5军第2师第5团全部和军部警卫营、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在大盘道伏击敌人。

1月27日晚，部队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当时天上正下大雪，地上白茫茫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眼睛盯着前方。但直到中午了，还是不见敌人的踪影。这时，有的战士就有点耐不住性子了。他们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说：“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我们一发现敌人，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12点30分，敌人来了。走在前头的是50名尖兵，他们坐在八、九张爬犁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进了包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敌人也都进了埋伏圈。

下午1点钟，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早已等得着急了的战士们立即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日军……

到下午4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共360名全部被歼，缴获各种军用物资更是不计其数。对战斗中缴获的500多匹马，区分情况做了不同处理，属反动地主的一律没收，其余农民的则归还原主。

大盘道战斗胜利后，柴世荣指挥部队又于2月1日取得了夜袭前刁翎的胜利。而这些胜利要与2月末3月初由周保中、李华堂任总指挥的，由抗联第3、第4、第5、第8、第9军共同进行的围攻依兰的战斗比起来，那还是要逊色多了。那一仗不但歼灭了300多名日军，缴获了大批物资，而且打乱了敌人进行春季大“讨伐”的部署，打破了敌人对我军通往图佳铁道以东的

桦川、富锦的交通封锁，扩大了抗联的政治影响，也提高了那一带群众的抗日斗争积极性，促进了伪军的动摇和哗变。

自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境内出现了被抗联战士称为“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

第十二章

38 打老钱柜

1936年1月，汤原县几乎变成了一座抗日队伍云集的大兵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汤原游击总队、联合东北反日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的领导人李延禄、张寿钱、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冯治纲等人齐聚汤原县吉兴沟，在那里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经过协商，通过了关于组织东北反日联合政府和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议。联军总司令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张寿钱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第1军、第2军、第5军以及饶河游击队都未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上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政府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实际上都只是北满地区的。1937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还为此专写信给周保中和第5军党委，说明“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不能包括一、二、五、七军”。尽管如此，这个总司令部对于统一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功不可没的。1936年1月30日，汤原抗日游击总队就是在这个总司令部成立后，由第3军司令部帮助改编为第6军的。

第6军成立后没几天，便开始和第3军的同志们一起着手建立汤旺河沟里的后方军事根据地。此项工作主要由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钱以第3军、第6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和政治军事学校（此学校也正在筹建中）教育长的名义，来具体负责落实。3月29日，张寿钱接到联军总司令部的指示，要求他迅速组织部队，消灭盘踞在老钱柜一带的敌人。

老钱柜，顾名思义，就是伐木场把头给工人开支放粮的地方。其地理位置就在现在的伊春市林业局北面的小兴安岭腹地里汤旺河畔。日本人占领汤原以后，为了推行其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用重金收买了以于四炮为首的一伙胡子，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日本人还给于四炮配了7个日本指导官，他们的老窝就设在老钱柜。

于四炮一伙进驻老钱柜以后，便一面抓劳工、征牲口为日本人伐木，一面仗着山道熟、枪法准经常偷袭我抗日队伍，给我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时也严重地威胁着我根据地的安全。因此，联军总司令赵尚志下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

打下老钱柜、消灭于四炮，其意义之大不用说也明白，但可不是容易办到的。当时6军的主力部队都被军长夏云杰带去打鹤岗了，军部只剩下20多个警卫战士，武器差，人员战斗经验也不足，有的人是刚刚拿起枪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和于四炮手下的那100多个装备精良的伪森林警察比起来，相差也太悬殊了，况且他们还得远程奔袭800多里，这仗可怎么打呢？张与戴研究后认为，这仗就一定要打，但光凭目前6军这点人肯定是不行的。还得把汤原县洼区区委书记李凤林领导的游击连也拉上。这样，便由张、戴、李等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游击连一共有80多人，加上6军军部的20多人，在人数上与敌人差不多了。但是敌人拥有以逸待劳和装备上的优势，那么他们有没有可以为我所用的弱点呢？

张寿钱认为，有！而且不止二处。第一，此时于四炮正在汤原县城里给他的傻儿子办喜事，老钱柜之敌群龙无首；

第二，于四炮的战线拉得太长，各部分敌人互相照应不上；第三，这支汉奸队伍刚刚建立不久，还没吃过什么大亏，官兵都很傲慢，警惕性不高。

善于从强敌身上找出弱点并对其加以利用，从而达到克敌致胜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指挥员最可贵的素质。张寿钱无疑是具这种素质的。

张、戴、李经过一番细心的筹划后，便在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带着队伍由东向西出发了。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出发，是因为刚好可以在天黑以后到达查巴溪，那里是于四炮为了保卫老钱柜的安全设下的第一道哨卡。

当走在全队前面的李风林带领战士们突然出现在查巴溪伪山林警察大队的木克楞房子里的时候，正在里面喝酒的两个家伙顿时吓呆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们只有老实地接受“采访”了：

“汤旺河北岸有多少人？”

“有……40多人。”

“头头是谁？”

“中队长黄毛、丁山、……”

“有几个岗哨？”

“就一个。”

搞清楚情况就好办了。李风林和战士们一起押着这两个警察直奔河东北的那个大院套扑去。因为当时风大夜黑，那个站岗的家伙直到被李风林紧紧勒住了脖子时才发现有人过来了，但已经来不及叫出声来了。

摸掉了敌人的岗哨以后，李风林带着30多人进了西院，张寿钱带20多人进了东院，封锁了所有的门窗。

东院里住的是中队长黄毛和丁山等几个头头，当张寿钱破门而入的时候，这几个人正躺在炕上过大烟瘾呢。

“不许动！缴枪不杀！”

要是一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就吓得不敢动了，但开过阵仗的黄毛却不服气，只见他一伸手抓起了身边的烟灯，“呼”地一下就撒了过来，紧接着顺势一滚就要去取挂在墙上的匣子枪。此时站在门口的张寿钱一点也不含糊，他先是甩手一枪打落了飞过来的烟灯，然后用枪指着炕上的几个家伙，再次说了一句“不许动！”几乎与此同时，窗外涌进来一排枪口。

看到这阵势，这帮家伙再也没人敢动了。东院的枪一响，西院的李风林他们也马上动手，迅速缴了西院屋里伪军的枪。

至此，奔袭老钱柜的第一个动作便顺利完成了。

解决了查巴溪的敌人后，部队已经比较疲劳了。但张寿钱下令暂不休整，立即准备奔袭下一个目标——南岔，要求部队作到的，带队的几个领导首先做到——张寿钱亲自去做黄毛等几个头头的工作，启发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配合我军行动；戴鸿滨组织战士们换上伪军服装，进行必要的伪装；李风林则深入到套户们中间，动员他们赶着自家的大马爬犁支援部队的行动。李风林作群众工作是一把好手，没过多久，就带着十多张四马大爬犁来见张寿钱了。

张寿钱一见，十分高兴。他冲着老乡们一拱手，热情地对大家说：“麻烦大家辛苦一趟！”

一见张寿钱这么客气，那些爱说话的老乡急忙回答说：“这说哪去了，打鬼子嘛，没啥说的。”

而那些不爱说话的人也不好一言不发呀，这些朴实的山里人便呲牙一乐，把刚从李风林那里听来的，也是他们感到最实在的活重复了出来：“打下老钱柜，不交人头费。”

就这样，张寿钱带着队伍很快就乘着那些在冰雪上行走如飞的大爬犁顺着汤旺河连夜向南岔奔去。

队伍出发后不久，前面爬犁上的一个小战士便发现前面河床里有一团黑影正迎面而来。“喂，那是什么？”他悄声问道。“是一张马爬犁！”

“不错，正是一张马爬犁。可这深更半夜的哪来的爬犁呢？”“怎么办？”有人请求张寿钱。

“别开枪”，张寿钱一边对身边的战士说，一边告诉赶爬犁的老板，“迎上去！”。

飞快的爬犁很快就使他们迎头相遇了。戴鸿滨带着几个战士走下自己的爬犁来到对面的爬犁面前，那上面只有一个人。

“你是干什么的？”戴鸿滨问。

“我…，我……”对面爬犁上的人一见眼前站着一帮带枪的人，显然有些害怕。

“这不是陈永家的小子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戴鸿滨走到跟前一看，那人是他的一个同乡。

“我…，我……”那人一看是戴鸿滨，心里就更害怕了，嘴上也越来越不利落了。因为他早就听说戴参加了抗日的队伍。“你别怕”，戴看出了他的心事，对他说：“我们是打鬼子的，只要你说老实话，不会为难你。”

“我，我是五炮派来的哨兵，他正在后面巡视呢！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和你们走个顶头碰。”

这小子说的五炮，名叫宋喜斌，是于四炮的把兄弟，打猎的出身，枪法很准，是于四炮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被于四炮委任为查巴溪、南岔一带哨卡的总负责人，实际上也是伪山林警察大队里的第二号汉奸。

五炮在这个时候来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张、戴、李三人一碰头，立即定下了一个智擒五炮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全队不再强调隐蔽行动，而是让赶爬犁的老板儿把鞭子甩得“叭！叭”直响，大张旗鼓地向前开进。

李风林带着几个战士押着黄毛、丁山坐在第一个爬犁上。他用枪顶着黄毛的后腰，告诉他说：“呆会儿如果遇上五炮，你就说是山下送粮食的爬犁。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有人在后面给“撑腰”，黄毛岂能有办不到的事。工夫不大，五炮就到了。

在双方相距 200 多米远时，五炮的爬犁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听对方喊道：“什么人？”随后便听见一阵噼里咔嚓的枪栓响。李风林用枪一顶黄毛，黄毛立即喊道：“老五吗？”五炮听出是黄毛的声音，便问：“后面的爬犁是干什么的？”“是山下送粮食来的！”

“他妈拉巴子的，怎么偏找这时候送来。”五炮一边说着一边收起枪赶着爬犁走了过来。等他走到跟前的时候，这边爬犁上的战士也把枪给他支上了。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五炮一下子被弄糊涂了，既没有动也没举手。这时黄毛开腔了：“老五，我们都交枪了，你也服了吧！”

直到这时，五炮才明白过来。他向四周看了一眼，知道只有交枪了。便把枪交了出来。

五炮交枪后，发现没有人来搜他的腰包，也没有受到什么侮辱，这是他

万万没有想到的。他顿时大为感动，再一听张寿钱和他讲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道理也觉得在理。所以当要求他带队去缴南岔警察营地的枪时，他便满口答应了下来。由于他本人就是那里的头头，所以那里的敌人也在天亮时被解决了。

天亮后，张寿钱传下命令：就地生火做饭，休整一天，准备明天凌晨 3 点出发，直扑老钱柜。争取在明天晚上 9 点前到达老钱柜，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第二天凌晨 3 点，队伍准时出发了。当天晚上 8 点多钟时，他们便赶到了老钱柜。由于有五炮带路，于四炮在那里苦心经营的营垒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收拾掉了。最后只剩下日本指导官森山住的那座房子了。在解决这座房子里的鬼子的时候，李风林充分展示了他的机智勇敢。

他巧妙地绕过了那间房子外面的哨兵，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森山的面前。此时森山正在抽大烟。李风林进去后，一眼就看见了墙上挂着的那把手枪，立即飞步上炕夺枪，森山急忙蹿起身来，将他拦腰抱住。但他哪里能抱得住，年轻力壮的李风林用力一甩，这个小日本便从炕上落到了地上正烧得通红的火炉上……老钱柜，果然名不虚传，里边的货着实是不少。打开这个“钱柜”的飞将军们从那里得到长短枪械 100 多支，子弹 30 多万发，大烟土 100 多两，米、面几万斤。当然，还有 100 多个“活物”和 7 个日本“死倒”了。

39 林海学府

当赵尚志听到6军的部队已经按照他的命令打下了老钱柜的报告后，这位从黄埔军校出来的总司令，立即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

从政治军事学校的领导人事安排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地位还是很高的。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兼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总政治部主任张寿钱兼任教育长（后为侯启刚），张文廉任秘书长。到这里来学习的都是抗联各部队中的各级指挥员。

政军学校的校舍就设在原来代木工人们住的工棚里。这间大工棚是东北林区常见的那种木刻楞房子，呈南北走向，里面有东西两铺通房的大火炕，南北两头开门。屋子很大，里面能住一百多人。整个政军学校的教员和学员都住在这一座大屋子里，上课的时候大家就坐在火炕上，讲桌在南头，桌后有一把椅子，那是教员的位置。最初挂在墙上的那块黑板，其实那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做出来的一块“白板”，教员手中的“粉笔”是学员们自己烧出来的木炭，学员们手里的笔记本则是被订在一起的桦树皮。在屋子的北头，大家用木板隔出了一间装粮食和做饭用的粮仓和厨房。在屋子的南头，也有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子，里边有一个能住十多个人小火炕，这就是教员的宿舍兼办公室。在整座房子最好的位置——朝阳的南头给教员们营造了如此“优越”的公办和住宿环境，这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当时抗联领导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

政治和军事是政军学校的两门主要课程。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理论，学习政治经济学常识和中国近代史，通过学习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为什么会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高学员的革命斗争觉悟，明确了抗联战士的历史责任，通过系统地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坚定学员们对抗日必胜的信心。此外，他们还经常学习巴黎《救国时报》（在如此偏远的地方居然能够经常读到国外出的报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国内游击战争的活动材料和消息，以及莫斯科印的中国书籍和《共产国际》等刊物。

军事课则主要是结合东北抗日战场的实际，学习如何进行游击战。同时，校领导们还鼓励学员把眼光放得更远。第二任教育长侯启刚在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说：“现在我们打游击战，学游击战术，将来抗日力量壮大了，还要打正规战争，一个战役就消灭日本关东军几万乃至十几万兵力。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东北抗日联军会同全国一切抗日部队汇合在一起，把日本关东军赶出中国去！”

政军学校的教材都是教官们根据以往学过的专门知识结合学员的接受能力自己编写的。

学校的教学活动安排得很紧。白天，由教育长和教官们轮流给学员上课；晚上学员们就坐在大炕上分组进行讨论。这种教学方法，在今天说来也是不落后的。

在这所简陋的学校里的讲台上讲的人都是从抗联部队中抽调来的很有一些本事的人。

军事教员王玉升，就是一个被学员评价为“很好的军事教官”。王玉升

原本是抗联第3军第3师的师长，也是原先珠河反日游击队的一名“种子队员”（游击队有11个人时就有他一个），是一个为了打日本可以自己什么都不顾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每次作战时，他都身先士卒，为人也十分豪爽、大度，深受战士们们的爱戴。有一次打仗时，他的手被打伤了，落了个终生残疾，也得了个“王坏手”的外号。其实“王坏手”最大的毛病不在他的那只坏手上，而是他那爱喝酒的坏习惯。有一次他喝多了，大白天站在那里往天上放枪。治军极严的赵尚志知道这事后，立即下令撤了他的师长职务，把他调到了政军学校来当教员。那年月，在抗联里当师长和当教员也差不了多少。所以王玉升丢了师长职务当了教员后，干得仍然挺来劲。每天早晨他都早早起来带领学员出操。他讲话声音宏亮，越说越有劲儿，经常结合珠河反日游击队和后来抗联第3军许多他经历的战斗实例，总结经验教训，军事课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学员欢迎。第二任教育长侯后刚则是一个当时抗联中少有的深入研究过马列主义原作的人。政军学校的学员王明贵说他“看过马列的很多原作，知识面也很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丰富的抗日斗争经验，讲话哲理性很强”。可能是由于他本人平时讲话常常引经据典，甚至有些傲气（据说他曾自称东方侯大林），不少人对他有看法。有一次他对别人说，《资本论》对他裨益很大，那个人挖苦他说：“马克思在天之灵给我们送来了老侯。”而他则回答说：“就是这样。”

侯后刚对许多问题都有他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且时时用辩证法的眼光来分析当时抗联面临的问题。曾经写过《论统一战线》、《东北抗日队伍的分析及义勇军改造策略》等论文。这位抗联队伍中的第一号理论家的思维方式也很有些哲学家的味道。下面这一段他自己关于其在病中思想活动的记述：

“……自该病发作后，我曾每天陷在无限的思索之中。有一天曾发现了辩证法的发展形式：从时、空来说，是纵横的三角形；因而一切事物也都是纵横的三角形。继而夜里观星，发现一切基本形式是三角。因为某角形的星群可以分解为无限的三角形，因此，圆周也无非是无限的三角形的一角向内部的结合，线也是无限的三角。最后想起了一切事物在尽量发展，全部是波浪式运动的辩证法。质量无非是不同的波浪式运动的发生，波浪式运动当然是不断生起的纵的三角形，因此认为三角形是一切形式的本质。于是就越来越确信：一切事物是纵横三角形。又想起了在战斗队形上，各一角是其他两角吸引与推动的结合，进攻、退守、待机包围就是进退并行，静动并用，公开的秘密的联系和行动——也就是确保辩证法的一致。就是说以全力采取辩证的综合或综合的方法，就一定能战胜敌人，最后，我认为：无限的‘辩证三角体’是战胜敌人的唯一无二的阵式或队形。

“有如上述，我的英雄思想在病中复活，使用的武器是辩证法，当然首先应该解决东北问题。就是说：如何突破1938年即将到来的敌人的‘讨伐’。结果在似病非病的思想中决定了：应在党军一致行动之下，尽可能地配备无限大小‘辩证三角形’，即：南满1、2军成一角，这能由1、2军的同志配备，我来建议其他两角的方法，即：4、5、7、8、10军赴吉林中部长白山脉老爷岭西东形成一角；3、6、9、11军赴黑龙江小兴安岭嫩江流域形成一角，而且每一角则编成等差三角形。以全满为范围，用大三角来牵制敌人。这样，敌人就不可能各个击破……”

这所政军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却为抗联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当时，学员从这里毕业后一般都到各部队任师长、团长等职，这些人在抗日战

场上为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第二期学员王明贵将军在回忆录中饱含深情地写道：“小兴安岭松涛阵阵，汤旺河波涛滚滚。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许许多多的同志通过学习迅速成长为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位将军还特意提到了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在抗联打下老钱柜时俘获的伪森林警察中队长宋喜斌（即五炮）。宋在被俘后参加了抗联，此后，他在政治上进步很快，作战也非常勇敢，被送进学校深造。他毕业后回到部队任团长，在 1938 年 9 月下旬为保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的安全，他带领 30 多名战士与超过自己数倍的日本讨伐队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他一个人就打死打伤 40 多名日本鬼子，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宁死不降，最后把满腔的鲜血都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40 冰趟大捷

军政联席会议之后，第3军和第6军除了加紧建设汤旺河后方根据地工作以外，同时，还在积极组织准备西征，继续开辟通河、东兴、巴彦、木兰、铁力、庆城（今庆安）、海伦等地的游击区。

1936年3月，赵尚志率第3军第5、第6团、少年连、保安营共300多人开始了西征。

西征部队出发不久，便不断有捷报传来。4月初，赵尚志带领西征部队攻占了通往巴彦、木兰、通河的军事要地舒乐镇，俘日伪军100多人，缴枪300多枝，一举拔掉了日伪设在松花江北岸的这个重要据点。此后不久，西征部队又在依兰县八浪河谷消灭不少日军，并缴了伪军一个连和1个伪警察队的枪械。夏初时节，西征部队顺利到达木兰县境，以那里的蒙古山为基地，在东向通河、西向巴彦的一些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并收编了40多支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抗日武装，第3军的第5、第6团的实力迅速得到发展，被扩编为第5师和第6师。

西征部队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扫过所到之地，使日伪极为震惊。他们迅速调集重兵于滨北线一带，企图一举消灭赵尚志的部队。但赵尚志却不与其进行正面作战，为此，他决定改变原定向庆城、海伦一带西征的计划，率部队迅速返回了汤原根据地。

几乎就在赵尚志带队西征的同时，第3军的第1、第2、第3、第4团在松花江南岸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同样也在战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分别扩编为第1、第2、第3、第4师。这样，第3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已经从原来的6个团变成了6个师。游击区遍及松花江南北两岸的20多个县。

在这种形势下，第3军于1936年8月1日正式发表通告宣布：

“决定于本年8月1日起，将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收编各队，联络各军，消灭此疆彼界，各树一帜，尔东我西，各行其志。以发扬光大我抗日之旗帜，以巩固我反‘满’之武装。”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刚成立时，下辖6个师，其后不久又相继采取收编和扩建的办法建成了第7、第8、第9和第10师，得总兵力达到了6000多人。

在第3军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第6军也由原来的4个团扩编为7个团，并于1936年9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人多了，枪多了，游击区的地盘大了，这就需要有一个更加有力的领导机关来统领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全局了。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汤原中心县委及抗联第3军和第6军党委在汤原帽儿山北坡第3军的被服厂召开。是为抗联历史上有名的“珠汤联席会议”。

“珠汤联席会议”做出了两件重要的决定：第一是决定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并选出了以赵尚志为主席的15人执委会及冯仲云、李福林、张兰生三人为省委常委；第二是决定突破敌人的秋季“大讨伐”，开辟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的游击区。

“珠汤联席会议”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又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进一步研究确定了第3军和第6军的反“讨伐”对策。最后决定：第3军司令部迅速率主力西征铁力、海伦、龙门，然后直插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活动。根据这一精神，赵尚志率第1师、第5师、政保师和少年连组成的500多人的骑兵部队，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先在庆城与第9师部队会合，然后又于12

月间到达了铁力。与已经在到达那里的第6师会师。

到了铁力后不久，敌人就出动了大量的兵力对他们进行“围剿”。敌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赵尚志他们赶到山里去，使其陷于冻饿绝境。

赵尚志带着队伍连夜向山里行进，走了几里后，后面坐着马爬犁追他们的敌人便接近了3军的后卫部队——6师73团。我部战士抢先开枪，战斗立即打响了，73团的战士们在团副杨宏杰的指挥下，很快就将敌人打了下去。

当杨宏杰兴致勃勃地向赵尚志汇报时，赵尚志立即意识到，日本人不会白吃这个亏，肯定还会再来的。于是，他传下令去：全队火速前进，甩掉敌人！

赵尚志的命令传下去后，3军的战士们立刻加快了脚步。但是，没走多一会，他们又接到了赵尚志让他们停止前进，班长以上的干部立即去开会的命令。战士们一时都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

原来，赵尚志在带着部队一边向前快走的同时，心里却一直在想，像这样自己在前面靠两条腿走，人家在后边坐马爬犁追，迟早会追上来，所以走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找个地方打他们一下子才是上策。这样，他在走的同时就一刻不停地留心着周围的地形情况。当他来到一个名叫冰趟子的地方时，他的眼睛突然一亮：眼前有4座伐木工人住的大木营，每个木营都很大，足可以容纳200—300人。在木营附近，有一眼常年流水不止的山泉，由于此时正是冬季，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时，便在所流经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道高低不平的冰层，故称为“冰趟子”。

赵尚志仔细地察看了冰趟子附近的地形后，对大家说：大家都看见了吧，这4个大木营挺坚固，可以固守；沟两边是山林，可以埋下伏兵；你们看见那沟口了吧，那里很窄，我们在那里既可以断敌退路，又可以阻敌增援。总之，这里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地方、咱们就在这等着小日本鬼子们，好好打他一顿吧！对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当年在赵尚志身边亲历了这次战斗的3军6师师长张光迪回忆说：

“按他的指挥，我们设了伏击圈。……下午，敌人来了，都是伪军，他们进沟进了一半，发现有埋伏，赶紧仓皇撤退。我们开了枪，打死了一个伪军中队长，其余的连滚带爬地跑了。”这边刚打完，冰趟子方向就响了几枪，赵尚志立刻带领我们去支援6师。到了那里，敌人已经跑了。听哨兵说：他们二人正坐在荒草丛里放哨，二十多张爬犁拉着一百多鬼子来了，直到很近才发现。他俩站起来连开数枪，因为太突然，把鬼子吓了一跳，征来拉爬犁的马没受过训练，受惊之后扭头就跑，只捡到了日军的几件衣物和军毯。

“赵尚志听完说：‘那边的伪军刚让咱们给打跑了，今天不敢再来，这边的鬼子一会还要来报复，咱们在这里打他一家伙！’……“傍晚，鬼子来了，大概有二百多，他们老远就跳下爬犁，跑步向马架子冲来，我们把司令部的两挺机枪和5师、6师的四挺机枪集中在一起，架在围墙上猛烈射击。鬼子被我们打倒一片，其余的趴在地上拼命还击，并屡次发起冲击，但都被我们打退了。看来，鬼子要和我们决一死战了。

“天渐渐黑了，也越来越冷，刺骨的寒风吹得我们隔一会儿就得到马架子里暖和暖和，不然食指就没法打弯扳扳机。趴在冰上的鬼子不断得到增援，一爬犁一爬犁的鬼子从远处奔来了。但我们有六挺机枪居高临下扫射，他们怎么也冲不过来。日本鬼子很恼火，指挥官几次挥舞战刀督战都没成功，但他们坚决不肯撤退，企图冲过来和我们拼刺刀。我们抗联战士的步枪上没有

刺刀，因此，是决不能让这些鬼子冲过来的。

“天黑以后，战斗仍在继续。气温开始急骤下降，呼啸的北风吹得地上的积雪直冒白烟，到了零下四十多度。渐渐地，有些枪支冻得都打不响了。逢这种时候，我们就跑回马架子里烤烤火，再出来打。到了后半夜，鬼子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可还撑着不撤，我们就组织了几个小分队，轮流从马架子里出击，从侧翼袭击敌人，打几分钟就回来烤火。另外一个小分队再去出击。就这样一直打到拂晓。

“天渐渐亮了，这一夜敌人被我们打死打伤不少，但具体情况不清楚。赵尚志决定撤退，不再跟敌人纠缠。我们撤到山上，天已大亮，从山上往下看，到处是鬼子的尸体、武器、装备和军毯。鬼子眼睁睁地在山下看着我们撤退，也没来追击，看来，他们已经没有这份力量了……

“冰趟子战斗，是以我军伤亡七、八个人，鬼子死伤四百多而告结束的。”

41 夜袭汤原

第6军在军长夏云杰的带领下，坚决贯彻落实“珠汤联席会议”精神，于1936年秋开辟出了依兰、桦川游击区。但是就在他返回汤原根据地积极筹备给养、服装准备再次亲自率队远征佛山的时候，却在汤原西部的丁大干屯遭敌伏击，身受重伤。多年后，刘铁石还记得讲述了当时夏云杰受伤后的情景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

“……太阳落山了，我们策马沿山间大道急驰。前头是做尖兵的少年连李连长和两个战士，中间是夏军长、吴长江副官和我，后面是少年连一百多人。尖兵过去后，埋伏在道两侧的敌人没有开枪。等我们三人顺山一上，敌人枪响了，我眼见夏军长从马上跌下来，我和吴副官赶紧下马去救他，把他扶到一个山窝里让他躺下。夏军长额上流着豆大的汗珠，脸色灰白。他对我说：‘老刘，赶快去告诉队伍往上冲，打退敌人，把我的尸首带回去，不能让敌人得去。’

“……战斗结束后，我们做了一副马抬担架，把夏军长一气抬到古场沟山里的一间破房子里。尽管这时他已经疼得冷汗直流，却对大家说：‘你们先不要出山，明天一早回去把战场打扫了，把牺牲的同志弄回来埋上’。

“……我们把夏军长抬到密营后，准备送他去苏联治疗。可夏军长却说：‘路途太远，又难走，我们又没那个本钱，还是先在山里医治吧。’

“当时我们既无医又无药，疼得受不了时我就用大烟给他止止痛。

“在他负伤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睡醒一小觉后高兴地对我说：‘老刘，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日本人被赶跑了，我们俩骑着马，走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说着说着，我看见他的泪水流满了两颊。他又说：‘老刘哇，快把参谋长冯治纲找回来吧，研究研究这个队怎么办，我恐怕是不行了，’……”

11月26日，夏云杰永远地离开了这支他亲手创立起来的队伍。

夏云杰牺牲后，戴鸿滨接任第6军军长。根据中共北满省委指示，第6军确定了由军长、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形成的高级会议来解决重大问题的领导体制。随后，又对第6军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将原来的7个团，扩编为4个师。经过整顿后的第6军各师活跃于松花江下游地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中至今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夜袭汤原的故事就是在这时发生的。1937年5月，第6军主力部队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指示远征海伦。汤原境内就只有6军参谋长冯志刚带着100多人的留守团看家了。可就在这时，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却接到了这样一份情报：日寇下了血本，要血洗汤原县，并为此派来了17名日本高级参事官。

冯治纲从县委开完会后，回到留守团告诉干部们说：“县委决定，去打汤原县城！”

“打汤原县城？就我们这100多人，行吗？”干部们听了以后，张大嘴巴问。

“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冯治纲说，“趁敌人刚到，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捣乱这个马蜂窝。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一个顶100个，何况我们人数还不止几百！”

听了冯治纲的话，干部们更糊涂了——“那有那么多人啊！？”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冯治纲也不多解释，便开始给他们分配任务

了。大家也满怀疑惑地去做准备去了。直到天黑以后，他们才明白冯治纲话里的意思。原来，各乡的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农民自卫队都来了。曾目睹当时壮观景象的刘铁石后来回忆说：“他们有的扛着土枪洋枪，有的拿着红缨枪，更有许多人手里提个洋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几乎是路有多宽，人有多宽，从四面八方涌向汤原。”

半夜时分，队伍来到了汤原城外。这时候就见城门开了，接着又闪了几下红灯。进城后便在更夫们一声接一声的“平安无事”的吆喝声中控制了城中的大碉堡，缴了一个排伪军的枪，然后悄悄地来到了县府大院外——这些都是在事先安排好的内线的协助下进行的。

队伍进了县府大院后，立即分成两股。一股直扑日本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住处；一股直奔日本守备队所住的东厢房。很快，汤原县城里便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当然，在这密集的枪声里，有多少是从洋铁桶里发出来的鞭炮声就谁也说不清楚了。枪声响起来后，农民自卫队员和各种群众武装便把日军和伪军牢牢地困在了院子里，他们一边吆喝，一边放鞭炮，吓得敌人不敢走出来一步。

在“内线”的帮助下，住在县府大院旁边的 300 多名伪军很快就停止了抵抗，交出了手里的武器，而住在东厢房里的日本守备队的 42 名鬼子则一个不落地统统被送回“老家”去了。冯治纲带着冲锋队没费太多的力气便打死了新派来的那 7 个日本高级参事官和日本副县长。伪县长看着眼前这一切，吓得冲着冯治纲直喊“饶命！饶命！我没签字！”

“什么字？”冯治纲有点不解地问。

“血洗计划。我没签字。”

冯治纲拿起桌子上的文件一看，果然是一份“血洗计划”。他三下两下把它撕碎了，然后冲着伪县长说：“这回再也不用你签字了。”

天快亮的时候，冯治纲等人带着缴来的 3 门迫击炮、3 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半麻袋手枪，唱着歌撤离了汤原。

“抗日志士，杀敌疆场，
争独立，求解放，冒雪披霜，
坚持抗战，山高水长，
宁战死，不愿国家亡，
不除日寇不还家乡……”

第十三章

日本扶植起了个满洲国，但对那些汉奸们并不放心。觉得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地方还得靠日本人自己。因此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向满洲进行武装移民的计划。1932年8月，日本第63届临时国会通过了第一项向满洲武装移民500户的决议，同年10月，日本第一批武装移民团493户到达佳木斯并于次年2月转入桦川定居。1933年7月，第2批武装移民团494户到达土龙山区。日本武装移民来了以后，便要“买”中国人的地。怎么个买法呢？当时在依兰县一垧熟地价格在58.4~121.4元，就是最差的荒地也要41.4元一垧。日本人出的价格则是无论生地熟地一律是一垧地一元钱！

“日本子这哪里是在买呀？这不明明是在抢吗！”土龙山人一听就火了。“跟他们干！”

土龙山人要跟日本人干，日本人自有对付想和他们干的人的办法。他们下令要搞“治安肃正”，强行收枪。把你们的枪收上来你还用什么和他干？

1933年秋天，土龙山区曾经收过一次枪。当时老百姓把一些破枪交上去，以为可以糊弄过去算了，而把好枪留下来，第5、6两保的人还组织起了一个自卫团。

这年冬天，日本的武装移民为了第二年春耕，就到八虎力乡去抢农具和牲畜，于是，那些被抢的农民们就到县里去告状。居然还有人敢告日本人的状，是不是要造反？日本参事官到八虎力乡去了解了一下情况，到那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那些农民的背后有一个指使人——谢文东。

谢文东，从长相上看属于东北人常讲的那种“车轴汉子”——矮胖而结实，书念得也不多（只读过4年私塾），但却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16岁上就做了当家人，带领全家人种地养蚕倒马贩盐，有时还当一把“业余胡子”，干干剪径绑票的勾当。后来就因这事“没整利落”，而被官府通缉。他可不愿意在那等着人来抓他。于是就带领全家从辽宁宽甸县来到依兰县土龙山区，投靠他表叔。到了土龙山区后，谢文东一家很快就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了。家里有地100多垧，盖起了大房子，修起了大院套，还买了两支手枪4支大枪，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那时候，一般的外来户在土龙山区是很难出头的，但由于谢这个人胆大气粗，办事也挺有魄力，很快就与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交上了朋友，成了那里数得着的“面上人”。1929年被依兰县官府任命为土龙山区第5保的保长，老百姓都叫他谢保董。“九一八”后，李杜在依兰举旗抗日，谢就当上了土龙山骑兵旅自卫团的团长。在当自卫团团长期间，在防止土匪抢劫，特别是在对付日本武装移民的骚扰时做了不少为人称道的事，他也因此在老百姓中有了一定的威望。

谢文东极迷信，他总随身带一个小铜佛、一本卦书和一本《诸葛亮金钱术》，每当遇上重大事件，他都要把小佛供在地上，跪下来算上一卦。

在伪满的县政府中，日本参事官（后称副县长）就是县里的太上皇。那个日本参事官了解到是谢文东指使农民到县里告状的后，便下令撤了谢的保长职务。谢文东虽然把官丢了，但却赢得了更多的老百姓的信任。

1934年春节前，太平镇警察署传下日本人的命令：腊月三十前，所有农民都要将手里的枪支弹药送来登记、造册、打印，否则以私藏军火罪论处。与此同时日本兵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地照和枪支。

地和枪是农民们的两条命根子。现在日本人要把它们都拿走，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大家一商量，就决定举行暴动了。要暴动总得有个头吧，找谁当这个头呢？他们想到了谢文东。谢文东开始也有点犹豫不定，但是等他看到那些农民摆出了“你不领头暴动就要杀了你”的架式时，他也就只好来当这个头了。和他一起领导暴动的还有清茶馆的甲长景振卿。

听到土龙山农民暴动了，依兰县县长关锦涛先来“宣抚”了一通，但却被骂了回去。文的不行，就来武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63联队长饭家朝吾大佐在依兰地区伪县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的陪同下带领一小队日军和一部分伪警察，来到了土龙山。他们以为那些农民如果一见到皇军和警察都来了，肯定会老实了。没想到愤怒的土龙山人根本不买他们的帐，他们一到那里就受到了猛烈的射击。结果，饭家大佐、盖文义以及17名日军都被打死了，其余的也被俘虏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土龙山农民暴动。土龙山农民暴动后，日本人十分紧张，他们立即派出大批部队前去镇压。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暴动的首领们召开会议，决定把各家各户的人员和枪支统一编队，以保为单位，全区6个保，编为6个大队，部队取名为民众救国军。谢文东任总司令，景振卿任总指挥。

民众救国军成立后不久，就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次是在九里六击败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另一次是打下了腰陀子金矿，但却在攻打湖南营日本移民团的战斗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景振卿就是在这仗中牺牲，代之任总指挥的是一个叫周雅山的人。周雅山原是李杜抗日自卫军总部卫队营的第1连连长，李杜退入苏联后，他仍留在东北。1933年夏，李杜回到上海后，周便于8月份前往上海找到了李杜，11月，又被李杜派回东北，当他来到民众救国军后，谢文东见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又是李杜的代表，与各地的头面人物都很熟悉，便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待为上宾。

为了对付土龙山的农民暴动，日伪当局经过一番争吵后决定采用恩威并施的办法。1934年4月，他们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派出政治工作班，宣传“土龙山事件。”日本人这一招还真有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民众救国军内军心动摇、弹药缺乏的情况就已经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了。为了挽救这支队伍，中共佳木斯党组织派往队内的两名共产党员杨德金和白云龙立即回到佳木斯，向党组织负责人董仙桥做了汇报。董仙桥等经研究后决定，写信给饶河游击的张文偕和李学福，讲明民众救国军目前的处境，我们以去苏联援为理由，把民众救国军带往虎饶一带，请饶河游击队想办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共同抗日。

1934年5月下旬，谢文东带着民众救国军前往虎饶。一路上由于不断遭到敌人的打击和许多人不断开小差，等他们到了虎饶时，已经比出发时少了三分之一的人马，只有1000多人了。谢文东在往虎饶走的路上一路想着如何才能通过饶河游击队得到苏联现成的军火，可是没想到等他见到张文偕后，却听张对他说：哪里有什么现成的军火？我们的军火都是从日本鬼子那里缴来的。但谢文东并没死了这条心，他又派周雅山和杨德金一起前往苏联请求援助。

周雅山等来到乌苏里江边的时候，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与苏方根本联络不上；另一方面，周也认为即使能过去也不管用，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便去了佳木斯，然后又从那里去了上海。周雅山不辞而别，可让谢文东等苦了。在随后等待周雅山传来好消息的两个月时间里，他的部队不断出现逃

亡事件，最后只有 500 多人了。直到 7 月份的时候，他才知道周雅山根本就沒到苏联去，这样他也只好带着队伍回到了土龙山区。

谢文东带队回到土龙山不久，就发现此地不能久留。因为不少队员一回到家便不再想干了，同时，还不断有人前来劝降。在这种情况下，谢文东只好带队离开那里，到来才河、四道沟一带活动。当冬天快来的时候，他决定带领部队进到牡丹江东岸的深山里去“猫冬”，以躲避敌人的冬季“讨伐”，让部队安全地度过寒冷的冬天。但就在他准备带队进山的时候，部队却遭到了日伪军的突然袭击和层层包围。最后，他只带着滕松柏等十几个亲信杀出重围，逃到了依兰县吉兴河的深山里。

就在谢文东走投无路的时候，原来曾和他们一起战斗过的“明山”队首领祁宝堂来看他了。祁宝堂告诉他说，这个地方不能呆，太危险了，咱们一起到方正县一带去活动吧，那里有李华堂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祁宝堂说的这位李华堂原本是东北军李杜部的一名下级军官，此人头脑敏捷，也颇有爱国热忱。当初李杜率部退到依兰的时候，李华堂奉命驻守刁翎。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保卫地方安全，李华堂在 1932 年 8 月在小上城子收编了一些地方大排和山林队，组成了一支队伍，取名为“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可能是因为这个名字太长，不大好叫，所以人们多把其称为“李华堂支队”。

李华堂支队成立不久，便在刁翎一带展开了积极的游击活动。到底是行伍出身，李华堂的仗打得挺好，在每次战斗中，他都十分注意尽量做到知己知彼，反复对比敌我双方的力量和所处的态势，然后再做出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以及怎样打的决定。他打仗的门道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不打硬仗，不打蛮仗。

由于李华堂指挥打仗的方法对路子，所以经常能打些胜仗，同时也能很好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这就比一般的山林队高出一大截，当时在那一带活动的“满天星”、“爱国”、“合作”、“双龙”等山林队都跑来投奔李华堂支队了。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编队，但这些都愿意听李华堂的指挥。与一般的山林队首领相比，李华堂不但在指挥打仗这方面比他们强，而且更比那些人有远见和鉴别力。通过与共产党游击的一些接触，他发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纪律严明，抗日坚决，战斗力也比别人强，因此很愿意和游击队接近。在汤原和游击队一起行动时，曾与游击队建立了共同指挥部，在作战中表现也比较积极。当时，武器是很紧张的，但他知道其部下把自己的手榴弹和枪支送给游击队员时，也没有制止。每当游击队到了他的地盘上活动时，他都热情接待，为其提供食宿。有一次李带着部队与游击队一起行军，李部先过了河后，还专门把马队派回来接游击队过河。

李华堂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他对一般的贫苦老百姓也能表现出同情心，他的部队很少发生扰民事件。他们的军响主要是靠向地主和把头等有钱人抽税解决的。

谢文东在方正县东南 70 里的山寨里见到了李华堂。李华堂说，不瞒你老兄说，我的部队现在也只有 60 来号人马，日子也不太好过，比你也强不了那去。麻绳专在细处断，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咱们都不好办。

谢文东问：那该咋办？

李华堂说：去找赵尚志，他的第 3 军现在干得挺火红，而且据我所知，那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

谢文东说：我现在力量不大，赵尚志会不会把我们当去“靠窑”的不“绌子”，把咱给“吃”了，再说，他是共产党，咱们去找他，能行吗？

李华堂说：行！你要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小，我可以支援你一下。

李华堂说话算数，还真给了谢 20 支短枪、2000 发子弹和 7 名部属。于是，谢文东终于答应和李一起去找赵尚志。

李谢二人在宾县三道河子找到了赵尚志的队伍，但谢文东并不敢相信赵尚志，所以第一次只有李华堂一个人去见赵尚志。在这次会见中，赵尚志答应李华堂，要在第二年春天帮他们重整队伍。

到了第二年春天，赵尚志率第 3 军东进方正县大罗勒密，在他到那里之前，张寿钱带第 3 军第 1 团先到了延方一带，他从祁宝堂那里听说谢文东此时正隐居在方正县南二和尚庙里，便带着一部分队伍去见谢文东。

张、谢相见后，可以说是各有各的打算。张寿钱认为，民众救国军虽然遭到了重大打击，但谢这个人在下江一带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他能和第 3 军一起到下江一带活动，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土龙山一带的反日新高潮。而谢文东此时心里则在想借赵尚志和第 3 军的威望重新把自己的队伍拉起来。

这样，当赵尚志带第 3 军来到方正大罗勒密后，便很快与谢文东、李华堂、祁宝堂等部共同建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由于这是一支以第 3 军为核心的队伍，所以在领导人的构成上也反映出了这一点。赵尚志任总指挥，李华堂任副总指挥，张寿钱任总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任总秘书长。谢文东则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后，谢文东、李华堂带领他们的民众救国军和赵尚志的第 3 军等一起攻占了敌人设防坚固的方正县城。这次胜利使谢、李二人及其屡遭失败打击的部下的对日作战信心大增。打完方正以后不久，谢、李二人带着自己的部队与第 3 军分开活动去了。

1935 年 10 月，日军的冬季“讨伐”开始后，谢文东就又感到有点吃不住劲了。这时，赵尚志对他说，和我们一起到松花江北岸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吧！谢文东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很高兴地跟赵尚志去了江北。但是谢文东还是留了个心眼儿，他自己带队去江北时，却把滕松柏留在了江南，让他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个滕松柏是个很能干的人。此人在前清时给人当过仆人，后来又在张作霖的部队里当过连长。土龙山暴动后任民众救国军旅的指挥，是谢文东最信任的人之一。

谢跟赵到了江北后，受到了汤原反日游击队的欢迎。1936 年 1 月 26 日，他参加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共同筹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临时政府。他被委任为顾问部的委员长。谢在刚来到江北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挺高兴，但这股高兴劲没过多久就没了。原来，谢之所以愿意和第 3 军一起活动，主要是想借赵尚志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实力，但在和第 3 军跑了一年多里，他的部队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了，但人数却没有增加多少。这次到江北以后，看到第 3 军与汤原游击队、还有第 4 军第 2 团的部队关系比与自己近得多，汤原游击队在第 3 军无私地援助下发展成了第 6 军，他因此觉得赵尚志对自己另眼相待了。谢文东觉得总这样下去，自己的队伍不知到哪一天才能发展起来，要想发展还得靠自己。于是，他决定离开汤原，回到江南去。就在谢文东带队到江北的这段时间里，留在江南的滕松柏却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谢文东回来之后，他们又合到了一起，并决定在五道河子的深山

里修建起了密营，做为他们自己的大本营。

李华堂率部与第3军分开后，于1936年初返回松花江南岸。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李华堂再一次表现出了他在打仗方面的才能，扫平了三道河子木营里的伪森林警察，偷袭了依兰县城西南的南大营，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8月下旬，李带队去苏，年末回国。

1936年夏天，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接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6年3月12日发出的指示信。信中要求中共珠河党团县委和第3军要想办法把谢文东的部队扩编为抗联第8军，并提出“关于李华堂部队之实力并须予以实际之援助，他亦有相当基础，编为抗联第9军”。接到这封指示信后，第3军和第4军、第6军联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经过研究决定派具有丰富统战经验，而且曾经与谢文东搞过一次谈判的第4军军长李延禄为代表，去与谢文东就改编其部队的问题进行谈判。

李延禄与谢文东的上一次谈判是在1935年9月份，谈判的目的是想将谢的部队改编为第6军。但是谢文东当时很不情愿。他对李说：抗日的部队一不抢、二不夺，可我手下的弟兄们如果不能按时发饷，是很难维持的。

李说：军饷问题在改编之后可以逐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你的部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配战利品。只要你和我们一起抗日，在敌占区开展斗争，军饷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谢说：我不能和你们一样。第一我这个人吃不了苦；第二是你们目标太大，大就招风。我手里又没有你们那么多机枪，日本人一打还不把我给打散了呀，还是让我打着民众救国军的旗号吧！于是，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李与谢的这第二次谈判还是在谢的大本营——五道河子密营里举行的。谈判开始后，李延禄先向谢文东讲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及抗联方面有关改编他的部队的意图，然后对他说：如果你愿要抗联第8军的名义的话，部队还需要扩充，从目前来看就要再建立两个补充团；连队以上都需要按我们所采取的统一编制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团有团政委，连有指导员。

谢说：“部队要扩大，我还能不乐意吗？可是没可靠的人，我的保卫连队可不能交出去。”

李延禄早就想到了谢会在谈判中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在来到五道河子后便仔细了解了谢的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里的人员情况。他发现，在这个总司令部里，既有管谢叫“姑父”的副官，也有管谢叫老叔的“参谋”，好多人都是谢的亲戚。掌握了这一点，李延禄便了解了谢文东的用人之道。所以，在谢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便对他说：团长还是你自己的人，我们不动。

谢说：“我哪里有这样的人呀！”

李说：“包副官不行吗？”

李延禄说的这个包副官其实就是谢的外甥，当时正在谢的总司令部里当副官。谢一听李说包副官可以当团长，心里很是高兴。于是便顺水推舟地说：“你说行就行！”

李接着说：“我看还有一个人可以当团长。”

谢说：“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

李说：“就是你的妹夫李初坚呀！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进行扩编。”

谢说：“这我当然愿意。但是哪来那么多枪呀？”李说：“枪的问题，我们来帮你想办法吧。”

李、谢谈判之后，改编民众救国军的准备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不久，抗联第5军第2师开赴依兰、勃利一带活动。这样，帮助谢文东改编的工作就由他们来接手进行了。在第5军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第5军2师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的具体指导下，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终于在1936年9月18日那一天正式宣布成立了。谢文东、臧松柏分别就任第8军正、副军长，共产党员刘曙华任军政治部主任，于沧世任参谋长。

9月20日，抗联第8军发表成立宣言。宣言指出：

“中国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中华民族正处在悬崖之危，每个有热血有祖国观念的人们都知道，现在忍耐不足以自存，苟且而不得偷安，当此亡国灭种之秋，抗日

救国已成为每个中华男儿之天职……，只有起来救国自救，学土龙山之起义，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本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在民众救国运动的紧急关系上，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总会之领导，……为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而斗争！”

1937年1月，李华堂支队正式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参谋长李向阳，副官长于真。

43 双龙担纲

抗联第10军军长的名字，在各种有关抗联的历史书上都不一样，有写成汪雅臣的，有写成汪亚臣的，还有写成王亚臣的，其实这都是一个人。如果再查一下资料，还可以查出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王景龙。在这里，笔者按照目前最权威的史书记载将其写为汪雅臣。

汪雅臣本是五常县人，少年时代因家贫而只读过一年私塾，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放猪和下地干活。15岁那年（1926年）跑出去到苇河县当了伐木工人。本想能闯出条生路，可是干了两年才知道，在外伐木和在家种地也差不了多少，于是就又回到了老家。回到老家后，他一没钱二没地，还是没法活。情急之中，他想到了穷人们穷得实在没办法时常想到的一招——当胡子去。

当时，在汪雅臣的老家那儿正好有一个报号“东双胜”的绺子，汪雅臣便到那里落了草，报号为“双龙”。

1929年春，原东北军第26旅第34团来到了夹信子带，与东双胜他们打了一仗。东双胜这伙胡子人少势单，一下子就被打散了，汪雅臣在这次战斗中被抓当了俘虏，当上了一名士兵。“九·一八”事变后，第34团投降了日军，汪雅臣不愿意当亡国奴，便约了几个有爱国思想的士兵一起携枪带械地跑到山里自谋生路去了。这时，他听说东双胜又拉起了一个“保胜队”，便带着自己手下的那20多号人来到了“保胜队”，他自己则当上了“炮头”。汪雅臣虽然又回到了东双胜的“绺子”里，但他这时的思想却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对东双胜说：“东北已经失守，国家就要完了，咱们可不能再当胡子了。没有国就没有家，我们应当枪口对外，专打日本鬼子……”可是东双胜却根本听不进去。多年来的山大王生活已经使他养成了一身匪性。汪雅臣见说不动他，便决心后已干了。

1932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汪雅臣正要带着弟兄们去袭击日军的一个据点，突然附近村子里的一个老百姓跑来对他说：“东双胜又到屯子里抢老百姓东西了！”汪雅臣一听，当时就火了。“这样的大当家的还留着他干什么？”他带着一帮人找到了东双胜，二话没说就把他给枪毙了。然后，他对“保胜队”里的弟兄们说：“北史们，大掌柜的下场是他自己逼出来的，我曾经多次劝他改邪归正，但他就是听不进去。眼下，咱们的国家就要亡了，东北的老少爷们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咱们要专门打日本鬼子才对呀！现在，我接管全队，弟兄们有愿意跟我一起打鬼子的就留下，不愿干的就回家。”

听了汪雅臣的话，队里的弟兄们都说愿意留下来跟汪雅臣一块抗日。从此，汪雅臣就在五常南山里一带扯旗抗日了。他带的这支队伍因他报号为“双龙”而被称为“双龙”队。

“双龙”队成立半年多以后，就遇上了一件不太好办的事。原来，1933年春天，驻守在五常县山河屯的伪军一个营400多人，在刘营长的带领下举行哗变，然后来到了五常县南山里和九十五顶子山西莲花座。7月份，刘营长给在南山里活动的各小股山林队首领下了“帖子”，约他们到一起开会。汪雅臣就是到会人之一。

汪雅臣到会后才知道，刘营长找大家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和他一起去打另一伙与其争地盘的地方武装。汪雅臣一听就烦了，转身就要走。这时，刘营

长问他：双龙，你到底愿不愿意去？汪雅臣说：不愿意！现在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去找日本鬼子，而不应该互相火并。

汪雅臣一带头，那些本来也不太愿意跟刘营长干的人对刘营长也都提出了不同看法。刘营长一见这些人不听自己的调遣，便只好宣布休会。但同时提议大家第二天都带着自己的队伍前来集合。

汪雅臣一听这话就感到有点不对劲，回到队后心中暗想，如果明天去的话，十有八九是要被缴械的（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果如他所料，那些去了的山林队都被刘营长给缴了械），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但是事已至此，在南山里也就无法再呆下去了。为了防止刘营长下一步来吃掉他的队伍，汪雅臣果断做出决定：离开五常南山，连夜赶奔朱家上口，投奔宋德林的反日山林队。

汪雅臣前去投奔的这个宋德林，原名叫宋传廉，人称大德林，也是五常县一带有名的大胡子头。大德林虽说是胡子，但却是那种比较仁义的胡子，他的“络子”专抢一些有钱的富家大户，从不搔扰贫苦百姓。加上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公开扯起了抗日的旗帜，所以名声很好，队伍发展也很快，现在已经有 1000 多人了，是五常县一带较大的反日山林队。

汪雅臣找到宋德林，向他谈了自己的来意——为了抗日救国，要求将自己的队伍编到宋德林的部队里去。但是，他又强调说，他的“双龙”队编入宋的部队后，“准编不准调”。就是说，他仍然要保留“双龙”队的指挥权，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配合宋部一起作战。宋德林只求扩大自己队伍的声势，于是就答应了汪提出的条件，把他的“双龙”队编为宋部的 4 支队，任命汪为支队长。汪雅臣身材高大、智勇双全，每次打仗都带头冲锋陷阵，他的第 4 支队战斗力也很强。编入宋部后不久（8 月份），便和宋部一起取得了沙河子战斗的胜利。那一仗他们打死打伤伪军自卫团四、五十人，还活捉了沈青山、靖天这两名伪自卫团长。后来因这两个人民恨极大，把他们枪毙了。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为此专门编了一首歌谣：

宋德林和双龙，
来了就把沙河子攻。
打死老沈，
枪毙老靖。
铲除日本走狗，
人民欢笑喜盈盈。

1933 年，当汪雅臣听到赵尚志在珠河一带组织成立了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后，很受鼓舞和启发。于是他也把五常一带的反日山林队首领们找到一起对他们说：“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要想抗日救国，咱们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人家赵尚志已经在珠河干起来了，咱们也得跟人家学，联合起来打日本子！”汪雅臣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由这些山林队共同组成的“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便成立起来了。由于汪雅臣有 200 多人，汪又很有威望，因而被大家一致推举为首领。

当上了“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首领的汪雅臣在带领队伍与日伪作战的同时，更加注意观察时局的发展了。特别是通过 1934 年到 1935 年这一年的观察，他发现在各种抗日队伍中，只有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斗争

中越打越大，越打越强，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最坚决。他觉得，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他抗日救国的愿望。于是，他开始加紧了与赵尚志的部队间的联系。

1935年春，宋德林干了一件天大的傻事。这位绿林好汉竟与日军用订战表的办法在五常县拉林仓摆开了堂堂之阵来一决雌雄。结果除了汪雅臣的第4支队外，其余都被打垮了、打散了。他自己也跑到山里不敢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汪一面收拢宋的残部，一面派人到珠河去找共产党，要求接受中共的领导。随后他自己亲自带队来到珠河，找到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负责人冯仲云等。汪对冯仲云说，我坚决接受中共的领导，你快把我的部队收编了吧，最好能把我们收编为你们第3军的一部，我跟你们一起抗日到底。

冯仲云等经过认真考虑后答复他说：宋德林的部队已经被日本人打垮了，但五常南山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还不能丢，那里的义勇军还需要有人去收编。这样吧，你还是回到那里去，我们把你的部队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8军，你看怎么样？汪雅臣说：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我相信共产党。另外，能不能给我们派些干部，去指导我们的工作？

冯仲云说：好啊，以后我们会派个得力的干部到你那里去当政治部主任，你看如何？

汪说：我完全同意！

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正式成立，汪雅臣被任命为军长。3月8日，刚从关里治病回来的侯后刚来到第8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但侯后刚在第8军只呆了一个多月就不得不离开了那里。这倒不是汪雅臣他们把他挤走的，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方法有问题。侯这个人有点书生气十足，虽然读了不少马列的书，但却不大会用。他到第8军后就大搞阶级斗争，把义勇军分成阶级，认为上层是剥削阶级，下层是被剥削阶级。对当时山林队里的“分红”制度（又称挑枪片子，即按两支枪顶一个人，进行分配缴来的财物）很看不惯，提出把枪支公有化，取消“四梁八柱”制度。取消“小崽子”（勤务兵）等等。他的这一系列主张遭到了第8军内部中层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这些措施难以实行，最后只好走了。

侯后刚走了，但这并未影响汪雅臣对共产党的信任，党也没有对他们另眼相看，相反却更加关心这支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了。第8军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而且自身纪律也很严（就是在双龙队时期，他们也从来不抢不夺，部队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在山里种大烟卖钱来解决），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因此在与日伪军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部队也不断得到发展。到1936年9月时，已经发展到10个团，1000多人的兵力。9月18日这一天，正在召开的“珠汤联席会议”正式做出决定：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同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正式宣告成立。汪雅臣任军长。

44 明山更名

美丽富饶的东北不但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而且还出金子。位于桦川县南部的腰驼子金矿（现属桦南县）就是一个出金子的地方。日本人来了以后，在那里设立了吉林省依（兰）勃（利）桦（川）金矿局，并建立起了一支有 800 多人的金矿局警备队，大肆掠夺黄金。

1933 年 3 月，金矿局当局不顾金矿坑顶已经出现裂缝，强迫工人下坑采金，结果造成一起事故，两名矿工被砸死，三名矿工受重伤。

在受伤的 3 名矿工里有一个叫祁宝堂的山东人。虽然他年岁不大，但却是个在矿工中颇有威信的人。面对着许多要与日本人拚命的工友，祁宝堂说：别和他们这样硬拼，要从长计议，等伤好了再说。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到 6 月份的时候，祁宝堂的伤就好了，他也开始活动开了。他先是秘密串连了张仲祥、尤成禄、孙继武、赵喜儒、韩忠礼、吕景其等 6 名工人，和他们结为把兄弟，然后他们几个把平时藏起来的金沫子凑在一起卖掉，换回“官贴”（钞票），托人买了一支狗牌撸子（带 5 发子弹）和一支“七星子”手枪（带 7 发子弹），又买了 7 套衣服。最后把这些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进了矿里。

祁宝堂他们几个人把行动时间定在了 6 月下旬的一个中午。当时，矿工们正在吃午饭，矿警队的一个日军班也把枪架起来休息了。孙继武平时就和那帮日本兵搞得挺热乎，这次他又凑到了日军班长三郎的跟前，这三郎以为他又是给他上烟来了呢，却不想孙继武从腰里掏出来的是枪，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一枪打死了。于此同时，祁宝堂也开枪打死了日军的机枪射手，其他几个人一听枪响赶紧动手夺枪，然后杀掉日本兵，很快就将他们全部解决了。共打死日军 7 人，夺得步枪 6 支、手枪两支、子弹 700 多发。

暴动成功后，祁宝堂立即召集矿工们开会，告诉大家说，我们暴动的目的就是为反抗日本子的侵略和压迫，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干。如果谁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干，也应该快点离开这里，以免敌人报复。

祁宝堂讲完后，当即就有 20 多名矿工站了出来，要求和他一起干。祁宝堂带着他们奔向了 40 里外的丈梨树沟，正式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并按当时流行的办法，自己报号为“明山”。后来群众也就称他带的这支队伍为“明山队”了。

“明山队”共分 3 个班，每个班 10 个人。这些人多数都是没什么文化的矿工，提出的行动口号也很简单明了：赶走日寇，推翻大同年，为国为民，宁死不投降。祁宝堂还为“明山队”定下了约法三章：一、老百姓的东西寸草不动；二、没有首领的命令不准私入民宅；三、要帮助贫苦农民，不准打骂好人。祁宝堂治军甚严。有一次他手下的两个兄弟在一个名叫十大户的地方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被他知道后，当即将这两个人给枪毙了。

“明山队”成立后，便以大梨树沟为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游击活动，成了那一带很有名气的一支队伍。土龙山暴动发生以后，祁宝堂立即带队前去参加战斗。由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明山队”被民众救国军编为暂编混成第一旅，祁宝堂任旅长。但没过多久，祁宝堂就发现，民众救国军的首领谢文东抗日并不坚决，部队纪律也不太好，认为再不能和他们呆在一起了，便带着“明山队”脱离了民众救国军单独活动去了。

“明山队”出去单干后，即不断与日军进行战斗，队伍虽然在不断的扩大，但由于引起了日伪的注意，也就不断地遭到敌人的进攻，因此，他们的活动也越来越困难了。

就在“明山队”孤立无援、处境艰难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蓬勃发展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因此，祁宝堂决定要去找共产党的队伍，看看人家是怎么搞得那样有声有色，自己也学一学。而要学就学个最有名的，于是，他想到了珠河的赵尚志和他领导的队伍。

祁宝堂带队进入方正县境内以后，在山边窝子里屯与3军相遇了。一见到3军，祁宝堂立即感到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确和别的队伍不一样。他们作风正派、纪律严明、团结乐观，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从心里感到佩服。他向3军的同志提出要见3军的领导。很快，赵尚志、冯仲云都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讲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抗日救国的道理，还表示欢迎他和“明山队”靠近共产党。这些话祁宝堂越听越觉得对劲，特别是听到冯仲云告诉他说共产党不但要打跑日本鬼子，而且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候，他感到还是共产党人了不起，有气魄、有远见，跟着共产党走肯定会有出路。于是，他连忙表示要和共产党一起干。赵尚志和冯仲云对他的态度表示了赞赏。最后，冯仲云对他说：“你和你的部队就到党领导的武装行列里来了，今后，山林队的绰号就不要叫了，你有志抗日，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奉劝你把名字改为‘致中’吧！”

祁宝堂一听非常高兴，连忙说好。然后，他马上对“明山队”的全体兄弟们宣布说：我今后不再叫“明山”了！我叫祁致中了！

祁宝堂不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祁致中，而且还用从3军那里学来的经验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了初步的改造和整顿，使之成为各抗日义勇军中最好的一支队伍。关于这一情况，中共珠河县委在1935年9月14日的报告中说：

“大罗勒密一带以明山为最好，明山系谢文东旧部，土龙山事件，他是一实际上之领袖。明山本是工人，自见我军后，解散了他原有的部队，新成立起来，一切都学我们，亦有少年连、保安连之组织。队内纪律严格，队员成份均工农，一般都坚决要革命。明山本人年轻勇敢，当然英雄观点是有的，他们坚决要求我军派政治工作人员。现在该队有六七十人，一架轻机枪，一个炮（要送给我们）。我军已编他为第3军方依游击团，如果我们能去一坚强政治工作人员，可使之在依勃一带活动，意义非常重大。”但是，不知什么原因，3军却没有向祁致中的部队派出政治工作人员，也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再加上祁致中与谢文东、李华堂及3军的一些人有矛盾，所以他便带着队伍离开了联合军，又出去单干去了。

祁致中带队伍出去后，日军便把他这支处于孤立无援地位的队伍当成了最好的打击目标，这样，祁致中和他的队伍的处境便很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祁致中想起了一个叫老柳的人。那还是在2月份的时候，祁致中的队伍在大罗勒密一带活动时，截获了一辆从哈尔滨开往佳木斯的长途汽车。当时，车上的一位旅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个人从外表来看像一个商人，一问他，他也说是哈尔滨一家商店里跑外的。既然是跑外的，那身上一定会有不少钱吧，但一搜他的腰包，才搜出几块钱来。祁致中的部下据此认为，这个人肯走不是好人，说不定还是一个日本特务呢。于是便把他带了回去。等把他带回去以后，再对他进行审问时，这个人就不再说他自己是什么跑外的了，而

说自己是给抗日军跑交通的，而且还讲了一些有关抗日军的情况。祁致中的部下们哪里肯信他这些，他们说，这小子太不老实了，看来不打他他是不能说实话了，于是，就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祁致中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到场和那人谈话。老柳见到祁致中后，又对他讲了不少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游击队的情况，还唱了一些抗日的歌曲给祁致中听。祁致中一听，他唱的这些歌和3军的人唱的一样，而且从老柳随身带着的那把大提琴里发现了共产党的文件，才相信他真是共产党的交通员。后来，他和老柳又谈了许多，老柳告诉他，要跟共产党走，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去找党。现在祁致中想起了老柳和老柳对他讲的话，于是便通过关系给中共汤原县委写了封信，要求和县委的领导谈一谈。县委接到这封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县委委员刘忠民代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会见了祁致中。

祁致中是个爽快人，在与刘忠民的会谈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他的三点要求：第一是他本人要入党；第二是要求共产党改编他的部队；第三是要求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往他的部队里派军事、政治干部。

刘忠民说：你这三条要求很好，都是可以考虑的。但这得经过县委批准才行。这样吧，我介绍你去和夏云杰谈一谈吧。祁致中说：行！

夏云杰见到祁致中后，与他谈了很长时间，觉得祁这个人不错，便对他说：你要入党是可以的，但你还得多了解点有关党的知识。我们这里正好要办一个党训班，我看你就来参加吧！祁致中说：行！

半个月的党训班结束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批准了祁致中的入党请求，并派夏云杰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祁致中的第一个要求得到满足后，便问县委什么时候才能满足那两个要求。夏云杰答复他说：那两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马上就从汤原游击总队派出金正国等3名党员干部，到你那里去帮助你建立党组织和开展有关政治工作；而改编队伍的问题嘛，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但你放心，我们会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请上级来帮助你解决。你看好不好？

祁致中说：我现在是党员了，我听党的安排。不过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这支部队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夏云杰说：这个问题县委也考虑过了，认为你们目前还是先回到松花江南活动为好。你到那里除了打仗以外，还应该多注意加强后方建设。以后有事可以去找我们党的勃利县委，让他们帮助你。

祁致中记下了夏云杰的话，然后便带着部队回到江南去了。1936年1月28日，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立后，祁致中的部队改称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不久，他们又和民众救国军第1团、东北民众军准备军等几股抗日山林队一起被正式改编为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独立师下辖三个旅。祁致中任师长、从汤原来的金正国任指导部主任，中共勃利县委派来的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

按照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关于建立后方基地的指示，祁致中回到江南后便着手创立起了著名的七星砬子兵工厂。这可是一家很像样子的兵工厂，全厂共有三个车间——一车间造枪，二车间生产弹药，三车间负责修理。兵工厂里有一个小型水利发电站，有机床，更有一帮从沈阳原奉天兵工厂里出来的专家。他们不但研制出了“匣撸子”（一种带机头的撸子）、手提式自动冲锋枪、直把机关枪等轻武器，而且还试制出了一批迫击炮，装备部队使用。据说，当第一批“匣撸子”生产出来以后，祁致中亲自操枪射击，结果枪枪

命中靶心，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和战士们的抗日情绪。独立师是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联的一支部队，部队里就当然要有党的政治工作了。但在独立师里做政治工作的人员的职务名称却与抗联其他各军不一样，这是祁致中自己的发明。独立师师一级的政工干部叫“政治部主任”、旅一级的叫“政委”，团一级的叫“政治委员”、营一级的叫“政治指导官”、连一级的则和我们今天一样，叫“政治指导员”。从总的来看，独立师内的政治工作不是很强，这主要是由于党在部队里的领导还不是十分有力，大家思想也不统一，所以虽然独立师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不少胜利，但独立师内部以及其与抗联其他各军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明显地突出表现出来了。这样到1937年初的时候，就开始不断有人向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反映说，独立师已经很危险啦！祁致中也快成反革命啦！看看，连从3军派去的政治部主任在那里都呆不下去啦……

省委一听，这还了得？就赶快派张寿钱到独立师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张寿钱一到独立师就找祁致中谈话，而且一谈就是十天！要说张寿钱这个人还真是个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大能人，他通过与祁致中那十天长谈，不但消除了祁本人思想里存在的一些疑念，再一次为他指明了奋斗的方向，而且帮助祁将队内的一些坏分子进行了清洗又帮助他制定了一个要在半个月发展30名党员的计划，还重新任命了独立师内的主要政工干部。最后，他给省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

“独立师目前的表现决不像个别同志报告的那样严重，好像朝不保夕，快反革命的样子。恰相反，更初步走向忠实于民族革命战争，其他详细情形，仍由当面讨论之。独立师要求与省委及特委直接发生组织关系，并经常派交员，并要派专做党工作的同志，到独立师担负党务特派员，最好是派政治主任去。夏季祁同志将到省讨论一切，独立师捐助给北满党的经费存在我这里……”独立师的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后，打起鬼子来就更来劲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们的胜仗一个接着一个，队伍也一天一天地在发展。就连富锦县有名的伪警察署长大地主李景荫（李家特别富裕，有地上百垧，人30多口，机枪、步枪加一起枪支弹药七八十支）也参加了独立师，被祁致中任命为师参谋长。到1937年9月的时候，独立师已经发展到了1500多人，各级干部也已基本配齐了。这样，将其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的条件也就成熟了。1937年10月，根据北满联军总司令部的指示，独立师正式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第11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军部下辖一个师（师长李景荫）三个旅，还有一个随营学校。抗联第11军的建成，标志着以中共为中心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东北的老百姓为此唱道：

“十大联军”十万人，
抗日救国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
铁骑纵横扫妖气。
但愿民族获解放，
白山黑水庆升平！

第十四章

45 狗急跳墙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如是说，那么实际上做得又怎样呢？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写道：“自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以来，特别是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之后，东北抗联各军在辽、吉、黑广阔原野展开了大规模游击活动，打击日伪‘讨伐队’，破坏敌人交通与通讯，袭击日伪军事据点，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1月至1937年12月，抗日联军共击毙伤俘日伪军7380人，其中毙伤日军近3000人。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严重地威胁了敌人的后方的安全，牵制了10余万日军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

既如此，则日本人当然就要想尽办法来对付东北抗联了。急红了眼的日本人为此专门制定了《三年肃正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日伪当局调集了10多万兵力，从1937年末开始，对活跃在松花江下游一带和东满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长期的、疯狂的、空前的“大讨伐”。这次“大讨伐”不但时间较以往长，兵力比以前多，而且更使出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损招”。

在军事上，他们采用“蓖梳式”、“蹂躏式”和堵击、长追、突袭等战术，由南到北，再从北向南反复不断地进行“讨伐”；在经济上，他们采取了十分严厉的封锁措施，制定了“经济犯条例”，实行“粮食统制”和日用品的配给制；在政治上，他们大力开展“思想战”、“宣传战”，派出“宣抚班”、“工作班”，利用金钱、美女、谣言瓦解抗联队伍。

日本人的《三年肃正计划》称：“共匪活动的基础在于贫困饥饿的农民，共匪正在通过农民的支持和参加其活动以扩大势力”，“这些农民主要是组织农民委员会、反日会等群众团体，作为共匪活动的人力、物力基础”，“共匪仍然有顽强的抵抗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如果只是采用以上几种办法，那还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切断抗联队伍与农民们的联系。这便有了臭名昭著的“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俗称“归大屯”。这个词在今天听起来已经是有点费解了，下面摘录的是日本人有关“集团部落”的文件中的有关内容，希望它能够有助于读者对于这个陌生的名词的理解。“为了确立治安，使匪民分离，必须赋予良民以自卫能力，使匪贼不能涂碳和寄生于良民。满洲僻地之农民，大部分是二三家或五六家的小部落，散居在偏僻的地区和山野间，形成了与匪共居的状态。即使较为接近于铁路与城镇的平原地区，也存在着没有集体防卫力量和统治力量的几十户不统一的零散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得不到现代国民的生活与文明的教育，而且也为匪团提供了自由活动的余地。为了除掉这种不利，就要建设集团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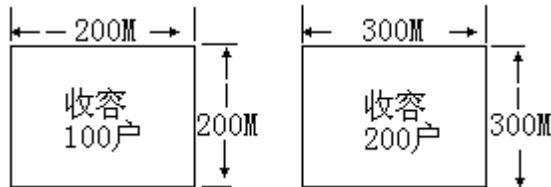
“……因所有的住民都缺乏远大的眼光，尤其有许多人不愿抛弃已经住惯的故宅而不乐于搬到新的部落中去，如果依照个人的要求，那就永远不能实现。因此，认为必要时，将不管如何，必须坚决地进行；但须避免妨害播

种时期。”

一个集团部落的户数及其面积：

(1) 户数：以 80 户至 100 户最为适当（收容人员 400~500），为此，将附近的散在房屋须完全造成无人区。这样在警戒和管制上都能有利。如六、七十户以下的部落，则自卫力量不够充足；若在 200 户以上的部落，于统制上也有困难。

(2) 面积：从已建设的部落来看，按下列标准最为合适。



建设部落的位置及建设次序：

(1) 建设位置

1. 匪贼时常出没或者是物资供应地点等警备要线；2. 经济资源丰富的地点；

3. 易于警戒及自卫的地点；

4. 易于供水，且比较干燥的地点。(2) 建设次序

建设部落的次序：首先在部落外围把铁丝网、土墙、水沟等建设起来。先建立对外防御设备，使部落的住民安心之后，再在内建设其家屋，兹举一例如下：

1. 铁丝网、土墙及炮台等设备；

2. 建设共同建筑物（部落办公室）及临时房子；3. 建设家屋；

4. 水井设备及其他附属建筑物。

(五) 经费

集团部落之各种工程，是以部落住民的义务劳动来进行的，除主要防护设备及材料费外，其他经费一律不付。

(六) 警备要领

为防共匪在建设开始时的破坏，故要在日满军讨伐共匪的同时进行建设，同时在建设中须特别警备，使部落住民能安定；特别是在匪徒严重的地方，需要在日军掩护下进行建设。在集团部落完全建成后，多数入屯者安家后，即依保甲法组织自卫团，使他们担当警备，此外根据必要再布置治安队或者以满军的一部分来加强警备；如匪情特别险恶时，可叫皇军住屯。并且要完成完备的交通和通信设备，以便在发现匪情时，能及时求得满军的迅速救援。

“总而言之，在建设集团部落时，首先要熟悉匪情及地形与经济资源，并要十分注意住屋的要求而选定其位置，以及根据耕地面积的广狭决定其户数。另外，要根据汇集建设资材的难易，来决定部落建设经费的开支。应在军官宪警指导下，尽量依靠部落住民的自发性来建设，特别在治安不良的地区，作为警备据点而建设集团部落时，需要在皇军直接掩护下进行建设。”被赶进“集团部落”的老百姓们，实际上就处于日伪的严密监视之下了。日本人在里面安插了不少警察、特务，时刻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在“集团部

落”的周围，还有日本的武装开拓团对“部落”进行监视。谁要是有什么事需要进出“集团部落”，那得有他们开的证明书，就连农民们种地也不能走得出4公里以外。为此，东北老百姓的民谣唱道：

爷爷不吃饭，
奶奶不梳头。
鬼子要归屯，
百姓日夜愁。
愁得坐不稳，
愁得站不安。
只盼抗联快点来，
打跑鬼子保家园。

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盼抗联，可是抗联此时比他们的处境还难。原因是简单的：抗联与老百姓是鱼水关系，日本人把“水”给撤了，“鱼”的日子自然也就不好过了。而日本人在尝到了“集团部落”的甜头之后，便大力推行起来。据《满洲国警察史》记载，1936年全东北共有“集团部落”3361个，而到了1938年时，竟达到了12565个！

“集团部落”以及其他几项措施的并用，便使得抗联战士们被迫走进了寒冷的冬季。

46 岔沟突围

1938年初，抗联第1路军的游击区不断缩小，部队损失很大。总司令杨靖宇为了与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共同商讨游击战争的新策略以及开辟新游击区的问题，决定带领军部和直属部队离开桓仁，向辑安老岭地区转移。2月中旬，他们便进入了山岳重叠的老岭地区。当时，日伪当局正在加紧修建通辑铁路——一条专为掠夺东北物资和“围剿”抗联而修建的重要通道。

一进入老岭地区后，杨靖宇便决定要搞他一家伙。目标就是正在紧张施工中的老岭隧道工程。

老岭隧道地处通化、辑安两县的交界处，是通辑铁路上最长的隧道。这里四面环山，又有日本人的重兵守卫，实为一易守难攻之地。

1938年3月13日，杨靖宇率500余名战士从辑安以北的天桥沟出发，第二天拂晓来到了距老岭隧道较近的十一道沟顶。通过侦察发现，在施工现场驻守着日军角田部队和伪满铁警备队，他们每50米便设一族帐篷。白天，对过往行人一律查，稍有可疑即行逮捕，夜晚则通宵值勤，防守十分严密。所以杨靖宇带着部队在十一道沟足足蹲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出击的机会。有的战士急了，找到杨靖宇，要求来个硬碰硬，打掉守敌。杨靖宇虽然心里也很急，但他还是说服战士们要耐心等待时机，告诉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出奇才能制胜。一直等到天黑下来以后，杨靖宇才带着队伍出了十一道沟。他将一部分部队埋伏在沟门，指挥另一部分队伍向老岭隧道工地发起了猛攻。受到攻击的敌人立即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和反扑，而杨靖宇的部队则顺势向沟外撤去。敌人一见抗联部队向后撤去，鼓足了劲向前猛追，等追进了十一道沟里的时候才发现中了杨靖宇的埋伏，但这时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杨靖宇这次成功的袭击，不但使敌人受到了20万日元的经济损失和被迫停工两个月（敌称其为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处于困难时期的抗日军民。此后，杨靖宇又带领战士们时而攻击敌警察署（所），时而捣毁“集团部落”，把那里变成了伪通化省的“第一癌肿地带”。

就在杨靖宇在老岭开辟新游击区的同时，魏拯民正带领第2军活跃于蒙江、金川一带。4月份，他带队进入通化，5月时来到辑安老岭山区五道沟，与杨靖宇会师。

1938年5月11日，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1路军总部在五道沟密营召开军政干部联席会议。是为第一次老岭会议。第一次老岭会议主要研究了今后游击活动的方向问题，所做出的决定除了前文说到的第1军向辽西地区远征外，还决定：第2军之第4师和第6师继续在通化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第5师在绥宁地区活动，并负责与吉东和北满的抗联部队联系。在人事上，鉴于王德泰已经牺牲，决定由魏拯民兼任第1路军副总司令。第一次老岭会议结束后，第1路军的游击活动掀起了一个高潮：

——6月12日，杨靖宇亲自指挥了蚊子沟战斗，一举消灭了号称“满洲剿匪之花”、并且自吹“包打杨靖宇”的伪军索旅的一个营。

6月19日，第1军教导团和第2师分兵三路，同时进攻通辑铁路土口子隧道、第十一、第十二老岭河桥梁工地和阳岔工程分区，使这一天变成了敌人在“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成的最悲惨的日子”。

——6月24日，杨靖宇再袭土口子，解放朝鲜劳工250多人，还使抗联

队伍里走进了一个名叫福间一夫的日本籍战士。——6月下旬，金日成任师长的第2军第6师攻克抚松县南岗伪军第3团炮台，歼敌80人……

1938年7月，正当抗联第1路军各部认真贯彻落实第一次老岭会议精神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抗联第1军第1师师长程斌接受了由本年2月时投敌的1军参谋长安光勋带来的敌“长岛工作班”的劝降书，投敌叛变了！

这件事对于抗联第1路军来说，可是非同小可。因为由于程斌的叛变，第1师已经基本上瓦解了，而且整个第1路军的军事计划也被暴露了。这就逼得杨靖宇他们必须调整战略部署了。于是，便有了第二次老岭会议。

参加第二次老岭会议的杨靖宇、魏拯民等人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研究制定了第一路军的游击活动计划，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其一是考虑到由于第1军第1师在本溪、桓仁、宽甸一带的游击区已经大部丧失，辑安游击区失去了西南的屏障，成了敌人在通化地区的讨伐重点，因此决定改变原来的部署，取消第1军再一次进行西征的计划，除将一小部分部队在老岭山区进行游击，牵制敌人以外，主力部队向金川县河里地区转移；

其二是撤销原东北抗联第1军和第2军的番号，在第一路军总司令部下，部队编成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整编后，各部队分区作战。

第二次老岭会议结束后，杨靖宇、魏拯民即开始着手整编部队。那时要整编部队可不像现在，只要下一个文件、发一个指示，大家照章办事就行了。那时许多事必须要杨靖宇等亲自出面才能办成。由于是一边打仗一边进行，所以这一工作一直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

最先进行整编的是原第1、2军的教导团。这两团合在一起后成立了警卫旅，旅长方振声、政委韩仁和，全旅共有500人。第1方面军是1938年8月在金川县黑瞎子沟在第1军第2师的基础上成立的。曹亚范任指挥，伊俊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约250人。

第2方面军是1938年11月在蒙江县南排子由原第2军第6师整编而成。该师师长金日成任指挥，吕伯歧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约350人。

第3方面军成立得较晚，它是1939年9月末才将第2军第4、第5师合编而成立的。指挥陈翰章，副指挥侯国忠。全军约300多人。

在这段时间里，杨靖宇及其总司令部带着警卫旅活动于金川、蒙江、辑安一带，继续与前来围攻的敌人作战。在艰险的环境中，我们这位“森林之王”充分显示出了其指挥游击战争的高超艺术，带领其部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敌人设下的重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创造出了在抗联历史上熠熠生辉的著名战例——岔沟突围战。

1938年9月，刚刚在通辑公路上的长岗干净彻底地消灭了“满洲剿匪之花”索旅的杨靖宇率部向辑安天桥、老土顶方向转移，然后又从那里经通化、临江县境向金川河里山区开去。

10月17日午夜，他们来到了浑江边。部队要马上过江，可是却找不到船。怎么办？杨靖宇把匣枪高高举过头顶，带头走下了冰寒彻骨的江中，战士们立即紧随其后。江心水深浪急，男同志们便架起了个子小的女同志。杨靖宇说：“我人高，个大，条件好，来，我一人架一个。”

过了浑江后，没走出多远，便来到了岔沟。岔沟，地如其名，是个沟连沟、山连山的大山沟。岔沟的东、西、北三面都是大山，沟里有一条小溪流向南面沟口外的浑江。那里偏僻荒凉、人迹稀疏，仅有的几户人家在杨靖宇

他们到来的时候也都锁门闭户——主人们都起早出去收庄稼去了。

天亮后，日本人的飞机来了，飞机飞得很低，低得可以看见上面的“红膏药”。那飞机转了一阵，撒下一把传单，又飞走了。战士们捡来传单，见上面写道：“匪首杨靖宇，我们已摆下铜墙铁壁阵，死活两条路任你选。你若能归顺，封你做东边道都督……”杨靖宇笑道：“啊，东边道都督，好大的官呀！不过要是东边道归了咱们，那他们小日本不是该没道滚蛋了吗！？”通过飞机侦察，敌人掌握了杨靖宇部的行踪，他们马上调来了 1500 多日伪军，将杨靖宇那支只有 400 多人的部队团团围住了。杨靖宇发现这一征候后，当即命令部队转移。杨靖宇当年的警卫员黄生发讲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

“队伍刚转移不远，就和敌人碰上了，两下来个碰头，接上了火。既然碰上了头，接上了火，转移不了，就得抢占有利地势，所以司令一面沉着地命令 3 团作掩护，一面带领大队抢占岔沟制高点。战斗异常激烈，从早上一直进行到下午，我们才抢上了岔沟制高点。敌军如黑锅上的蚂蚁披山盖岭向上几次冲锋，都为我军击溃。敌军官兵死伤无数。我们判断，正面攻击的敌人，是程斌队伍。这些士兵，都是受到相当时间的抗日爱国教育的，追击我们，都是因为枪炮所迫，不得而为。所以司令一面调集 29 挺机枪，组成机枪队，以加强火力；一面又从少年铁血队选出 20 多个会唱歌的队员，组成宣传队，爬在石砬子上喊口号，唱抗日救国歌。歌声四面回响，悲壮激昂。程斌队终于组织不起攻势了。在这次战斗中，3 团是我们占领阵地的最高点，3 团阵地如果失守，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敌人对 3 团的阵地攻击也特别猛烈，所以司令对 3 团也特别关心。这天我一共去 3 团传达了 13 次坚守阵地的命令，3 团长也 13 次地表示‘坚决守住阵地，人在阵地在’。……“敌人发动多次冲锋，全被击败，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团团地把山脚都包围起来。夜降临了，远远近近不时传来几声零散的枪声。激战后的战场，在墨黑的夜幕下，显得格外寂静和神秘。敌军满山遍野燃起火堆取暖，从火堆的层次推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十来层……”

“这天夜里，司令召集了师团干部会议。他说：‘今天的战斗，我们打得很好，敌人伤亡很大，但由于敌强我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应该作长久之计，必须组织突围。’说着司令铺开了地图，‘往什么方向突呢？往东走，不行，敌人已经加大了兵力。从地图上看，西北地势很险恶，突出去后还必须爬上一个大荒草甸子，越过笔陡的大石砬子，从敌人的火堆上也可以判断出来，西北兵力较弱，我们应该使敌人出其不意，从西北打开缺口，突出重围，然后再绕个弯，向东去联络 4 师。’经过会议充分讨论，一致同意杨司令提出的作战方案。接着进行突围的准备工作。凡是一时用不上的东西，全部都埋起来，轻装突围。还决定由特务连作向导。特务连连长会说日本话。到夜里 11 点多钟，我们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毕，天也黑滚滚的，正是突围的好时机。我们便一队接着一队，一个跟着一个地往西北移动。离敌人越来越近了，在暗中连敌人坐在火堆旁说话也听得清清楚楚了，大家憋一口气，全军没一点声息，只能听到秋风吹落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前头部队已到了敌人眼前，可敌人还低头烤火呢，有的还抱着枪睡着了，我心里暗暗好笑。司令命令大家先停下来，由特务连先上去。敌人一看有人上来了，先开了几枪，枪一响，特务连连长就喊起日本话来：‘他妈的！打什么？都是自己人。’部分朝鲜族战士也喊起日本话，一时把敌人弄糊涂了，枪也不打了，越走越靠近，两个敌人刚一凑上来看，还没等他们转过脸，连长叭叭就是两枪，打

死一个，跑了一个。那个人一路跑一路喊：‘有红军，有……有……有红军……’他这一喊，敌人炸了，里里外外就乱了起来了，有的连枪还没摸着，就被打死了，有些拿起枪不分青红皂白，乒乒乓乓就乱打开了。乘着这个劲，杨司令领着我们一边打一边往外冲，等我们全部队伍冲出重围，都走老远了，还听到敌人乒乒乓乓乱打，听说一直打到第二天大天亮，才知道是自己打了自己……”

岔沟突围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老百姓用一个美丽的传说描述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这次壮举：那杨司令可不是一般人，那简直就是神仙一般。他有一个小红灯，那可是个宝贝。就说那天晚上吧，鬼子在岔沟那疙瘩把杨司令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住了，本以为能抓住杨司令和红军呢。可是，他们没想到杨司令这时候把他那个小红灯拿出来了，这个小红灯一亮起来的时候，天上就出现一道长虹。还没等鬼子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红军就骑在长虹上飞出去了。那长虹飞得可快了，连日本子的飞机都追不上影……

47 英雄儿女

早在1937年初，中共吉东党组织的负责人在依兰县牡丹江岸四道河子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吉东省委。吉东省委成立后，为了统一吉东地区的抗日行动，做出了将驻在北起松花江右岸，西至哈长线东侧，东到乌苏里江畔这一广大地区内的抗联第4、第5、第7、第8、第10军联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的决定。但是这一决定直到年底省委在饶河召开下江特委扩大会议的时候，才得到贯彻落实。周保中、崔石泉分别出任第2路军的总司令和参谋长。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成立了一个以大汉奸于琛征为总司令、北部大佐为顾问的“讨伐军”，开始了对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大规模“讨伐”。这样，第2路军一成立就面临着能否冲破敌人的这次大规模“讨伐”的严峻考验。

从1938年开始，虽然第2路军在取得了一些反“讨伐”作战的胜利，但由于敌人越来越疯狂的进攻和越来越严密的封锁，使得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2路军的第4军和第5军一部向西部的五常、舒兰一带进行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

这次远征一开始就很不顺利。远征部队刚一集结就遭到了敌人的阻击，自7月初部队出发后又受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一路苦战，不久便处于“内无给养、外有追兵”的困难境地。就在远征部队处于极端困难时刻，发生了一系列的叛变事件：

7月30日，负责远征军军事政治领导责任的中共吉东省委书记、第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借巡岗查哨之机与他的随从副官一起携款叛逃；

9月份，第4军远征部队在五常冲河地区遭敌包围。在部队被打散、64人被俘的情况下，第4军第1师师长曲成山向敌人举起了双手；

11月20日，第4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与7名队员在珠河县一面坡西南错草顶子宿营，半夜时分，三名叛徒偷出李延平的手枪，开枪打死了李延平，打伤王光宇后逃走。

艰难困苦是冶炼英雄的熔炉。此次远征过程中，虽然叛徒迭出，但更涌现了一批惊天动地的勇士。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八女投江”便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1938年10月，抗联第5军第1师师长关书范带着100多名参加西征的指战员折返远征出发地刁翎，以寻找第5军军部。途中，他们露宿在林口县乌斯浑河西岸柞木岗山下老道沟草甸子柳毛丛子里。由于当地的汉奸告密，日本守备队和伪军连夜向他们袭来。

拂晓的时候，关书范组织部队收拾好行装准备到附近的渡口去渡河。但是，当他们来到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野渡无人亦无舟。“金参谋，你先去试探一下，看看水有多深！”关书范向水性较好的金石峰命令道。

金石峰向对岸游去。关书范又对妇女团的人说道：“你们妇女团的人准备好，呆会儿你们跟金参谋先过河。”

这里说的妇女团，原先有30多人，可是到现在只有指导员冷云等8个人了。听了师长的命令后，她们便向河边走去。可就在她们准备下河的时候，敌人从后面打过来了！

敌人一来，关书范立即指挥部队一边还击，一边向柞木岗山里退去。而冷云等8人则被敌人的火力隔在了河边。

“姐妹们，打呀！好让大部队撤走！”冷云一边喊着，一边带头向敌人猛烈射击。他们的火力果然起到了牵制作用，大部队很快就撤进了柞木岗的山里。

进山后，他们回过头来一看，那8名女战士还据守在河边向敌人射击。关书范立即命令部队返回头来，去接应她们。但是，由于敌人太多了，他们冲了几次都没能冲过去，部队又增加了不少伤亡。在这种情况下，关书范只好下令让部队又撤回了山里。大部队一撤，敌人立即集中力量来对付河边的8个女战士。他们一边高叫着“活捉这几个娘们！”，一边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冷云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不断有敌人被打倒。但是，这毕竟是难以持久的。当子弹打光了的时候，她们面前的敌人便开始放心大胆地往前冲了，他们满以为这下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抓到她们了。可也就在这时候，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那8个女战士正互相背扶着毅然决然地走向浪花翻滚的乌斯浑河……

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们都记住她们的名字吧：冷云、杨贵珍、胡秀芝、安顺福、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说完了西征的部队，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下留守部队的事。1938年春，第2路军主力西征出发后，在吉东地区坚持斗争的还有第4军留守处（留守处主任为第4军第2师4团政治部主任彭施鲁）、第5军3师及第7、第8军等部队。这些部队在周保中的指挥下，为保卫后方基地，策应主力西征，打破敌人的“讨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著名的十二烈士山战斗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

1938年3月18日，第5军第3师8团一连的14名战士在连长李海峰的带领下，正准备和总指挥部派来的交通副官张凤春一起到蓝棒山的李炮营集中，当他们行至宝清县石灰窑南沟的时候，突然与200多名日伪军和100多名伪兴安军骑兵遭遇了。伪兴安军是日本人在伪兴安省专门训练的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个个善于骑射，人人凶狠残暴，烧杀成性，战斗力很强。为了迅速剿灭松花江下游的抗联队伍，他们特地将伪兴安军的3个团调往富锦、宝清一带。

此时，李海峰他们可以继续前行进到山里去，那样他们自己可能安全些，但抗联密营便可能会被敌人发现。李海峰没有进山，而是带领战士们抢占了头道卡子附近的小孤山，与将近20倍于己而且装备精良的敌人进行了长达一天的鏖战。

稍具军事常识的人就可以想象出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会是多么惨烈。但想象毕竟是虚的，还是让我们来听一下在这场战斗中幸存下来的张凤春说的吧：

“李连长带领小队抢占了前方一座小孤山沉着应战，我们利用小孤山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与400多敌人鏖战一天，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打得日伪军人仰马翻。在面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活着的人用白雪匆匆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后继续战斗。李海峰连长发挥了‘射手之王’的威力，由杨德财给他押子弹，三支连珠枪轮着用，一枪一枪地打，枪响人倒。后来他双腿打断了，就由我和杨德财两人抬着他转移阵地继续战斗，……班路遗指导员和张全富都受了重伤，他两个共同抵挡20多个日本兵，结果班指导员光

荣牺牲，张全富拉响了最后两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战士小王黑子是依兰人，牺牲时一条腿跪在深雪里，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呢！他只有 18 岁……”

日本人见强攻不下之后，便在东山上架起了迫击炮，向小孤山猛烈轰击。临近傍晚的时候，李海峰命令张凤春和另外 3 个人转移，他自己在掩护张凤春等突围之后，和留下来的战士们把枪摔碎，把零件抛进雪谷中。当敌人再次冲上来时，他们痛骂不止，最终以身殉国。

此一战，李海峰等共击毙击伤日伪军 100 多人，攻上山顶后的敌人极为恐慌，只拖走了 30 多具同伴的尸体便匆匆离开了那里。

不久，第 2 路军总部为李海峰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后任第 5 军政治委员、中共道南特委书记的季青饱蘸浓墨，写下了一篇“十二烈士山记”，在这篇记后，有诗赞道：

蓝棒山顶云雾重，
宝石河边雪花飞。
寇贼凶焰犹未尽，
十二烈士陷重围。
神枪纵横扫射处，
倭奴蒙狗血肉堆。
竟日鏖战惊天地，
胆壮气豪动鬼神。
不惜捐躯为革命，
但愿失土早回归，
他年民族全解放，
指点沙场吊忠魂。

48 向西远征

自从进入 1938 年以后，随着日伪“三江省大讨伐”的开始，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各军的处境也开始急剧恶化起来。令人痛心、叫人气愤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2 月，第 11 军七星砬子兵工厂遭敌毒气袭击，胡志刚等 50 多名工人、战士牺牲。

——3 月，第 3 军之第 3、第 4 师设在依兰东部山区的密营遭到严重破坏，所储存的给养全部被烧毁；此后不久，第 2 师师长关化新牺牲。

——4 月，第 6 军第 1 师师长马德山在萝北南岗的一次伏击战中牺牲。

——5 月，曾经拥有 10 个师的第 3 军已经减员过半，不得不缩编为 4 个师；第 9 军团长第 2 师团长李青林、张德金先后叛变，第 2 师师长王振祥动摇……

形势越来越严峻，人们希望党能拿出个好办法来。1938 年 5、6 月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连续召开了第 7、第 8 两次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组织部长魏长魁、宣传部长冯仲云、执行委员李熙山（许享植）。这两次会议在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为了冲破敌人的这个“大讨伐”，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组织北满抗联第 3、第 6、第 9、第 11 军的主力部队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按照省常委会议的决定，这次向西远征有第 3、第 6、第 9、第 11 军的 800 多人参加。他们将在中共北满省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张寿钱、金策、魏长魁、冯治纲具体组织下分三批进行远征。这是一次充满艰辛与危险的远征。

省常委会开完不久，新任第 9 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便到依东地区寻找第 9 军部队，准备带领第一批部队进行远征。可他一到那里就先碰了一个“大钉子”——第 9 军军长李华堂有意躲着他，并极力阻挠第 1 师参加远征。这样，魏长魁只好带着第 2 师的第 4、第 5 团共 100 多人和第 3 军的常有钧部一起踏上程途。魏长魁带着部队从洪洼出发时，只带了半个月的给养，再加上不断遭到敌人的袭击，所以没多久就陷入了困境。当他们过了呼兰河，向庆城、铁力前进时，在苇子沟遭到敌人的袭击。魏长魁因为在后面照顾病号，不幸被流弹击中，负了重伤。在双腿不能行走，身边又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艰难地向前爬了好几里路。眼见着队伍越走越远了，归队已经无望，魏长魁为了不泄露党的机密，不为敌人所俘。他在烧毁文件后，毅然自刎殉国。魏长魁牺牲后，常有钧、郭铁坚带着部队继续远征。6 月底，他们在庆城九道岗附近再一次遭敌人包围。突围后，常与郭失去联系。第 9 军第 4 团的王团长借口他不属于第 3 军系统而与常有钧部分开，跑走当胡子去了。不久，常有钧被叛徒杀害。郭铁坚率第 9 军第 5 团 60 多名战士从九道岗突围后继续前进。当行至张家湾河附近时，因河水暴涨被围在山上，一连 20 多天断炊，只能靠野菜、树皮充饥。洪水退后，郭带队退到山里。就在部队面临着饥饿、疾病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名叫偏脸子张的地方遇上了一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张寡妇。这张寡妇丈夫死后带着两个孩子在山边起早贪黑地种了两垧苞米，这是她全家的活命粮。但当她知道抗联战士们因为断炊而无法前行时，便主动将这两垧他的苞米送给了他们，使得部队得以脱离险境，继续西征。

11 月份，当郭铁坚带队到达海伦县八道林子的时候，看着身边仅有的那

20 来个瘦弱不堪的战士，这位人如其名的汉子禁不住泪流满面。

第二批远征部队有两支：一支是由第 6 军参谋长冯治纲和第 2 师师长张传福率领的军部教导队、第 2 师第 11 团、第 1 师第 6 团共 200 人；一支是由第 6 军政治部主任金策和第 6 师师长王明贵、第 3 军第 3 师政治部主任侯后刚率领的第 3 军第 3 师及第 6 军第 3 师第 8 团、第 2 师第 12 团等 300 多人。

8 月上旬，冯治纲、张传福率第二批远征部队从萝北县梧桐河畔老等山出发。经一个多月艰苦行军，到达海林东部的道林子。行军途中，第 2 师师长张传福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

8 月中旬，金策和王明贵率队从富锦、宝清过松花江在萝北集结完毕。

“9 月 6 日，三江平原阴云密布，细雨连绵。抗联 3、6 军 300 余名西征部队，斗志昂扬地从老等山出发了。”王明贵接着回忆道，“我们为了避开敌人，抢渡梧桐河，走进了沼泽地。战士们随时都有陷进泥潭丧生的危险。途中天气骤然变化，滂沱大雨不停地打在战士们的征衣上。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变成了一片汪洋，天水相连给我们行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路上不能避风雨，大家只有咬紧牙关，互相搀扶，怀着必胜的信念，靠指南针判断方向，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每人身上携带的 4 穗苞米全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我们。……黄昏，幸亏走到一片疙瘩林子，有了露营之地。一部分体弱有病的男同志和几名女同志，住在仅有的两架帐篷里，绝大多数干部、战士身上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围在篝火旁进入梦乡。我睡得很晚，考虑部队已经走得很疲劳，又没有粮食充饥，怎样鼓励大家再克服两天困难，尽快走出这片非常危险的沼泽地。”9 月 7 日，萝北县境内大小河流河水猛涨，沼泽地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汪洋湖泊，6 军的步兵队伍趟着没膝的深水行进更加困难。3 军 3 师的 3 名战士和 6 军 3 师的 4 名战士倒下了。这些英雄的战士被大水夺走了生命……，中午到了梧桐河东岸，河水水流湍急，给我们渡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时，牛和马成了我们泅渡的工具，有的三四个战士骑在马背上，有的战士拽着牛尾巴泅渡过了河。这种渡河方法引起了战士们一阵笑声，真是苦中有乐啊！……

“9 月 8 日，我们这支西征队伍继续在洪水淹没的沼泽地里行军……，这一天，有六、七名年老体弱的同志，尽管他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支撑着饥饿的身躯坚持西征，但在半路上，他们的还是停止了跳动。战友们不忍心丢下战友的遗体，从 10 里、20 里远的沼泽地里趟着水抬出来埋葬在高地上，然后默哀向死难的战友告别。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徐紫英同志用尽全身气力，背着一名生命垂危的女同志在沼泽地里走了 20 多里，终于把她背出来了……

“9 月 13 日，我们的队伍进入了原始森林地区，步兵、骑兵行军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步兵负荷重，困难更大些，3 军 3 师侯后刚主任主动提出骑兵在后，掩护 6 军前进。……为了减少途中疾病的发生，我们向各连队提出 4 点要求：1. 充分利用休息时间拔火烤干鞋袜，防止脚烂；2. 夜间宿营要拔火，防止受寒风；3. 路上多采磨菇野菜，和牛头、牛蹄、牛皮、肠肚交替吃，以节省粮食；4. 各连指挥员充分利用休息时间表扬好人好事，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王明贵他们终于在 10 月 8 日到了海伦县白马石与 6 军西征部队会师了。

第三批远征部队是由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张寿钱和第 11 军

第1师师长李景荫率领第6军军部教导队和第11军第1师共100多人组成的。时任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秘书的张中孚用日记为我们录下了这批队伍远征的实况：

10月21日

上午8点全体在王把头密营集合，准备出发。出发前，由总政治部主任宣布有关行军纪律上的几项条款。他的讲话，略谓：各位同志，今天是我们西征开始的第一天，我看到很多同志都表现出十分泼辣和勇敢的作风。今天我要讲的话，希望各位充分注意听取，切实加以遵守。首先第一点要讲的是，各位必须了解此次西征将会有光辉的成绩和历史意义。它是东北反日战线新的大发展的起点，是为了争取发展与扩大民族革命运动的胜利事业。其次，有关行军纪律的几项条款，希望各位必须无遗漏地牢牢记住并切实遵守。再次，行军时，一切军事计划和命令的行使由第11师李师长担负全部责任，如若出现不遵守纪律者，或发生其他小问题，统由李师长处理。六军的耿同志（笔者注：指第6军教导队副官耿殿君）任临时参谋长。部队行军分前哨与后卫，前哨负责人是11军1师的隋团长，由他率15名担负起这一任务，在一天之内遇有事故发生可当场处理，然后报告。后卫也以15名组成一小队，由司令部教导队的一分队担任。给养的分配、马匹的管理由孙军需和王正茂负责。行军的日记由总司令部的张秘书担任。行军的卫生由王医官担任。10月28日

天明出发，先沿河前进十数里，之后上岸。冰面有寸厚积雪，不泞不滑正好行军，故速度大增。午后2时过后又转入河道行军，一师的孙军需不慎掉进冰裂缝中，全身像个落汤鸡冻昏了。遂令抬至树林中生起篝火取暖，又因给养不足，早早宿营。本日行程约40里，此处距王把头密营约十数里。

10月30日

天明出发，牛在行军中成为拖累不堪之物，因在后面尚有未到达者，李师长前方等待，大队先行。今天行程中有大分水岭。在向小分水岭前进的时候，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解把头的密营，但后卫却落在十数里之外。日暮，道路又不好走，派人出去，先在沟里宿营，已无法全部集合。

11月2日

因规定的工作未完，到上午10点方出发，司令部10时与大队会合，政治委员张寿筏同志检查教导队全体队员是否有违反纪律，很快就发现7名学员烧坏了衣服，当即下令，谓：“你们这种表现不仅破坏了军纪，还无形中帮了敌人，军纪森严，本军难容。”接着，各该队员再三请求，而且表明下列意志：“我们抗日数年，尚未完成任务，由于一时的不谨慎而脱离反日战线是无法忍受的，当然违犯军纪，必须改正。”并且由于全体学员保证今后不再违犯军纪，政委怒容稍稍收敛，每人给予答打20的处分。（笔者注：此为当时的一种体罚手段，用竹板打手心或用木棍打屁股。）

……

11月7日

停留一天，医官忙碌异常，已经有十数人冻伤了脚，要动手术者5名，其他令用冰水洗脚涂药……

11月14日

……去取给养者和3师给养者皆一同返此，什么也没有解决。据杨参谋报告，此次出发与敌人三次遭遇战，所得给养几乎全部损失，只剩马三匹，苞米粒子一半斗多，尚有队员10名退向何处不明。（笔者注：就在这一天，他们到达汤原东部联军密营。这时天气寒冷，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为解决冬装，张寿钱令小股部队奔袭了鹤立岗，缴来了一些棉花和布匹和麻线等物。此后，战士们自己动手用了三天时间做了些棉衣，部分又继续前进，等待他们的当然是一天冷似一天的恶劣天气和敌人的围追堵截。）

1939年1月2日，已经先期到达海伦八道林子的王明贵收到了张寿钱的信，信中说：我已经率第三批西征部队到达绥棱县的白皮营。要火速送粮，以解燃眉之急！王明贵注意到，张寿钱在这封信上的每一个字旁都画上了圈，以示万分紧急。王明贵立即组织30匹马，驮着粮食连夜前往白皮营。

第二天，当王明贵等赶到白皮营的时候，简直不忍心去多看一眼正在取暖的战士们：他们个个衣衫褴褛，部分穿棉衣的战士，棉衣全被树枝挂得破烂不堪，露出了棉花；没有棉衣的战士，身上披着棉被；没有帽子，有的头上缠了好几层布。

头发蓬乱、眼窝深陷的张寿钱见到王明贵的第一句话就是：“粮食送来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下部队可得救了！”

至此，北满抗联各军终于冲破敌人重围，胜利完成了此次西征任务。

有道是“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在组织领导的此次艰苦卓绝的远征的过程中，张寿钱——这位辽阳才子，挥笔写下了文采四溢的《露营之歌》：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渍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情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哟！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入夜难眠。
火烤前胸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49 尚志遭囚

读者们可能已经发现，在前面大讲北满抗联各军西征的文字里，竟然没有一处提到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赵尚志此时正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受着监禁！何以如此呢？这话就得说回去了。

自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以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曾经先后派团长刘海涛和省委委员朱新阳过境赴苏，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但是这两个人走了以后便如泥牛入海，音信皆无。1937年11月，赵尚志又专门给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将军写了一封信，让交通队长、抗联第6军第2师的代理师长陈绍宾送往苏联。在信中，赵尚志向对方提出了帮助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及给予帮助的要求。

1937年12月的一天，陈绍宾从苏联回去了。他说：他到苏联远东军区见到一个海洛将军，他就把信交了上去，并把请求苏联援助事说了。海洛将军听了以后说：你回去就转告你们的负责人，这样的重要事务要你们的主要领导来才行。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人们立即在连续几天的白天里（夜里是行军的时间）开会，研究去苏联求援的事。据当年曾经参加讨论研究的王明贵回忆说，“根据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慎重研究，根据苏方要求推选了赵尚志去苏联交涉求援事宜”。赵尚志到苏联去的具体目的为：

一是要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和医药；二是要求苏联提供训练干部的条件——政治、军事教材和训练基地；三是帮助接通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传递来往信件。

省委委员们认为，赵尚志此去一定会马到成功——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前哨，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从邻邦的意义上讲，日本帝国主义是中苏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所以苏联人肯定会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的。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他们送走了赵尚志。临别前，他们商定，一个月后还在赵尚志此次过境的萝北县集结部队，迎接赵尚志和他将从苏联带回来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赵尚志过界后，苏联人说：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你们说的那个海洛将军！也从来没让什么陈绍宾给你们带过什么口信。你们这些人携枪带炮地闯进苏联境内是违法的，我们不能给你们什么援助？你们也别回去了，到哈巴罗夫斯克去“蹲笆篱子”去吧！

赵尚志走后不久，第6军军长戴鸿滨率500多名骑兵过江到萝北公义永与第3军9师及6师会合，收缴了公义永自卫团的武器之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张寿钱率领第6军2师去攻打梧桐河金矿局；一路由戴鸿滨率领攻打萝北县城。

2月3日夜，戴鸿滨带着部队来到了萝北县城东面的一个小村庄里，休息片刻后，便对萝北县城发起了攻击。由于此次攻击出敌不意，他们所以很快就打进了县城，并占领了城里的一些重要地点，肃清了街道上的敌人。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手榴弹和重火器，所以在进攻敌人的营垒时，出现了久攻不克的局面。眼看着天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敌人的援兵也到了，戴鸿滨只好下令让部队撤出了县城。

日本守备队一见他们撤了，坐上汽车就追。这样双方很快就在下一个村庄里打到一起了。两个小时的战斗结束后，双方各有伤亡，戴鸿滨带领部队向东撤到了一个更远的村子里，并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

会议一开始，戴鸿滨首先总结了此次进攻萝北县城的得失，然后便就部队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征求大家意见。

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心里也都明白，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家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了一阵后，第3军1师长蔡近葵开腔了：

“我们越过边境，去苏联吧！”

“我说去苏联有三点考虑”，看看大家没有接茬，他接着说，“第一，咱们这次打萝北之后，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行踪。而且很快就会出动大批的援军，对我们跟踪追击，而我们自己目前弹药十分缺乏，这样打起仗来不免会有后顾之忧；第二，这次战斗中的二十多名重伤员，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到了苏联可以使他们得到治疗；第三，咱们的赵军长现在正好在苏联，去了以后我们可以找他，一起研究下一步该怎办。”

“咱们现在正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候，就近过江求援当然是个好办法。但就不知过江后，苏联人会怎么对待我们。”一个团长坐在那里一边抽着烟一边说。

“这个问题嘛，我是这样考虑的”，蔡师长说：“我相信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定是会支援各国的共产党进行革命运动的，也必然会援助我们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等我们得到了苏联的武器、弹药和援助物资之后，再返回北满来进行抗日游击战争，那不是更有力量了吗？”

蔡师长说完后，大家都觉得言之有理。戴鸿滨一见大家都是这个意思，便说道：“如果大伙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那就这么办吧！咱们这次去苏联一定要把赵军长接回来，一起返回北满继续抗战。”

2月初的一天，戴鸿滨带着那支500人的骑兵部队从冰封的黑龙江上过了边界来到了苏军的一个边防站。他让一个懂俄语的同志上前说明了来意并得到了“稍等一会儿”的回答之后，便和大家一起在那里等候着和苏联老大哥的关切见面了。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前来迎接他们的苏联边防军骑兵部队一见面就先把他们包围起来了。

“你们是什么队伍？干什么来了？”一个苏联军官通过翻译问道，口气冰冷。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和第6军的一部分部队，一共有500多人，到苏联来是想请求得到你们的武器弹药援助，再回东北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另外，我们还要来接我们3军的赵军长回去，他是前一段时间来苏联接洽事情的。”戴鸿滨怕人家听不明白，尽量把事情交待得清清楚楚。说完这番话后，他本以为这回苏联人该对他们热情一点了。但没想到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的：

“你们队伍来到苏联边境，首先应该交出所有的武器，然后再谈你们所要谈的事情。”

“他是说要缴我们的枪？”戴鸿滨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吃惊地问身边的蔡师长。当他确信这是真的以后，顿时就急了。“交出武器，那可不行！”他对那个苏联军官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你们可以去问我们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代表团现

在就在你们的莫斯科，是能够证明的。”

那位苏联军官一点不容通融地说：“无论什么外国军队到苏联境内，按照我们苏联的法律规定，都应该交出他们的武器。这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至于你们所要接洽的事情，请求援助的问题，也只有等到把你们安排下来以后，请示苏联政府才能决定。现在，首先你要下令让你们的人交出手里的武器！”

戴鸿滨一看对方一点也不肯让步，而且四周又都是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包围着，如果再不下令交枪恐怕就不好收拾了。于是，他只好传下命令：“把枪给他们吧！”

等戴鸿滨他们交完了枪，苏联人就让他们上了汽车，把他们拉到了一个集体农庄附近的一片空房里住了下来。不久，就有一个苏联红军的军官带着翻译来找戴鸿滨了。

“你们究竟是什么队伍？为什么到苏联来？”那个军官认真地问。

“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一部队，有 500 多人，为了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经常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满洲国的军队打仗，我们的队伍现在武器弹药都很缺乏，现在不得不到你们这里来请求援助来了……，我们这部分部队是在黑龙江沿岸攻打日本守备队的据点萝北县城后，由于弹药缺乏，才不得不到苏联来的。我们迫切希望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能支援我们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援助我们急需的弹药，以便我们打击日军，争取解放。我们还请你们能让我们的赵军长和我们一起回到中国去，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另外，我们还想请你帮助我们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取得联系。”等戴鸿滨说完后，那个苏联军官说：“你说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但我现在不能答复你，这得等我们研究了以后才能答复你。”过了几天，那个苏联军官又来了，一见面，他答复戴军长两件事：一是关于援助的事，要等和赵尚志会见以后才能决定；二是，关于会见中共代表团的事，这得请示苏共中央有关领导以后才能决定。你们就在这里等着莫斯科的消息好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苏联军官带来了莫斯科的消息。但却不是会见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事，而是说要把他们送到新疆去！“到新疆去！”戴鸿滨说啥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大声争辩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一部分队伍，在中国东北进行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离开东北呀！否则我们不但对不起中国共产党，也对不起东北人民，我们恳请苏联政府能让我们的队伍回到东北去！”

那个苏联军官一见戴鸿滨急了，便很不高兴地说：“你们来到这里，是在苏联的国土上，就得听苏联政府的指示。我们决不允许你们不遵守这个决定。如果允许你们的队伍返回中国东北，那就一定要通过我们苏联的远东边境，一旦遇到日本军队，就得打起来，这样一来就会引起边境事件，引起日本和苏联的冲突，那就难办了。你们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你们送到新疆去。在那里你们也可以参加你们中国的全国抗战嘛！”戴军长一见再争下去也没有什么用了，便对苏联军官说：“我要见赵尚志军长。”

苏联军官说：“我们可以考虑你的这个要求。”

过几天，苏联人通告戴鸿滨到伯力去见赵尚志。在那里，他和赵尚志及 1937 年过境的祁致中一起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笆篱子”生活。

又过了几天，来了几个苏联警官。他们对蔡师长说：“你们赶快集合起来上汽车，我们送你们到新疆去。”

蔡师长说：“戴军长没回来，我们不能决定走！”苏联警官说：“你们到车站就可以见到戴军长了。”结果，等他们到了车站以后，见到的不是戴军长，而是一队苏联红军。那些人把他们“护送”上了火车，去了新疆。

第十五章

1938年10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第3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率队到达海伦后，便开始召集各远征部队领导人开会，具体研究部署在黑嫩平原的游击计划。为了加强对各军部队的领导，他们成立了西北临时指挥部。

当张寿钱率第3批西征部队到达海伦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们便基本上都会集在那里了。为研究下一步游击活动方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9年1月召开了第9次常委会。1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金策向本次常委会做了题为《北满抗日游击运动新方略》的报告。报告总结指出了1938年以来北满抗联各军损失较大的主要原因：松花江下游地区抗联部队过于集中，而又缺乏统一的工作计划和指挥领导，不能密切配合一致，相互牵制敌人；党内意见不一致，抗联一些部队之间存在纠纷和摩擦；义勇军、山林队虽然大部分接受中共领导，归入了联军系统，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旧思想与旧习惯；抗联部队与群众的联系被敌人隔离失掉了群众的支援等。针对这些缺点和目前的斗争形势，这次常委会提出了北满游击运动的新方针：争取北满军事领导的统一；根据抗联统一行动纲领建立各区指挥部，统一各区的领导与指挥，并加强与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继续远征，打通与南满抗联第1军、第2军的联系，迎接深入到热河和辽西的八路军游击支队及马占山挺进军，以便与之会合；加强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巩固党组织；加强对伪军的工作以及防好反特工作等。

在听取了金策的报告之后，本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共北满省委第9次常委会决议案》。决议案认真总结了前一阶段反“讨伐”斗争和远征中的作战经验，指出：“我们的战术是站在主动的地位，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少制多，以少胜多的灵活的战术，采取破坏、扰乱、埋伏、袭击……，迅速地及时地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在老游击区，应该建立后方基地，并要经常移动，以便进退自如，使敌人无法捉摸，要反对“冒险攻坚”和“蹲仓主义”；在远征时，要采取“逐步伸长”、“分开前进”、“轻兵奇入”的战术，切忌“平推主义”集中远征和畏缩不前。在新游击区，要避免与强敌正面作战，不要轻举妄动、孤注一掷。应该将骑兵游击（平原游击）和步兵游击（靠山游击）结合起来，有效牵制敌人。

最后，第9次常委会号召北满全党同志，要“以十二万全的278

革命创造精神和决心，去实现摆在面前的伟大历史使命。”根据第9次常委会的决议精神，西北临时指挥部将已经远征到达黑龙江省西北部的抗联各部队统一编成了4个支队和2个独立师。整编后的各支队很快就在黑嫩平原上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活动，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为下一步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这个阶段里，第4支队在与敌斗争中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支队长雷炎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1939年春，就在黑嫩平原的抗日游击活动刚刚兴起之际，为重整抗日队伍阵容，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4月12日在通河召开了第2次执委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第9次常委会通过的决议仍然是正确的，并追认那个决议为这次执委会的决议。

政策和策略决定之后，干部就是起决定作用的了。既然有关工作指导方针的问题已经在上一次会议上解决了，那么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就主要是有

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了。所以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会议选举金策、张寿钱、冯仲云为省委常委，金策为书记、张寿钱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这次会议作出的第2项重要决定就是重新整理第3军和第6军，决定由许亨植、张兰生分别担任第3军的军长和政治部主任；张寿钱和冯仲云分别担任第6军的军长和政治部主任。会议的第3个重要决定就是决定改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成立东北抗联第3路军，并为此发表了一份通告。通告说：

“过去在各军民主的条件下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其成立当初曾在政治上、军事上有重要意义并起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不少历史的业绩。但自总司令部采取了反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以来，完全变成了官僚主义的包办或命令的机关，助长了联军间的摩擦对立、扰乱，没能实现它的使命——统一的领导作用，反而成为各联军反对的对象。终于在1938年使北满抗日游击运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第三期东北民族革命运动的新任务是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更统一团结，以适应非常时局。因此，北满省执行委员会第2次全会，除特别遵守1935年份的中央指令之外，并决定配合南满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及吉东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解散东北抗日总司令部，在民主条件下，在北满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

“北满省执第2次全会通过了以抗联第3、6、9、11军参加第3路军，成为3路军骨干部队，并决定在民主条件下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部，任张寿钱为3路军总指挥，任许亨植为3路军总参谋长。3路军必须对民族革命以最大的热诚、信心、勇气、毅力，实现3路军内的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军事计划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纪律统一（站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的立场上）配合1、2路军，马占山游击师、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东北挺进军，及其他一切抗日队伍，准备成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1939年5月3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在得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正式成立。在这一天发表了《东北抗联第3路军成立宣言》和致第1路军、第2路军，致马占山挺进军和八路军游击师的通电，表示要“响应国内总抗战，以积极果敢精神，破坏日寇在东北之一切军政设施，截夺敌寇武装供给，领导民众斗争，争取东北抗日运动的新的开展”。

东北抗联第3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不但使北满抗联各部队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把黑嫩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更与抗联第1路军、第2路军形成了犄角之势，三路联军形成了一个更有利于配合全国抗战的“大三角形”。为了纪念这支新军的诞生，张寿钱和他的战友们创作了一首慷慨激昂的《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

绚烂神州地，白山黑水间。
八载余，强敌嚣张，铁蹄肆虐。
中华民族遭蹂躏，惨痛何堪言！
骨露原野，血染白山巅。
义愤填膺，揭竿齐向前。
誓驱倭寇，团结赴国难。
民族自救抗日军，铁血壮志坚，
杀敌救国复河山。

驰骋吉、黑边，横扫哈东南。
军威远，松江动荡，兴安亦震撼。
冰天雪地朔风吼，夜雨复霜天。
救亡壮志永矢兮，弗援！
鼓角乍鸣，壮士各争先。
杀声四起，敌寇心胆寒。
六载于兹未稍懈，孤军喋血战。
伟哉浩气长虹贯！

机动游击战，突破嫩江原。
貔貅健，长驱挺进，到处得声援。
反日怒潮澎湃起，爆发指顾间。
响应我国对日总抗战，
消灭日贼走狗与汉奸。

精诚团结，粉碎封锁线。
救国重任万众担，势不容缓，
国耻血债血来还。

举国鼎沸兮，全民总抗战。
烈焰炽，战争烽火，延烧遍中原。
东北抗联齐奋斗，统一指挥建，
三路军建立军民齐欢腾。
厉兵秣马，慷慨赴火线。
果敢冲锋，寇氛一扫完。
民族革命成功日，红旗光灿烂，
高歌欢唱奏凯旋。

如果要笔者在军事家和政治家两顶帽子里给张寿钱挑一个更合适的戴上的话，那我会选择后者。这是因为：与指挥打仗来比较的话，他更重视也更善长于抓部队的政治工作。第3路军及其总指挥部成立后，他重点抓了部队中党组织的建设和政治工作问题。并为此专门制定出了《关于党政工作问题》的文件，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党政工作的任务、要求和方法。但是，由于文件是给干部看的，而大多数群众和那些没有文化的干部是看不到的或者无法看到的。但又必须让他们知道和理解中共领导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根本宗旨和一些原则、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张寿钱决定采用过去战争年代经常采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把那些让大家了解和掌握的东西编成一首人人理解、个个会唱的歌。于是便有了这首与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异曲同工的《第三路军十大要义歌》：

拯救危亡，神圣天职，以身殉国，誓死抗日。我军人第一要义。
万众一心，坚如铁石，精诚团结，友爱朴实。我军人第二要义。
舍身为群，忠贞坚毅，服从指挥，遵守纪律。我军人第三要义。
英勇杀敌，流血不惜，临阵争光，死不逃避。我军人第四要义。

全军耳目，卫兵所系，戒备机警，保守秘密。我军人第五要义。
枪械弹药，生命相辅，注重武装，爱惜公物。我军人第六要义。
抗日联军，人民代表，爱惜民众，不犯秋毫。我军人第七要义。
积极上进，尊敬职责，热心学习，谨守军礼。我军人第八要义。
公正自爱，不避艰险，行动纯洁，劳动勤勉。我军人第九要义。
起居谨慎，饭食清洁，讲求卫生，衣物整洁。我军人第十要义。

为了加强对各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第3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又建立了龙北指挥部（负责海伦、讷河、嫩江、德都、龙门、通北、克山、克东一带）和龙南指挥部（负责绥棱、绥化、庆城、铁力、木兰、东兴、巴彦一带），由许亨植（后为冯治纲）、李景荫分别担任这两个指挥部的指挥。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中蒙边界制造了旨在向苏军挑战的“诺门坎事件”。就此，中共北满省委于这一年的8月份发出了“告北满全党同志书”，确定了“动员民众，扩大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响应国内抗战，响应外蒙古人民反日自卫战争”的战斗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他们决定趁日军主力大都调往边境之机，深入敌人的腹地，把游击战争从山边推向平原。此后，第3路军各部队像冬天里熊熊燃烧着的一把火一样，在东北抗日游击活动处于十分艰苦的局面下，在黑嫩平原上掀起了一个新的浪潮。据中共北满省委在1940年农历二月五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从1939年春到1940年初，第3路军仅龙北部队就与敌人进行了40多次规模较大的战斗，其中有30次击败了敌人。在这40多次的战斗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39年9月18日冯治纲率12支队强攻讷河县城的战斗了。在那次战斗中，他们乘敌不备，打进了讷河县城，一举攻克了伪县署、警务科、警训所，伪警备队的北大营，活捉了伪军团长等一批伪官吏，打死日军10多人，缴获了大批物资。然后又在城里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使群众感到“满洲国的劫数要到头了”。对此，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在《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9）》中气急败坏地写道：

“其中活动最频繁的是冯治纲、姜福荣、耿殿君、王明贵等匪团，他们奇妙地运用游击战术，适当及时地离合聚散，奔走纵横数百里，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并大胆地在‘九·一八，纪念日当天袭击了讷河县城；又在11月3日攻击了宁嫩线鹤山车站、北黑线小兴安车站，其它像袭击克山县西城镇，占领警察分驻所，解除军警武装，袭击金融合作社，杀死日本人，夺走万余元现金的罪行，其凶恶残暴，无言可喻，已登峰造极达到顶点。”

日本人的哀叹和咒骂是第3路军取得胜利的明证，但他们说第3路军此时已经“登峰造极达到了顶点”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那些被他们恶毒咒骂的人们又干下了一连串令他们心碎肝疼的事来。

51 巧取克山

克山地处平原地带，那里公路、铁路及电话网四通八达，是敌人重点经营和派有重兵把守的地方。在当时就有所谓“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大东亚共荣圈，皇军不可战胜”之说。但是，不信邪的王明贵就要在这里把捅出个“窟窿”来给全国人民看看。但是，这无疑是一场硬仗。

这个硬仗怎么打？第3支队长王明贵在党委扩大会上说：我们今年夏天以来打了不少胜仗，敌人对我们是又恨又怕。现在青纱帐快要倒了，敌人一定会调集大量兵力到靠近山边的地方布防，不让我们进山。那好嘛！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把部队先拉到北兴镇一带活动，摆出一副要进山的樣子，这样敌人就会调动兵力来围剿我们……

参谋长王钩接着说：这样我们就打他一个回马枪，打下克山县城！

大家一听，认为这个思路是可行的。然后，王明贵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及安排。会后，大家即按计划行事去了。

攻打克山县的时间初步定在了9月份。

很明显，按王明贵他们的计划，攻打克山的头一步是要把敌人从克山城里调出来。为达此目的，在8月份的时候，王明贵开始带着部队在北兴镇一带不断出击，每到一地还要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然后就让老百姓去向鬼子报告。鬼子开始是不肯轻易出城的，但如此这般地进行了多次之后，便再也在城里呆不住了。

到9月中旬的时候，王明贵接到报告说：从北兴镇到克山去的公路都是要经过屯子一侧的，沿途的高粱地挺多，比较好隐蔽。但到了克山县城附近的地方，地里长的都是些矮裸的庄稼，只是在离城7里多的地方有一块高粱地可以隐蔽，目前，鬼子正强迫农民提前割地，企图尽快放倒青纱帐。

王明贵一听，当即决定：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9月21日，王明贵带着第3支队刚刚从侯家屯出发就听到哨兵大喊一声：“谁？”

对面回答说：“9支队！”接着，就见冯仲云和9支队长边凤祥从对面走来了。原来9支队就住在前屯，可是双方却都不知道对方就在跟前。

冯仲云听王明贵向他汇报了攻打克山的计划后说：“我看就让9支队和你们一起行动吧。”

边凤祥说：“同意。”

王明贵说：“两个支队一起行动，那就由冯政委来指挥吧！”冯仲云很明智他说：“不行。我对情况不熟悉，还是由你来指挥吧。”

由于有9支队一起行动，王明贵和冯仲云、边凤祥等人一起对原来的作战计划又做了必要的调整。然后，便在第二天晚上带着部队出发了。

9月24日夜，部队进入了距克山县城7里多地的那片高粱地，挖好了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天快亮的时候，有的战士们便躺在工事里睡了起来。可王明贵的心情却挺紧张。他自己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也感到很疲劳，但是附近的敌情又使我难以入睡。紧靠高粱地东头的公路，敌人的汽车，农民的大车来来往往，不时传来马达的轰鸣声和马车夫的吆喝声、鞭子声。日军、伪军和来往的行人川流不息。在附近的

一块块地里老百姓正在收割庄稼；西头有几个小猪倌正在放猪，嘴里还哼着小曲。这时部队正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如果一旦暴露目标，不仅攻打克山县的计划落空，而且整个部队还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那将会使部队遭到极大的损失。此时，我担心农民割地会把我们割出来；小猪倌进地找猪会把我们找出来……所以我通知各大队：（1）管理好武器防止走火；（2）不准说话，不准离开工事；（3）四周的哨兵如发现猪进高粱地，立即慢慢轰出去；凡是发现有人来，立即扣留。”谢天谢地，令王明贵他们提心吊胆的这一天总算是平平静静地过去了。事先派进城里的“斥候”（侦察兵）也带回了“一切正常，情况没有什么变化”的报告。

当黄昏降临的时候，部队换上事先准备好的伪军服装，打着伪军的旗帜，成两纵队大摇大摆地向克山县城走去。进城后，3支队和9支队分开，分别向着各自的攻击目标奔去。

由于抗联队伍来得特别突然，城里的伪军根本没有准备。所以无论是9支队在执行攻打伪军团部时还是3支队攻占伪县公署、打开监狱放出爱国群众时都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城里的伪军一听是抗联的队伍打进来了，早吓得没了脉，大多数人不是举手投降就是撒脚丫子跑了。只是在3支队攻打伪县公署大院后面的警察学校时遭到了抵抗，我军一名姓姜的司务长中弹牺牲；参谋长王钧在带人去没收银行时，碰上了一个不知死活敢于抵抗的伪职员和那个“顽固无比”的金库。战士们很容易地打死了那个伪职员，但却无论如何也砸不开那个保险柜（钥匙被行长带回家去了），最后只好丢下那个已经被他们用斧子砸得伤痕累累的保险柜，从抽屉里翻出一些伪币带走了。

当克山城里打响以后，住在西大营的伪军曾经几次试图进城增援，但都被我阻击部队打了回去。和他们比起来，住在西门外的日军倒是要凶得多。日本守备队队长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两汽车日军拼着命地往城里冲，但由于他们是在明处攻坚，抗联在暗处打援，所以他们连冲了两次都被打了下去，最后只好撤走了。敌人撤走了，王明贵一见已经达到了战斗的预期目的，也并不恋战，遂下令撤出了克山县城。此一役，抗联以牺牲一人轻伤三人的代价取得了如下战果：

“日本守备队增援的鬼子大部队被打死、打伤，一名日本警正被击毙，打死打伤伪警察20多人，俘虏伪军100多人，缴获迫击炮4门，步枪1000多支，子弹数万发，击毁日本汽车3台……，从监狱解放出300多人，有100多人参军。”

攻克克山县城后不久，王明贵带领第3支队与第9支队分开，准备西渡嫩江，进入大兴安岭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他们首先绕道北上，由支队长王明贵和参谋长王钧亲率80多骑奔赴大兴安岭山区，打响了著名的霍龙门战斗。霍龙门位于嫩江北部，是当时北黑线上的一个铁路总供应站。站内储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汽油、粮食、被服等物资。既然如此，那当然也就是日本人重点保卫的目标之一了。王明贵对即将到来的这场战斗十分重视，在战前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敌情侦察。对此，他回忆道：

“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我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车老板（赶大车的），在门鲁河木耳营一位五六十岁的爱国老人带领下，翻越了几道岭，直到看到炭窑时才停住了脚。向导说：‘霍龙门离炭窑只有20多里，炭窑工人经常到那里给日本人送木炭，能知道日军的布防。’……我和修身进入炭窑窝棚，只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头正忙着做饭……，为了打消老人的顾虑，我向他说明

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来意，要求他协助侦察敌情。老人知道我们是抗日联军后，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笑着对我们说：‘为了抗日救国打日本，有啥需要我办的就尽快说吧，咱没说的！’老人告诉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霍龙门日本兵营，常驻的兵力很少，每天从嫩江站开来一列车日军，有时住下，有时返回。当即，我把他讲的敌情要点记在本子上，画了草图，做了标记。最后我和蔼地对他说：‘我也在格节河金矿沙淘过金，咱们还是老乡呢！老乡见老乡，有事得帮忙啊！’并请他带修身去霍龙门车站去侦察敌情变化。他点头同意，并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最好我一个人去侦察，免得引起敌人怀疑或出现意外。’最后约定当天晚上到炭窑窝棚听消息。“我俩和老人分手后，返回部队……研究了攻打霍龙门的作战方案，决定采取突然奔袭的战术，并具体作了战斗部署。“……天渐渐黑了，前往霍门侦察敌情的老人回来了，他亲眼看见了三四百名日军上了开往嫩江县的火车后，就赶紧回来报告，其他情况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紧紧地握住了老人的双手，此刻难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感激之情……”

“10月17日晚，我们的部队终于接近了霍龙门，在一个山脚下停住，各大队按战前部署，由炭窑工人带路，分头奔向各自的进攻目标。

“徐宝和率领8大队最先到达了伪军骑兵连营房。伪军哨兵向我冲锋队开的第一枪，却成了我军发起全面冲锋的号角。我8大队的冲锋队员手持早已准备好的两条毛毯往铁丝网上一搭，后边的战士紧跟着冲入院内。伪军骑兵连的官兵躺在炕上就成了俘虏……”

经过90分钟的战斗，王明贵他们不但把那些伪军的枪给缴了，而且还打死打伤日军6名，俘虏了20余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还使日本侵略者的铁路供应总站，变成了我3支队的物资补给站。每个指战员都装备了两匹战马、全新的军大衣、棉衣、皮鞋、皮帽、皮手套和两条毛毯。最后他将分给群众后剩下的无法带走的物资，统统付之一炬，使霍龙门变成了“火龙门”！

第十六章

进入1940年以后，日本人继续推行其“治安肃正”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他们在以专用部队的讨伐做为‘经’，以警防队、行政警察、森林警察队、协和会归顺工作队及其他有关机关的各项要务做为‘纬’……，一并进行强力治安工作和彻底治本工作。除了这种大张旗鼓的“讨伐”行动外，日本人还搞了不少名堂——“彻底断绝粮道”以把抗联部队赶进“饥饿圈”，对稍有可疑的人进行“盘问”以“追究其同类者和背后的关系”；“大检查”——对居民按户口、居民证、指纹逐一加以对照，发现有不符者，即当做“不良分子”予以逮捕……

抗联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们没有屈服，但却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

东北严峻的形势要求抗联必须改变游击运动的布局和活动方式。

抗联的领导们感到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统一党在东北的领导，而要实现这种统一，首先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只有党中央才能使东北的党组织实现统一领导。

可是，如何恢复与失去联系多年的党中央的联系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苏联。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主要负责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先后过界赴苏，寻找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站，也请求苏联方面转递给中共中央的信，但这些行动却都没有令他们满意的结果。

早在1939年9月，冯仲云来到了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人称其为伯力城），他对苏联人说：请你们协助我们“召集北满、吉东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北党的统一合并，二路军的合并和统一”问题好吗？

此时，日军在中苏边境的军事活动一天比一天多，苏联人正需要抗联为其提供日军的有关情报，所以对冯仲云特别热情，他们说：“哈拉稍”（好）！我们会派专人负责此事的。由于有苏方的大力支持，所以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很快便在伯力会面了。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会议在伯力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

“第一次伯力会议”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月24日到2月5日，开了13天会，参加者都是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也主要是抗联内部的一些问题。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另一个是《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前者主要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建议首先实现吉东、北满党组织领导统一，以达到全东北的党领导的统一”。后者则在分析了东北游击运动发生发展和挫折的过程和原因的基础上，指出了最后胜利的前途。同时对于抗联斗争的策略、党的组织、军队改编、反奸细斗争等问题都做了规定。其中在斗争策略上，决定要继续坚持执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在军事上确定了“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决定对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建立“路军——支队——大队——中队——小队”的新体制。确定了抗联部队改编的原则和番号——第1路军各部改编为第1、第4、第7支队；第2路军各部改编为第2、第5、第8支队；第3路军改编为第3、第6、第9支队。

今天，我们很难知道当时开会的一些具体细节，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似乎这次会议在有关赵尚志的工作安排问题上花了不少时间。权威的《东北抗

日联军斗争史》对此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2月5日以后休会。会后，经协商决定赵尚志调到抗联第2路军任副总指挥”。

3月19日下午6点，第一次伯力会议在休了40多天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次与会的人员不但有周、赵、冯等抗联领导人，而且还有苏方的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和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位王新林。据彭施鲁回忆说，王新林“是由苏联方面派出的负责人与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联络的主要负责人……，可能最初的苏方代表叫瓦希里，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就用了王新林这个谐音，又利于保密。以后苏方代表曾更换过，但王新林这个名字没更换”。

第二阶段会议重点讨论的是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确定了临时接受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工作指导关系的新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互相支援与合作。会议一开始，苏方代表便提出了基本精神与前面提到的《新提纲草案》基本一致的《对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赵尚志和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篈、北满党省委代表冯仲云的指示提纲》。会议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议：今后抗联各部如在战斗中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境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说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

第一次伯力会议结束后，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分别回到东北，传达落实会议决议。而在此之前，周保中和冯仲云代表吉东、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为了使国内各界群众了解东北抗日战争形势，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馆主笔，并请其转全国各报刊登的公开信。信中说：

“东北抗日联军，日寇视为时腋与心腹之患。战局愈紧迫，则愈加对我军以压迫。民国27年秋冬，颇有相当损折，南北交通联络一时断绝，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响应。自去年春夏以来，北满方面，力图整理巩固，基础已更渐坚实，抗日游击斗争，又有新的开展。惟敌寇每每利用冰天雪地，陷我于弹尽粮绝之苦境。加以人民受穷桎凶恶之刑限制，使军民抗日之步调时受其妨碍。惟无论处境如何困难，可以具实告慰于我中央暨全国内地同胞者，我东北人民皆有誓死不甘做亡国奴之心……。所以一再恳求于我中央暨内地人民同胞者，应将我东北抗日联军命令编列全国统一系统军制范围，而加以人力物力之资助。”

很明显，周保中他们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中央”指的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但是，遗憾的是在整个14年抗战中，他们从关内得到的全部资助仅有区区5000元！这便是国民党对在东北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的支持。

1939 年秋，在对松花江下游在抗日游击区进行了严重破坏之后，日本人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 1 路军。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长期的策划制定了“东边道肃正计划”，成立了以关东军第 669 部队长野副昌德少将为首的“联合讨伐”司令部，集中了日、伪军及警察、宪兵、特务共 7500 多人对伪间岛省、通化省全部，伪吉林省的舒兰、蛟河、敦化、桦甸、磐石和伪牡丹江省的宁安地区进行“日满军警合为一体”的大规模进攻。针对此次敌人大“讨伐”的严重形势，杨靖宇、魏拯民等第 1 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在 10 月 1 日至 5 日于桦甸县头道溜河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第 1 路军领导人会议。此次会议决定：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保存我军实力，避免遭到歼灭性打击，第 1 路军各部应化整为零，编成多股小部队，进行分散活动。会后，第 1 路军各部便按照这一决定分散进行了长白山区的蒙江、抚松、金川、辉南、桦甸、敦化、和龙、临江、辑安等地与敌进行周旋转战。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记载：仅在 1939 年的下半年，抗联第 1 路军与敌人战斗共 276 次，其中有 167 次是他们主动袭击敌人。在这 276 次交战中，属于总司令部的有 49 次，属于第 1 方面军的有 23 次，属于 2 方面军的有 41 次，属于第 3 方面军的有 55 次。

第 1 路军分散开了，敌人怎么办？曾经以我们中国人为师的日本人深谙中国古代兵法中那条“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因此，他们在这次来势汹汹的“大讨伐”中的一个重点目标就是捕杀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杨靖宇将军。

今天，当我们翻开当年伪通化省的 1940 年治安整肃计划时，就可以发现，他们成立了 4 支“专对杨靖宇的部队”：

“甲、富森工作队。富森工作队是专门从事捕杀杨靖宇匪首的，富森警备科长以全面的指挥，督励统辖程、唐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

“乙、程斌挺进队。程斌工作队全面地继承富森工作队各种工作，并更为加强与扩大实施该特别工作，且与唐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经常地保持密切不离的关系，和他们呼应合作，以实施特别工作。

“丙、唐（振东）挺进队。唐挺进队与程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经常保持不离的关系，和他们呼应合作，实施特别工作。“丁、地方工作班。地方工作班经常地和两挺进队进行呼应合作从事归顺工作，破坏工作及其他等。”

除了上述“工作班”、“挺进队”外，还有一个“崔胃峰挺进队”也是专门用来对付杨靖宇的。

为了抓住杨靖宇。这些“工作班”和“挺进队”个个都使出了自己看家的本事。他们先是按区域在飞机的配合下，采取“陆空呼应”、“踩踏战法”进行联合“围剿”；继而则是破区域界限，只要一发现杨靖宇的部队，便穷追不舍，以所谓“狗蝇子战术”将死死盯住，越区追赶。与此同时，他们还一改过去那种对我被俘人员一律处死的作法，而是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宣抚”，招降纳叛，以图动摇瓦解抗联队伍。

敌人的这些损招不久就变成了杨靖宇他们的困境。日后，幸存下来的抗联老战士们每当讲起这段生活都有说不完的话：“1939 年冬天，我们的队伍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我们决定分三路突围。正在这时，朴成哲（时任第 1 路军总司令部机枪连指导员，后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同志的爱人正要临产。她拚着最后一点力气，跑到树林里把孩子生了下来。她脱

下自己的棉衣，把孩子包好，放到一棵大树底下，马上离开了。可是凶残的日寇追上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新生儿，用刺刀把孩子挑死了。朴成哲的爱人转到山下一个村子里，被群众藏到谷草垛里。敌人进村后没有找到她，到处搜查。当敌人用刺刀捅谷草垛时，把她的腹部刺伤了，但她咬紧牙关，不吭一声，最后野蛮的敌人把谷草垛点着，她抱着被烧死的决心，就是不出来。当敌人走后，群众把她救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困境中，杨靖宇的伟大人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王伟圣（当年杨靖宇的警卫员、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市木材公司副经理）回忆说：

“杨靖宇率抗联战士在蒙江一带牵制日军一两万人，当时每天都有敌人飞机擦着树梢侦察轰炸，撒传单诱降。几乎天天和敌人打仗。这时抗联的生活极其艰苦，一次我去找徐哲（时任第1路军总部军医处长，后为朝鲜人民军大将）同志建议说，目前敌人这么多，围剿又这么紧，是否叫大队长（杨担任过游击队大队长，在当时同志们都这么叫他）抽出二十几个同志暂时离开这里，隐蔽起来。徐哲把我的话转给杨司令后，结果叫杨司令把王好一顿批评。他说：叫我离开这里，这是动摇；在这个时候这里我走能行吗？离开这里就是逃跑。我们要战斗在一起。”

黄生发（杨靖宇的警卫员，解放后曾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回忆说：

“杨靖宇将军在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化，和战士们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当时，由于敌人追踪很紧，封锁很严，杨靖宇同志经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没有粮食吃，他和战士一样吃树皮、草根。有一天杨靖宇同志对周围的几个战士说：今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你们去牵几匹马来，要注意，牵马屁股上有烙字的，这是敌人的马，千万不要牵老百姓的马。战士们当天夜里就牵了几匹带字的马，杀了吃马肉。由于长时间吃马肉，不少战士拉肚子。杨靖宇同志也发高烧。事务长老龚同志，打扫一下面袋子，烙了两张小饼，让我送去。杨靖宇同志便问：这是哪里来的？我见瞒不过去，就如实说了。杨靖宇又问：战士们都有吗？我说：“就剩下这么点面了，照顾一下你的身体。”杨靖宇同志沉思片刻，语重心长他说：同志，在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着大家，好好照顾同志们，他们行军打仗，流血负伤，太辛苦了。我不能和他们吃两样饭。说完就让我把饼送给伤员，伤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吃。最后，杨靖宇同志用小刀把饼切成条，放到锅里煮上，让同志们都能吃上一点”。

1940年初，杨靖宇率部回到了蒙江县。为了筹集给养，袭击了敌人的重要据点——龙泉镇。这次袭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亲自坐镇蒙江，调集日军大原、有马、渡边、小滨、有政等部队，伪军步兵第3团与9个伪警察大队、一个森林警察大队，在蒙江境内到处张罗布网，决心一举消灭杨靖宇。

虽然敌人把越来越多的兵调到了蒙江，但由于杨靖宇的部队已经改变集中兵力夺取衣食的计划，部队划整为零，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迷惑敌人的措施，所以他们一开始并不能确定出杨靖宇的准确去向。但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月21日，在蒙江县马家东南方密林地区与敌“讨伐队”作战时，警卫旅第1团参谋丁守龙负伤被俘后叛变了！

丁守龙是警卫旅中掌握杨靖宇行踪的人物，他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叛变，无疑是把杨靖宇这位“伟大的英雄”推向了“悲壮的死路”。下面是丁守龙

当年口供的原文：

“一、丁守龙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警卫旅第一团参谋，当年 33 岁。

二、杨靖宇匪团最近行动

11 月末由通、吉省境地区开始南下部队集结及分散情况：在蒙江壅圈之李参谋与在金川县回头沟之曹亚范及临江西南岔之林参谋合流；12 月 24 日于 1162 高地交战后，在蒙江县头道老爷岭南方，李参谋与曹亚范分离，在头道花园与林参谋离别。在蒙江县双山子附近与韩仁和合流；1 月 11 日与韩仁和、黄海峰匪团分离。

三、杨匪南下之主因

为集合 11 月 23 日在蒙江县下小西头与满军交战后分散各地之部下；与分散之部下联络及侦察各部队匪之粮秣收集情况。计划一举夺其渡冬衣帽袜食粮；目标在林子头、白水泉子、八道江铁道工程现场。

四、青江岗北之杨匪行动

3 月 19 日，冯仲云也写信给北满临时省委，请求省委接纳他的意见——尽管“赵尚志同志过去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但估计到最近在上级援助之下，和我们互相开展斗争的结果，尚志同志已经决意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估计到尚志同志过去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光荣历史和地位，对革命事业的忠实，我请求党还要爱护他，并容许他留在党改正自己的错误。”

中共北满省委领导人张寿篪、张兰生接到这些信后，认为：“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党方面毫无问题是对的，是列宁斯大林党所应采取的必要步骤，是给始终执迷不悟的反党顽固分子应有的回答。党不但在今天这样做，将来永远也会这样做的。”“……对于赵尚志同志的具体意见是：根据上级的提议，兄弟党吉东党的提议可以责成中共北满吉东各级党开展这个斗争的原则下面，同时将赵尚志 永久，开除党籍的字样取消，别的是不能调和下去的……

这样，在第一次伯力会议后，赵尚志只好背着处分来到第 2 路军去工作了。

1940 年下半年，随着抗联各部队不断遭到重大挫折和形势的不断恶化，各省委和抗联各部的领导人都迫切需要到一起研究抗联面临的重大问题。于是，便陆续过界，准备召开第二次伯力会议。赵尚志来到了苏联，做好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准备。但就在及时，传来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消息：中共吉东党组织认为他在第 2 路军工作期间有严重的错误言论，因而决定撤销他参加此次会议的资格，同时还通知他：你已经不再是第 2 路军的副总指挥了！

党籍没了，职务也没了。这样接踵而来的打击如果放到一般人身上，恐怕早就招架不住了，但我们这位东北硬汉却没有被打倒，他那坚定无比的抗日救国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听到上述通知后，他把袖子一甩说毛不让开会，我就回东北！我死也要死在东北战场上！

1941 年 10 月，赵尚志率领由姜立新等共 5 人组成的一支小分队由苏联回来了。他们来到汤原北部山区，住在姜把头趟子房里。东北地区的山里有不少由狩猎和收山货的人修建的简易房，东北人称之为“趟子房”。这些趟子房通常都是以建房人的名字命名的，这大概也是一种专利意识吧。

赵尚志他们在那里住下后，便四处活动，准备继续发展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当时日伪活动十分猖獗，加上天也开始冷了下来，很少有人进山活动，所以他们在最初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一个新队员也没发展起来。直到 12

月 23 日,才有一个名叫王永孝的小皮货商人成为他们这支小分队的第 6 名队员。

鉴于这种情况,赵尚志决定派 3 名战士回到苏联去向上级汇报情况,自己带姜立新和王永孝 2 人以姜把头趟子房为据点,继续开展活动。

然而,就在赵尚志刚刚回到姜把头趟子房不久,敌人就从一个化装成收山货的老客那里得到了如下情报:

“12 月下旬,在鹤立县梧桐河西北约百华里的东山沟王永江、冯界德的趟子房有赵尚志等 5 名出现。”

赵尚志在“失踪”一年多以后的重新出现,引起了敌伪方面的极大注意和恐慌。伪鹤立县兴山镇警察署特务主任东城政雄与警察署长田井久二立即派出了一支由警察署长带领的 25 人的讨伐队,携带无线电台进山讨伐,可是他们一连在山里搜了 7 天,却连赵尚志的影子都没见到。于是,田井和东城二人决定改变策略。

东城说:“赵尚志能够得到中国人的绝对支持,所以即使我们用一个师团的兵力也不一定能把他抓住,因此像这样的讨伐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们应该采取派遣经过伪装的侦察和谍报人员进山,秘密地潜入赵尚志的队伍里去,设法把他引诱到警察的活动范围内,见机使他负伤,然后再将其加以逮捕。”

田井对此表示完全赞成。尔后,他们把这个计划报到了伪鹤立县警务科,又经其将这一计划报到了伪三江省警务厅和保安分室。待这一计划得到批准后,一个名叫刘德山的特务便带着事成之后必有重赏的美梦进山了。

刘德山,球河县一面坡人,24 岁。曾任梧桐河金矿警备队小队队长,此人枪法特好,故此人送外号“刘炮”。

对山里情况十分熟悉的刘炮进山后不久就在姜把头趟子房“偶然”遇上了赵尚志等人。赵尚志对刘炮的突然出现颇感意外,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断定这个刘炮一定不是什么好人,应该立即枪毙掉他。可不知怎么那么凑巧,跟随赵尚志的姜立新与刘炮过去曾经相识。经姜介绍,赵尚志就把脑袋里那根弦松了下来,而且同意吸收刘炮入队。

刘炮入队后表现很积极,不断向赵尚志提供各种“情报”,使赵尚志开始对他信任起来。不久,另一个名叫张锡蔚的特务也以刘炮朋友的身份打了进来。紧接着刘、张二人便开始按田井的计划向梧桐河方向引诱赵尚志了。

2 月 8 日下午,刘炮对赵尚志说:“梧桐河警察分驻所的警备力量不足,现在正是袭击他们的好机会。”

对刘炮的这一“妙计”,赵尚志没有马上表态,但到了晚上,他终于做出决定:12 日拂晓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2 月 9 日,赵尚志带人从姜把头趟子房出发了。在伪三江省警务厅《关于对张锡蔚查讯情况的报告》中,记载了他们在此后几天的活动情况:

“2 月 9 日,午前 6 点起床。早饭后,8 点出发。途中休息一会。午后 8 点到达收山货的柴把头小屋,并在柴把头小屋住下。当夜,张锡蔚从 12 点到 1 点站了一次岗。

“2 月 10 日,午前 6 点起床。早饭后,为商议袭击梧桐河,所以 11 点才出发。在出发之前,赵尚志对其部下说:这次梧桐河要是成功的话,我们就乘马去苏联,若是这次袭击梧桐河失败的话,我们就都到姜把头小屋集合。途中休息了二、三回。

“2月12日，午夜12时到达梧桐河北方二千米的一个独立的农家小房后，刘德山对赵尚志说：现在有必要到梧桐河去检查一下。赵尚志也认为有必要派熟悉部落情况的人去。于是就派张锡蔚。张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就同意了。”

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赵尚志他们来到了距伪警察分驻所不远的吕家菜园子。这时躺在赵尚志前面的刘炮一看机会已到，便对赵尚志说：“先到菜园子屋里暖和暖和，我去撒泡尿。”说完就转过身往回走，当他来到了赵尚志的身后的时候，便立即举枪向其射击。

由于没有防备，加上距离实在是太近了，赵尚志被击中倒地。但赵尚志毕竟是赵尚志，就在刘炮准备向王永孝开枪的时候，赵尚志的枪也响了！刘炮头、腹各中一枪，当即倒地气绝身亡。从后面赶上来的姜立新赶快将倒在血泊中的赵尚志背进了菜园子旁边的小窝棚里。赵尚志自知身负重伤，难以继续行动，便命令姜立新迅速带着装有秘密文件和活动经费的文件包转移去苏联。

张锡蔚一进伪警察分驻所的大门就大叫：“刘炮和赵尚志打起来了！”里边的人一听赵尚志已经来了，顿时慌乱起来。伪警备队长穴泽武夫带着12名警察和警备队员组成的“讨伐队”在张的带领下赶到吕家菜园子。接下来的事，日本人作了如下记载：“讨伐队因积雪尺余，行动不便，虽于距赵部房舍400米附近潜伏下来，监视赵部动静。在潜伏中，很快被匪团发觉，于是散开应战。为了切断赵匪的去路，派分驻所所长以下5名迂回后身，战斗经历15分钟，匪部枪声熄灭。”

当敌人心有余悸地摸进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动静的窝棚里时，赵尚志和王永孝都已处于昏迷状态。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赵尚志的印鉴和几张任命状，以及三八式步枪两支、子弹230发，美制一号橐子一支，日制91式手榴弹10枚，还有一套半日本军服。敌人用爬犁将赵尚志和王永孝拉到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后不久，赵尚志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了刘的手里。”敌人见赵尚志伤势严重（子弹从右后腰部打进，从小腹与胯间穿出），为了能得到抗联的机密，便对其进行了突击审问。据伪三江省警务厅关于枪杀赵尚志向伪治安部的报告中记载：

“赵尚志受伤后约活了8个小时左右。当审讯时，赵尚志对审讯他的警察说：‘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出卖了祖国。我一个人死了没关系，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的。’说完闭口不语，狠狠瞪着审讯他的人，对重伤留下的痛苦不出一声，其最后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这个曾经在北满大地上掀起阵阵狂涛、为了抗日救国而奔波往返于黑龙江两岸的勇士就这样倒在这片他所炽爱的黑土地上了。那条记载着他的不朽业迹的大江川流不息，永远地向后人们讲述着他的传奇……

第十七章

根据第一次伯力会议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相互支援和合作的协议，从1940年秋冬季开始，抗联各部在遭到巨大困难和挫折之后，便开始陆续过界来到苏联境内。到1941年初，先后过界的抗联部队已经达到了近600人。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联人为他们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人称为“野营”的地方。

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伯力东北75公里处的费雅斯克村。因其处于被苏联人称为阿穆尔河的黑龙江岸边，故也有A野营之称（黑龙江的俄文字头为A）；南野营位于海参威（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双城子（沃罗什诺夫）之间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蛤蚂塘的小地方。因其靠近沃罗什诺夫城，故也被称为B野营（沃罗什诺夫的俄文字头）。

南北两个野营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确实是“野”：两处都是山高林密、人迹罕至的山区，除了往野营运送给养的苏军外，其他人很难到那里，也很难发现那两个地方还有一批抗联官兵。自从抗联主力转入野营后，他们便开始利用野营里比较适宜的条件进行政治、军事整训。

军事训练课目是野营里的整训重点（占70%），内容主要包括队列训练、步枪射击、手枪射击、刺杀等。其中射击又是军事训练中的重点。周保中在1941年2月20日给野营游击队的全体同志信中明确指出：“要知道，战斗的要点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达到战胜的目的。无论现在兵器如何发达，步兵作战仍居主要地位，而步兵部队的唯一战斗手段是依靠射击”，近距离还需要用刺刀肉搏。因此，他要求每个指战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要“尽心练习瞄准演习和实弹射击”，将自己培养成“活罗什夫式的、朱德式的射手”。

除了上述步兵一般战斗技能的训练外，野营里还在苏方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些特殊技能的训练——主要是跳伞和滑雪。这两个课目的训练对野营里的战士们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所以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彭施鲁回忆道：“（1941年）7月，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全部到伯力城去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大家欢呼起来，我们驻在城郊一个营房里……，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在我们的旧军服上钉上了苏军领章。那里的教官是一位少校，大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叫他马约尔，就是俄语里少校的叫法。他的教授方法很得法，先学了一个星期的地面上基本动作，第二个星期就练习从跳伞塔跳伞，这个练习使大家兴致很高，绝大多数跳得很成功，只有一个张鸿后同志一到塔顶，就不敢往下看，引起头晕眼花，更不敢往下跳。说也奇怪，和我们同来的野营苏军上尉吴刚第一次到了跳伞塔上也显出胆怯的样子，我在旁边看了暗自好笑；苏联教官对他解释了半天，要他放心大胆往下跳，保证无事。我听到他总是一句话：‘亚莫尼姑，（我不能跳）！’终于，他又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经过半个月的基本动作练习后，马约尔告知我们明天要进行第一次空中实际跳伞，大家又都兴奋起来。当天对每个人又进行了身体检查，没有不合格的。第二天早饭后，卡车把我们拉到了飞机场。每架飞机一次可装20多个人，由教官亲自站在飞机的窗口指挥每一个人跳出飞机。第一次空中跳伞全部成功了，大家喜悦的心情真是终生难忘的，回来的路上都在夸耀着自己是如何拉伞的，伞是怎么开的，自己在空中又是怎样看见别人动作的，落地时谁摔了筋斗，谁站得稳等等。这些话说起来没个完。吃饭时又说，晚

上躺在床上又在说，要不是有人制止，简直会说得上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1942年7月底，周保中和张寿钱向北野营的抗联干部们宣布：为了加强军事训练工作，提高战斗力，随时准备给敢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关东军以有力的回击，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抗联的队伍要全部按照苏军的编制和制度进行改编。改编工作包括以下几项：

1. 充实兵员，将应征入伍的苏籍华人和在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士兵编入国际旅；

2. 充实干部力量，调配大量的苏联军官到国际旅工作；3. 建立旅、营、连、排四级编制体制，凡正排长以上者被授予苏军军衔，按苏军军官标准发薪金；凡连以上军官均由抗联干部担任，副职由苏军军官担任；旅、营两级设司令部由苏军军官组成，旅政治部以苏军军官为主组成，因为后勤供应全是靠苏军，所以旅后勤部的军官全都是苏军军官；

4. 按苏联陆军步兵标准配发武器和服装。

整编工作基本完成后，苏联远东军代表向已经身着苏军服装的抗联官兵们宣布了国际旅的主要干部名单：

旅长：周保中；政治委员：张寿钱；副旅长：什林斯基少校；参谋长：马尔钦科少校（即原来的北野营主任杨林大尉）；后勤部长为金牙少校；第1营营长金日成、政委安吉；第2营营长王效明、政委金策；第3营营长王明贵、政委朴吉松；第4营营长柴世荣、政委季青。

苏联人办事喜欢讲个“正规”二字，他们既然把野营里的抗联队伍编成了国际旅，也就很自然地要给他们授予军衔了。于是，抗联的干部们的肩上便有了被东北人称为“大军杠”的军衔标志。当然，他们戴的是苏军军衔。虽然周保中、张寿钱等人想当初都是当过军长、总指挥的人，特别是周保中，多年前就被正儿八经地授过少将军衔，但苏联人可不管你这些，他们看的是你手上掌握着多少部队。既然野营里就那么多人，所以身为旅长的周保中和旅政委张寿钱就只能得到个少校军衔（一年后周保中晋升为中校），金日成等各营营长和政委被授予大尉军衔，各连连长等被授中尉军衔。

苏联方面对国际旅的成立还是比较重视的。远东军区司令员阿巴纳申哥大将亲自检阅了国际旅，并对他们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宣布国际旅的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

国际旅成立后，他们的军事训练也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开始参照苏联远东军司令部颁布的《步兵训练大纲》，结合战时需要和东北游击战争的实际，有计划地进行系统地现代化军事训练。这种有针对性的正规化训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王明贵后来回忆说：

“每年冬季都要组织一次拉练，在远离驻地百公里之外，搭起帐篷，进行许多课目的训练：战斗行军队形的编成、行军警戒的派出，搜索、伏击、遭遇战斗等。宿营后要组织宿营警戒、侦察、偷袭、实弹射击。炊事班学习野炊。总之，在滑雪训练中，取得成绩是显著的，非常适用于东北大小兴安岭、长白山进行冬季游击战争。

“1941年冬季，在苏联远东军区索尔根少将亲自监督下，旅部组织了一次战术对抗演习。攻守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双方表现得都很出色。证明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战时少流血，我们刻苦地进行军事训练。所以，在训练中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没有人叫苦叫累。”野营里的抗联战士们在刻苦地训练着，他们时刻都在等待着

重返东北抗日战场，为光复自己的国土而去冲锋陷阵。

56 完成使命

1945年5月5日，苏军攻入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其后不久，那些从伯力来的北野营的人便开始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向大家说起他们在伯力城里看到的事情了：“苏联红军正在大量地向这边开过来，用火车运到伯力来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可是老鼻子啦！”

大家一听，顿时都来了精神：“苏联红军把这些老家伙式都整到这边来了，那不就是说，苏联马上就要到东北去打日本子了吗？”“那可不是咋的！你不记得今年4月份他们那个莫洛托夫跟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说，他们两国那个中立条约到期就不再延长了吗？”

“唉呀！那个条约好像还有一年有效期呢，要真是这样，那还得等到一年以后他们才出兵去打日本呀！”

一听这话，大家又着急起来了，心里都在算计着：什么时候才能回东北打日本呢？真盼着马上就能接到回国的命令。然而，他们却迟迟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

回国的命令没来，可情况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6月份，部队的伙食标准提高了，原来需要交钱吃饭的军官们现在也不要交钱了——伙食费全免了！就连一直限量供应的香烟、黄油和糖的供应量也比以前多起来了。搞不清楚苏军供给制度的抗联干部战士就悄悄去问苏联军官：“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苏联军官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战争二线部队的供应标准”。“那不就是说要打仗了吗？！太好了！”他们一下子又高兴起来了。可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一些战士又有点着急了——从伯力回来的人说，现在已经很难在那里看到前两个月当中那种繁忙的军事运输场面了，原来满大街的军官也不知道都哪去了！战士们哪里知道，这正是大战到来前那段特有的寂静！此时，他们的领导人周保中、张寿钱等正在一起制定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他们挑选了100多人组成了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确定在苏军指挥机关任向导，待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三是抗联主力部队随苏军一道进攻东北，消灭敌人、保护交通、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上述计划在征得苏军的同意后，他们便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大家枕戈待旦，心早就飞回东北去了。

8月8日下午，从苏联军军官那里传来了小道消息：“苏联和日本的军队在乌苏里江边上打起来了！”

“啊？！是真的吗？”听到的人有点吃惊地问道。尽管谁也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谁都忍不住要把这个小道消息悄悄地向与自己关系较好的人透露一下。没过多一会，这个小道消息便在野营里转了好几圈，那几个最初向外发布消息的人又被别人极神秘地拉到一边，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对谁也别讲……8月9日一大早起来，从收音机里传来的“大道消息”终于证实了前一天在野营里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当面向他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告诉他说：“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政府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目前，苏军已经进入中国东北，正在向腹地顺利推进！

“小日本快完蛋啦！”

“我们就要打回老家喽！”

野营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早饭后，周保中在北野营国际旅全体军人大会上做了报告。在讲了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抗联的现状，表达了对向斯大林、苏联政府、苏联红军的感激之情后，他告诉大家，从现在起，每个人都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要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东北、光复家乡，完成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在谈到反攻后的任务时，周保中专门讲了要迅速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北会师；抗联要贯彻党的七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准备与国民党反动派做长期的斗争。最后，他再一次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具体的行动方案则由旅里另行通知。

周保中讲完话后，大家便开始对具体行动方案翘首盼望。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这个具体方案就是不下来。一直等到8月下旬了，上级的命令倒是来了，可那不是让他们立即回东北参战的命令，而是通知他们，原定的作战任务有了改变，苏军最高司令部命令独立步兵第88旅原地待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这一下又把他们搞糊涂了，大家纷纷向自己的上级发问：这到底是咋回事呀？

原来，这道令人感到突然的命令的到来和任务的改变，是由于当时苏军在东北战场上的迅猛推进引起的。当初苏联红军在确定反攻计划时之所以决定让抗联教导旅与苏军一同行动，主要是估计到日本可能会在中国东北做殊死抵抗，对日作战将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残酷斗争阶段才能结束。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几乎就在苏军刚一进入东北，日本人就告饶了。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了“乞降照会”，5天后，日本天皇正式发布投降诏书。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向盟军投降。

日本人投降后，蒋委员长一见“摘桃子”的时候到了，便立即下令让解放区里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与此同时，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的军队和政府投降，不能向共产党的军队投降。

美蒋已经动手了，共产党怎么办？

当然是针锋相对！

8月26日，远东苏军军事委员希金中将召见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向他传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指示：独立步兵第88旅中现有的中国人员和苏联人员要分别行动，苏联人员暂时不动，中国人员要随苏军各方面军分别占领东北各战略要点，并准备接受驻各城市苏军卫戍副司令的任命。返回东北的抗联人员都有抗日联军和苏军的两重身份，他们将担负以下几项任务：1.帮助苏联红军维持占领地的革命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友好；2.利用军管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苏军撤出东北后，顺理成章地以抗联人员的身份接管政权。最后，希金告诉周保中，既然抗联人员要以苏军卫戍副司令的身份出现，就得有相应的苏军军衔，他要求周保中在8月29日前，将军官提职授衔名单报到远东苏军总司令部。

8月28日15时，周保中回本部队，召集高级军官各营长、党政工作人员及连长、指导员会议。指示：本旅不获全部直接参加反日作战之原因，战

局急转直下，日本倒台迅速，出人意外。然后，他向大家宣布了有关人事调动的命令及通讯系统和通讯工具的使用规定，要求大家准备好出发时所要带的各种文书。为了斗争形势的需要，他要求每个军官、军士、兵士应有自己的证明文书。在军官证明文书内的签名一一用假名，……一定要让全体军官和兵士知道各种文书之重要，每个人应有自己的行动知识（指周保中为抗联全体人员制定的关于政治、组织、行动的三个备忘录的小册子）。

根据周保中的这项命令，抗联的干部们在回国前都准备了一个假名字——周保中改为黄绍元，张寿钱改为李兆麟，崔石泉改为崔庸健……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抗联的任务还很艰巨——他们要保住这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其中当务之急就是抢占东北的战略要地，发展党组织，建立人民自己的军队和政权。为此，抗联主力部队从9月3日起，在周保中、张寿钱的率领下分批赶赴长春、哈尔滨、沈阳、佳木斯、牡丹江等地开展建党、建军和建政工作。

随着抗联人员的回国，中共党组织很快便遍布于东北各地：在长春，以周保中为书记的地委于9月中旬成立。随后，中共长春市委及伊通、双阳、公主岭、乾安、德惠及九台等县委相继成立；

在哈尔滨，以李兆麟（张寿钱）为书记的中共松江地委及其下属的哈尔滨市委，珠河、阿城、方正、宾县、延寿、双城、苇河、安达、巴彦、木兰、五常、通河等县委相继组成；在沈阳，冯仲云与不久前到达那里的八路军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建立起中共沈阳地委并在辽东、安东、大连、辽阳等地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

在黑龙江地区，王明贵、王钧、陈雷、张光迪、张瑞麟等先后领导建立起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和黑龙江地委及其下属的海伦、北安、绥化、克山等县委；

此外，以彭施鲁为书记的佳木斯地委、以金光侠为书记的牡丹江地委、以王效明为书记的吉林地委和以姜信泰为书记的延吉地委也都在9月份建成并开始了积极的工作。

考虑到日本已经投降，人民军队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抗日，而是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现在再叫抗日联军已经不太合适了，所以他们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改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东北人民自卫军成立后，发展十分迅速，在9月中旬到10月下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展到了4万多人。

部队发展这么快，枪从什么地方来呢？日伪军又奉命不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投降，直接收缴他们的武器就有些困难。这怎么办呢？这就用得着苏军卫戍副司令的大牌子了。由于抗联人员出王苏军卫戍副司令，他们就可以以苏军的名义收缴，这样日伪军就没有敢不交枪的了。在巴彦县，就有一个工作十分出色的抗联人员张祥。

张祥当时出任的是苏军巴彦卫戍司令部的少尉副司令。可别看他肩上扛的牌子只有一条杠一个豆，但由于他是正儿八经被任命为苏军卫戍副司令的，所以别人还是不敢小瞧他的。张祥也确实有副司令的气派，他一到巴彦便决定开仓放粮，扩大抗联在群众中的影响。此举果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等到他到巴彦中学去动员学生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的时候，当时就有100多个学生站起来要跟他走。张祥一看人已经有了，便以张副司令的名义下令收缴了伪警察大队的100多支步枪，将他们武装起来了。几天后，他的这支部

队便发展到了3个营共1500多人。

抗联人员回东北后的建政工作是在协助苏军肃清敌伪残余、维持进驻地的治安和配合关内我军进军东北的过程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以抗联人员、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大同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抗联人员与苏军有着特殊的关系，大同盟的盟员又多是本地人，所以 they 可以向苏军揭露一些反动分子的罪恶历史，严厉限制那些主张反共拥蒋的家伙的行动，甚至将其逮捕起来。

1945年10月20日，东北党组织及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崔石泉，一起来到沈阳，和已经在那里的冯仲云一起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做了初步汇报，并向他移交了东北党委员会的全部关系和党费、档案材料。在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彭真感慨万分他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将自己汇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洪流之中，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战斗。

在行将结束本书的时候，才疏学浅的笔者坐在电脑前望着荧光屏，好一顿搜肠刮肚也没有想出什么样的文字，才能更好地表达出对书中那些英雄们壮举的赞誉之情。最后只好借用一个著名抗联史专家李惠同志的一首小诗为结：

白山苍苍，
黑水泱泱。
抗联之风，
山高水长。

